

PHOENIX WEEKLY

NOV 2015 | 第32期 | 总第561期

鳳凰週刊

¥

大陸 中產階級 沉浮

中共整肅「秘書腐敗」
中日韓三國演義內情
道協「大管家」王哲一軼事
陳培德：體壇反腐遲來十年



9 771024 120050

中國內地 RMB 15.00元 港澳地區 HKD 25.00元

本刊獲特許在中國內地發售

Independent Thinking for Chinese All over the World.

www.ifengweekly.com 為全球華人提供獨立意見



《凤凰周刊》上期封面



凤凰周刊官方网站



凤凰周刊亚马逊电子刊



凤凰周刊微博



凤凰周刊微信



世界遗产地理官方微博

鳳凰週刊

PHOENIX WEEKLY

為全球華人提供獨立意見

咨询服务热线

深圳0755-25934567/北京010-65281005/
香港00852-22008790 传真0755-25934579

香港凤凰周刊有限公司

董事长/出品人 刘长乐
行政总裁 崔强
编委会副主任委员 王纪言 杨家强 周军
编委会顾问 余秋雨
编委(姓氏笔划为序) 王酉年 王多多 邓飞 刘庆东 刘爽 何新景 吴晓镛
钟大年 段敬 郭志成 唐建 袁路 喻凌霄
编委会秘书长 孙谦

香港凤凰周刊杂志社

社长/总编辑 孙谦
副社长 丁晓曙
副总编辑 蓝艺
主编 师永刚 周宇
副主编 崔世海 段文
总编室主任 魏恭 总编室副主任 黄楠
编辑部主任 崔世海(兼) 编辑部副主任 王毕强 路琰 漆菲
主笔 叶润洋 段宇宏 袁凌
主任编辑 晓波 李光
编辑 徐伟 陈祥
首席记者 钟坚 张弛
主任记者 孙杨 曾鼎 吴如加
记者 湛彦辉 徐佳 王琰 李克难 马军 刘荣
邱锐 郭天力 赵福帅 曹蓓 闵云霄
特派记者 李想(华盛顿特区) 蔡源(墨尔本) 田晶(巴黎)
特约主笔 曹景行 杨锦麟 南方朔 谢国忠 阮次山 何亮亮 石齐平
美术总监 小米 图片总监 丁大伟 美编 黄静 虎妹
多媒体发展部主任 吴穷 广告总监 李泽红
多媒体编辑部编辑 马茹均 莫文焯 韩丰泽 康亦玮 钟新星

香港凤凰周刊副总经理 崔博

海外事务总经理 夏婷婷 / 社长办公室主任 赵海燕
大区业务总经理 齐崇轩 柳楚光 傅张伟 高卉 周卫 李莉 / 出版事务部主任 李迪 / 副主任 张云
驻地代表 北京 贾楠 / 上海 金龄 / 广州 陈卫东 / 南京 任浩

法律顾问 王霖 财经顾问 沈铭

编辑出版 香港凤凰周刊有限公司
编辑部 香港新界大埔工业邨大景街2-6号 电话00852-22008790
社址 香港新界大埔工业邨大景街2-6号凤凰卫视总部 电话00852-22008888
深圳办事处 深圳市深南大道2008号中国凤凰大厦1号楼6楼 邮编518026
深圳市红岭中路1008号荔景大厦9楼 邮编518001
电话86-755-25934567(订约热线)/25934558/25580179/25934597
Email:weekly@phoenixtv.com.cn
北京办事处 北京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5号金龙建国温泉酒店3211室 邮编100005
电话86-10-65281005/65281006(订约热线)/65211745(办事处)
Email:cuibo@phoenixtv.com.cn
北京凤凰雨翔广告有限公司 汽车、外航行业总代理 IT、房地产行业代理
北京市朝阳区安外小关东里10号院 电话010-84467053/84467054
浙江金色凤凰影视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浙江省区域广告总代理
杭州市文三路90号(东部软件园内)凤凰科技楼7号楼6层 电话0571-87175087
上海新泽广告有限公司 上海广告总代理
上海市余姚路288号1号楼7楼 邮编:200042 电话021-63511838
深圳市派动广告有限公司 华南区钟表、金融、洋酒、红酒、地产行业总代理
深圳市福田区上步中路南方日报大厦7楼 0755-83226011 0755-83225602
凤凰周刊理事单位 深圳凤凰生活文化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中国内地进口/发行总代理 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
地址 北京市工体东路16号 电话86-10-65063082
承印人 凸版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 香港北角电气道169号宏利保险中心20楼

中国大陆广告总代理 神州电视有限公司

北京分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南路(朝阳公园西南角)凤凰中心南楼3层 电话010-65207877
上海分公司 上海市淮海中路381号中环广场1927室 电话021-52925188
成都分公司 成都市人民南路二段55号峨山饭店商务楼2705室 电话028-85588710
武汉分公司 武汉市建设大道700号香格里拉饭店432号 电话027-85781338
西安分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东大街319号索菲特人民大厦东楼2层 电话029-87928666
沈阳分公司 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北大街69号总统大厦A座2103室 电话024-22814065
凤凰卫视广告综合业务机构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南路(朝阳公园西南角)凤凰中心南楼3层 电话010-65207833
广东一代传媒 广州市东山区文德路67-69号金德大厦28楼 电话020-83226130

广告委托代理商 深圳市凤凰星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地址 深圳市红岭中路1008号荔景大厦9层(邮编518001)
广告热线 0755-25580179 传真0755-25580169
广告客户服务热线 0755-25580179/25934597 传真0755-25580169

本期所有文字和图片作品经著作人授权本刊,未经许可,不得摘编。本刊发表的文字、图片作品并不代表本刊立场观点。
本刊字体由方正电子有限公司授权使用

生育政策变化对公共决策的启示

□ 周兼明

在“单独二胎”生育政策实施一年多后，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这17个字，意味着在中国大地上推行了35年的“独生子女”生育政策，正式宣告终结。

生育政策事关国计民生，十多年来，媒体、学者和社会公众曾掀起过多次讨论热潮，官民互动较为全面。梳理这些年的公共讨论、社会参与与政策演进，我们能发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对政府今后处理重大民生问题与公共政策问题无疑极富启示。

首先是对重大民生和公共政策问题的研究与讨论不能禁声。应当说，从1980年代初期就有学者倡议二胎，如梁中堂、马瀛通当时就提出了人口老龄化问题，认为人口的“倒金字塔”结构会加重社会负担，使经济发展缺乏动力；2004年，顾宝昌等人口学家针对生育政策组织了相关课题组，在2009年亦提出放开二胎的建议；至于媒体对各类计划生育事件的报道与评论，更是不计其数。

正是因为有了这一轮轮的研究与公开讨论，才有了生育政策的不断调整与改变。可见，事关重大民生与公共政策问题的，完全可以放开公众参与，深入讨论，从而吸纳民意进入公共政策和事务的决策中。

其次，对重大民生及公共政策问题进行改革，要形成科学的试点、评估与研判机制。这有助于减少改革阻力与社会震荡，减少因政策失误带来的社会损失。毕竟中国的改革属于渐进式改革，包括计划生育政策，都有摸着石头过河的意味。

独生子女政策初始，江苏如东县比全国提前了10年实行，如今也比全国提前20年进入老龄化，老人比重如今已达30%，学校招不到学生，本地年轻人越来越少。上文所提的梁中堂，虽然当时没有推动两胎化的政策改变，但却推动了山西翼城县成为首个二胎试

点地区，30年时间证明，翼城人口总量增长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让那些反对放开二胎者无话可说。1987年，甘肃酒泉、辽宁长海等11个县市开启了二胎试点，年均生育率均普遍低于周边地区。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样本，才会在2013年放开“单独二胎”后，如此快速就全面放开了二胎。随着社会发展，像房地产、教育、社保、医疗等事涉民生的重大问题，在决策前进行试点与评估也同样重要。大多公共政策问题都像人口问题一样，专业性极强，后果也极难凭借直觉来判断，这时，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试点与评估研判机制就意义重大。这其中，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机制尤其重要，因为大量的公共政策都事关部门利益，就如同计划生育与过去计生委的关系一样，如果没有独立而专业的政策评估机构进行评估，会让决策的推进变得异常困难，试点与评估的随意性也会极强。比如计划生育政策，对控制人口快速增长有积极作用，但对人口结构的影响却至远，如何权衡，是需要专业的第三方做科学评估的。

有了这样的机制，一方面可告诉民众某些公共政策实施后的效果和利弊，增加他们对政府在决策时依据不同的目标做出权衡的理解；同时，也可使政府尽早发现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为改进或终止政策提供决策依据。随着现代社会日益复杂化，过去以直觉和经验进行政府决策的方式已无法满足现代政府的需要，只有从经验型向试点型、科学化决策模式转变，才能少犯决策错误。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政策议程的法律化和制度化。所谓政策议程，就是指某一重大公共问题引起了公众与政府的广泛关注，被正式纳入政策研讨及解决问题的过程，它可以说是政策制定之前最重要的环节。西方发

达国家多把政策议程分为公众议程与政府议程。一种社会问题或利益要求，如果引起了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心和讨论，就会进入政府的决策中枢。政府主动关注公众议程尤其重要，因任何公共政策背后都体现一种利益分配机制，只有听到不同阶层民众的声音，才能兼顾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所以它也是平衡与调整多元利益的平台。这也是体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即便在最严格的时期，政府还是与社会保有一定互动。比如在农村，“一孩”政策陷入窘境时，中央政府就适当放宽了生育二胎的条件，在大多数农村地区及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一孩半”或“二胎”政策。之所以保持了政策的部分柔性，与公众议程在公共决策中的作用有关。但这种渠道仍需进一步拓宽，以使民众的各种合理诉求有序、快速地进入政府的决策系统，并把这种反映公民诉求的渠道制度化。只有这样，才能提升公众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这其中，公共媒体与社交媒体的作用尤其重要，让媒体有更大的言说空间，它才能成为反映公众意愿的真正渠道。

总之，“二胎”政策的推出为民生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个案，成为媒体、专家学者和社会大众等与政府充分互动、深度讨论的决策样本。当下中国处在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复杂，多建立制度化的参与渠道，有助于政府决策的科学性，从而减少各种非制度化社会抗争，保障国家在正确的轨道上稳健运行。



扫二维码
看往期精选



18 大陆中产阶级沉浮

COVER
STORY

了解、认识大陆中产阶级的生存状况，关注成为中产阶级的晋升通道，在当前的中国意义重大，也是对执政党和全社会的考验与挑战。

红雲红河集团
HONGYUNHONGHE GROUP
赠阅部分嘉宾

卷首语 Editorial

3 生育政策变化对公共决策的启示

现在时讯 Trending

6【瞬间/封面/台港澳/中国观察/环境&科技/阅读/军事】

封面故事 Cover Story

18 大陆中产阶级沉浮
20 重新认识大陆中产
29 大陆中产崛起对中国乃至世界意义重大
32 “土”字型社会中的大陆中产

大陆时事 Mainland Politics

36 中共整肃“秘书腐败”
38 道协“大管家”王哲一轶事
40 网约车管理新规激辩背后



网约车管理 新规激辩背后

40▲

大陆出台新规，拟严格限制网络约车服务，引发各界激烈争论。这是中国各方力量自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短暂沉寂后，围绕改革开放的第一次全面交锋。

特别报道 Feature

42 体坛“清污”进行时
44 能吏肖天“贪塌”录
47 大陆体育反腐风暴
53 陈培德：体坛反腐迟来十年

国际 World

56 中日韩三国“演义”内情
60 日本高校“去文科化”之争

军情 Defense

64 中国潜艇出口的机与危
66 美海军靠什么折腾南海？

专题 Feature Story

68 银川：创新思路，借势崛起
——访宁夏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杨占武

财经线 Business

72 大陆谋求掌控国际农产品供应链

76 盈利萎缩不良攀升
内地银行投资者进退失据

78 财经资讯

图谋天下 Galleries

80 “她”的伤口

历史档案 History

86 电影《暗杀》背后的韩国抗战史

90 微史记

文化 Arts & Culture

92 “横死”徐树铮：小聪明的人坏大事

94 乌镇戏剧节：一场古镇的文艺复兴实验

97 人类如何避免被科技奴役？
——专访《哈佛商业评论》前主编
尼古拉斯·卡尔

行走 Traveling

100 仰光：民主剧变前夜的光

三地书 Books

104 述旧邦以托新命

36

中共整肃“秘书腐败”

《省部级领导干部秘书管理规定》旨在限制秘书的隐性权力，并杜绝官员与秘书形成长期的命运共同体。

56▼

中日韩三国“演义”内情

由于之前期望值“没有太高”，各方对此次领导人会晤表示基本满意，但前期的日程设置和中日、韩日等双边会面的敲定，费力程度远超想象，这也从各方措辞之谨慎可见一斑。



大陆谋求掌控 国际农产品供应链

72▲

中国农业企业纷纷“出走”的背后，是中国持续猛增的农产品需求与国内农业资源紧缺的尴尬，而且海外多种农产品比国内质优价廉，中国农业竞争力每况愈下。



人类如何避免被科技奴役？


97▲

在机械自动化所带来便利的玻璃笼子里，其应有的知觉和敏锐的反馈都被切断了，这种危险存在于我们的生活里。



广告目录

多媒体 / 封二 上海景陶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 扉页 周刊征订 / 封三
《世界遗产地理》 / 封底 《凤凰周刊·生活》 / 13 松下 / 17
比音勒芬 / 27 芬迪 / 55 多媒体 / 61 将本刊作为指定读物的航空公司和酒店 / 63 广告资讯 / 79



MOMENT

瞬间

葡萄牙 2015 / 10 / 28

纳扎雷，人们在海岸边观赏今年第一波大浪。纳扎雷湾是全世界冲浪选手最喜欢的地点之一，被称为欧洲冲浪的麦加，该处的大西洋海域水底有峡谷，故经常出现大浪。



中国人均寿命15年增长8.5岁

英国《柳叶刀》杂志刊登了一项新的研究成果，说中国的平均寿命大大延长，比1990年时平均延长了8年半。不过研究报告说，就各地而言寿命延长并不均衡，这篇报告以1990年到2013年的死亡率为研究重点。报告说，新疆、青海和广西等不发达地区的传染病、交通事故受伤、胃癌和脑血管疾病的死亡率提高了一倍。



导致死亡率下降原因

传染病
痢疾
婴儿死亡率

导致偏远地区死亡率上升原因

传染病
交通事故受伤
胃癌
脑血管疾病

+8.5岁
中国人均寿命

天津和北京两地的大城市居民死亡率下降，寿命延长。2013年中国人口平均寿命最高的地方是上海。



男性 80.2岁

2013年
上海市人均寿命



女性 85.2岁

资料来源：《华尔街日报》网站 10月27日

1

《南华早报》网站

2015/10/29

2020年中国富豪总资产占亚洲过半

根据瑞士私人银行宝盛10月28日发布的最新财富报告，中国百万富翁的总财富会在明年达到5.1万亿美元，并在2020年增加至8.25万亿美元，较今年增逾七成，占亚洲富豪的比重超过一半。瑞士宝盛预计，中国的GDP会在2017年至2020年上升9.9%，中国内地仍然是亚太区创造财富的引擎。报告预期，未来5年香港高资产净值人士财富将达到1万亿美元，较今年增加42%。除了财富总值，宝盛还追踪了高资产净值人士生活消费指数显示，上海是最高消费的城市，香港和新加坡分别列第二和第三。

2

《日本经济新闻》

2015/11/03

中国将主导制定稀土国际标准

用于磁铁等的稀土的国际标准规格拟定工作已经启动。在中国主导下，包括日本在内的6个国家组成了专业委员会，将在2016年底之前敲定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新标准。预计国际标准规格将在今后约3年里生效。日本将要求让本国的性能参数体现到汽车用磁铁等规格中。专业委员会由中国担任理事国，日本、美国、澳大利亚、韩国和印度参加。纳入规格对象的是保管和运输方法、化合物中所含元素的分析方法等。随着规格的统一，开展贸易之际，个别企业分析稀土情况的时间和费用将随之减少。



在占绝对统治地位一个世纪之后，大公司正显示出衰败迹象：利益冲突、重视短期利益以及监管方面都使得成本增加。



以咖啡和梦想重塑公司

•《经济学人》/2015.10.26



从Uber到Airbnb，规则挑战者们正在彻底改造商业模式，重新打造新型公司形态。与现有的

上市公司不同，新崛起的公司权利和责任结合紧密。创建者、员工和支持者直接控制公司。它们虽然仍处于发展初期，但如果这种新形式传播开来，将会改变现有的上市公司的运行方式。在占绝对统治地位一个世纪之后，大公司正显示出衰败迹象：利益冲突、重视短期利益以及监管方面都使得成本增加。

对“一场革命正在酝酿”的观点有三大反对意见。首先是这种现象仅限于硅谷一隅。但颠覆经济正在成为主流。今年夏天Airbnb为近1700万客人提供了住宿，Uber每天接送数百万人。为创业公司提供办公场所的美国公司WeWork在17个城市有56家分支机构，拥有员工总数达3万名的8000家公司会员。第二是最后的赢家仍是上市公司，因为绝大多数创业公司最终希望上市或者卖给上市公司。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创业公司选择维持私有，并且发现比以前更容易筹集资金而无需依靠公开市场。当今在美国上市的科技公司在成立11年后才通过公开市场筹集资金，而在1999年只有4年。第三个反对意见是这些新公司的所有权与经济体的其他部分隔绝。上市公司让普通人也能在资本主义分一杯羹，而创业公司由一小群风投家主导。但普通人可以通过种子投资这类平台直接投资创业公司，在创业公司初期就入股的主流共同基金间接投资。

今天的创业公司不会通吃。上市公司有其固有的地位，尤其在石油、天然气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包括一些目前最知名的公司在内，很多创业公司不可避免地会失败。但它们创建公司的方式会遗留下来，为资本家的“工具箱”添上一件引人注目的工具。Airbnb、优步以及其他公司更适应虚拟的网络和日新月异的科技，它们正在开创一种能更好地将梦想转变为实体公司的新型公司体制。

恐怖“柯政” 台北公务员纷纷离职

• 《星岛日报》/2015.10.30

→ 台北市议员王鸿薇10月29日公布最新统计指出,市长柯文哲上任至今10个月,台北市政府已有1511名员工离职,创下10年新高,离退率比去年增长3.56%。其中,有88人宁愿降调到“中央”或外县市单位,自愿退休者更达557

人。柯文哲为此被批造成员工“逃难潮”。

据报道,离调人数排行榜前三名依序为:警察局、卫生局、区公所。对此,台北市警局方面称,该局现有7224人,是台北市政府人数最多机关,今年离退376人,与去年差不多,是合理数据,不影响

业务。卫生局长黄世杰指,人才升官到“中央”,而前任局长林奇宏到新北市也挖走一些人。民政局副局长吴坤宏回应,有些人想离家近,流动很正常。上述官员都说,已补人。

不过,一位台北工务局提早退休员工却抱怨,柯文哲上任后

该局业务量暴增,碰上台风更是从早到晚清道路,操整天累半死没奖励,还要写检讨报告。他不堪操劳,为“保命”快闪,宁提早退休少领近5000元新台币。降调外县市的都发局前员工说,柯上任后拆违建、搞公宅、弄社子岛,还要处理“大巨蛋”。他天天爆肝加班,多数公仆是认真做事有家庭,放假也想陪老婆小孩,工作条件如此恶劣,请调总可以吧。

港人买楼梦难圆,政府何不创多赢?

• BBC 中文网 / 2015.10.27

→ 自美国实施量化宽松政策以来,高速印钞票,利率又低;香港投资者转趋买楼收租,另因沙土之后长期没卖地而出现楼宇供应短缺,市民需求又大,以致近年楼价急升,港岛区每平方米均价十八万港元,新界每平方米均价十万港元。据2015国际机构调查,港人需要将十七年的家庭收入完全奉献,才能支付其住宅。该项负担指数香港已是五连冠,这更是历来最高的纪录。

香港约有二十万人居住劏房。买楼成为了港人的梦想,有中产甚至为了储蓄也搬到劏房去。据最新调查,三成年轻人的人生目标是置业,但由于楼价奇高,不少感到人生无望,有的愤而上街去抗议;有的索性及时行乐,旅游消费、兼职度日,无谓奋斗;有的打算离港,移民台湾或远走他方。

香港楼价贵,已令一些人的价值观起了变化。“大学生觉得念书没有用,毕业后工资增长追不上房价增长速度,楼市趋跌也无法负担;有的家长亦觉有楼比具学历重要。”香港城市大学一名姓张的教授说。现在大学毕业

生月薪一万二千元,市区租劏房每月逾五千元,能够生活下去已不错,遑论买楼。因此,香港年轻人为了面对现实,数万人正在等候公屋,但却被批评无志气。近来社交媒体一度热议:一名未婚妻,不满未婚夫购入新房子只用自己名下拥有,因没有加上其名字而烦恼。香港离婚率近年急升,达3.1%,每年逾22000宗离婚,每天逾60宗。这对情人仍未结婚,男的被指担心一旦婚变资产会被配偶瓜分,女的则觉嫁出去,楼房不应分彼此,安居之所没名分,并没安全感。港人就议论纷纷,各说各理。总之,这反映了港人对拥有楼宇的渴求。

香港家长重视孩子教育,以往不惜卖楼供孩子出国念书。香港现有十间大学,大学学额扩增。家长已在反思:是否值得卖楼供孩子出国?“卖楼花一百万元供孩子出国念大学,不如留资产给孩子,未来更有保障;将来孩子找份优差不易,要剩下一百万元,不知等到何年何日。”一名身价过亿的富豪对笔者说,香港的大学具国际水平,孩子留港攻读,陪伴在自



己身边也不错,将来在港找工作也占先机。

香港贫富悬殊已达警戒线,是亚洲最不平等的地方。富有港人坐拥地产而享受自动升值,无产的中产只有纳贵租,穷人辛勤工作只有住公屋。由此可见,富者愈富,贫者没有资产便难以向上流动。

港人以置业为目标,一是居住有保障,不致无瓦遮头;二是楼宇升值,可分一杯羹。中原城市领先指数由2009年60点升至现在144点,过去六年楼宇升了一倍多,有楼者笑逐颜开,无产者愁眉苦脸,楼价高企已令社会分化,怨声四起,呈现管治困难。

新加坡上世纪50年代学习香港公屋制度,现在新加坡“组屋”政策反而令港人刮目相看。有香

港学者建议,让公共房屋私有化,既可满足市民置业需求,令资源更有效流转,而政府又可收回地价,为紧绌的库房创造收益。其实,香港于1998年推出“租者置其屋”,但因业权散乱,八年后被取消。如今香港土地缺乏,楼价高企,值得港府重新检讨,以更可行方法推出。

有批评指资助公屋住户买楼,对纳税人不公平?然而,有产者拥有房产愈来愈富有,无产者错过机遇,没法分享社会富裕成果,形成贫富悬殊,这又是否公平?再说,公屋住户本身乃获资助,政府一旦采取扶助政策,令其自置物业,可腾出资源供政府更有效运用,支持更需要的人士。(黄楚琪)



一些城区紧锣密鼓地推进发展与开发，建设了大量闲置的房地产项目，也就是中国恶名远播的“鬼城”。这些气派的建设项目已经完工，只少了一样：居住在里面的人。

中国哪些城市是真正的“鬼城”

• 《华盛顿邮报》网站 / 2015.11.04

→ 几十年来，中国兴起的住房建设热潮达到了让人难以理解的程度。最近30年来，2.6亿人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大约相当于美国总人口的80%。为了给这么多人提供住所，从1984年到2010年，中国楼房密集的城市区域的面积几乎扩大了四倍。

许多新建楼盘惠及了人们的生活，有些则不然。一些城区紧锣密鼓地推进发展与开发，建设了大量闲置的房地产项目，也就是中国恶名远播的“鬼城”。这些气派的建设项目已经完工，只少了一样：居住在里面的人。

近几年来，中国的鬼城引发了众多讨论。有人认为这样的开发行为证明了自上而下的规划所造成的浪费，也有人说这是企业获得太多低息资金支持的后果。有人将这种局面归咎于普通民众缺乏良好的投资渠道，或者地方官员想要迅速发财，因为卖地给中国的地方政府带来了大量收入。也有一些人说，鬼城的说法言过其实。他们奉行的哲学是“房子建好了，自然会

有人来住”，并且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鬼城会逐渐住满人，变成生机勃勃的社区。

很难对这些说法进行评估，因为关于鬼城的大多数研究都带点道听途说的色彩。就连最严谨的研究方法也有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比如投资调研公司将刚入职的员工派到偏远地区，让他们去数晚上有多少楼房会亮起灯光。

如今，中国最大的科技企业之一百度公司采取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让人们首次对中国的鬼城有了系统性认识。百度大数据实验室和北京大学的科研人员利用由手机和全球定位系统接收装置收集的定位数据，在历时6个月的时间里，实时并在全中国范围内追踪人们在有可能是鬼城的地方进出的情况。

多年来，百度在中国的搜索、移动地图和其他一些服务的市场上发挥着主导作用。这让科研人员可以获得庞大的数据资料——7.7亿用户，在中国13.6亿人口中占据相当大的比例——来进行研究。为了确定哪些地方有可能是鬼城，研究

人员创造了一种计算方法，能够确定人口相对稀少的区域。他们定义的鬼城是，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少于5000人的城市区域，这样的人口密度差不多是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所推荐的人口密度的一半。

结果表明，在研究人员追踪的50个城市当中，20个存在大范围的空置住宅区（为了不影响房地产价格，研究人员没有披露所有50个城市的名称）。不过这些城市大多是中国东部的中型城市，主要位于城市的外围地带或新开发的区域。

研究人员遇到了一个问题：或许这些城市有的并非鬼城，而是旅游城市。就像全球其他地方一样，旅游目的地城市在一年当中的某些时候基本上处于空置状态，但是在其他一些时候又会住得满满当当。研究报告用两个城市的情况对比了这种差别：位于中国东部沿海的山东乳山和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郊的康巴什。

为了排除旅游目的地城市，研究人员追踪了一些大型空置住宅区在不同时间段的人口密度变化。研究人员说，康巴什的人口在工作日增多，周末和假期则减少，表明人们是在这里工作，但在其他地方居住。乳山则在全国性假日期间

人口直线上升，这样的时间段正是康巴什的空置期。

科研人员说，这样的活动模式表明康巴什符合居住者稀少的“鬼城”特点，而乳山则更应该被称为旅游城市。他们说，在这50个城市中，最终看起来像是旅游目的地的有26个，像鬼城的则有24个。在中国政府试图评估本国经济增长的质量而不是数量的时候，这样的数据能够给政府提供大量的经验教训。在中国，地方官员经常想方设法制造发展的表面现象，有时他们并不关心是否收到了实效。

参与了这次研究工作的吴海山说，这些数据有助于地方政府未来在规划方面作出更明智的决策，同时了解应该改善哪些地区的基础设施，从而有助于让鬼城变成能够发挥城市功能的区域。吴海山以郑州新区为例，之前这里曾被广泛报道为鬼城，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被吸引到这个地区。这些数据在供中国城市规划者借鉴的同时，也为有眼光的房地产投资者提供了参考。据科研人员说，要成为正常运作的社区，城市需要提供就业、工业、娱乐、医疗和学校。单靠一片无人居住的房屋，远不能称其为城市。

中国煤炭消耗骤然减少, 能源变革正在发生

• 《华盛顿邮报》/ 2015.10.28

→ 世界上煤炭消耗量最大的中国烧的煤忽然变少了, 这可以算是空气质量恶化和全球气候变化给这个国家带来的一个改变。这一改变出乎意料, 但也是为中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注入了新的可信力。现在中国已经做好准备, 希望在今年年末在巴黎举行的下一轮会议上扮演具有建设性的角色。

2010年, 中国新增的煤炭发电厂数量跟德国整个国家的煤炭发电站差不多。从2014年开始, 中国政府大力采取行动, 控制空气污染、减少煤炭的消耗量。同时, 在这段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中国想要从一个烟囱冒着呼呼热气的世界工厂向一个更加清洁、更加高科技的国家转变, 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 中国、美国、印度三国的排放量总和达到全球总量的一半。

向更绿色的经济发展, 要求中国发现大规模的可替代能源。中国必须要确保不会在某个地区造成失业率大增的前提下实现转型, 比如北方的煤矿区。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工业重地, 对电的需求量也在急速攀升, 从1980年到2012年增加了17倍。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对资源的依赖变得前所未有的低, 今年, 中国对电的需求量没有出现上涨, 并且, 从现在到2020年, 对电的需求量每年预计会下降4%。

对于煤炭来说, 这一转变带来的影响似乎更大。中国的煤炭消耗在2011年前的10年中, 每年都以9%的增长量在递增。但是去年中国的煤炭消耗量比前年下降了2.9%, 并且在今年会进一步下降。

专家指出, 去年暴雨的增多使得水力发电量变大。但是, 在接下来的两年中, 还会有一批新的煤电发电厂出现。虽然如此, 由于政府正向清洁能源大力进军, 加上经济增速放缓对重工业形成打击, 以及人们有意识地避开消耗大量煤矿和电力的高污染行业, 所以行业内正在形成一种观念, 认为根本性的变革正在发生。

由于一些在建的发电厂陆续竣工, 煤矿的消耗量在一两年内或许会出现短暂的上涨, 但是顶峰也就在近期了。伦敦经济学院的尼古拉斯·斯特恩和费格斯·格林的一份报告预测, 中国的煤炭消耗会在2017年到2020年达到顶峰, 此后会出现一段长期且缓慢的下降。温室气体排放的顶峰会晚一些, 可能发生在2025年。“目前为止, 煤矿在中国依然是最主要的能源。”伦敦查塔姆研究所亚洲项目的研究员米

查尔·美丹说, “现在中国对煤的需求量在变少, 进口也在减少, 市场应该适应新的思维。”

空气污染以及由此产生的公众意识, 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因素。中国领导人发起了一场“对空气污染的战争”。去年, 中国关闭了1100座小型矿井, 钢铁、混凝土生产减少了上千万吨, 效率低下但污染严重的小型工厂成为打击目标。

中国政府在大力对天然气供应、核能源以及可再生资源进行投资。在风力发电上, 中国走在了世界前列, 并且即将在太阳能发电上超过德国, 成为世界第一。中国对可再生资源的投资在加速, 虽然在总的供电量上, 这些资源对供应量只占很小的比例。

中国希望能建成新的以服务为导向、以消费为导向的经济, 这是一种低污染和低能源消耗的发展道路, 这一转型是中国领导人一直希望达成的。现在, 他们已经不得不选择这种转型。“我们需要一个强大到足够推动经济发展的新产业, 要以更可持续、更

清洁为基础。”中国外交部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高风在年初接受采访时说, “我们相当有信心, 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将变成一个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力量。”

虽然来自国内的担忧是转型的主要动力, 但是中国领导人已经意识到, 人口密集的中国已经面临着水资源短缺, 并且在对抗全球变暖上并没有什么有利武器。“中国已经开始通过一系列雄心勃勃的行动、计划、目标和项目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的芭芭拉·费雯丽说, “通过减少煤炭的使用, 我们开始见到成效。”

现在, 许多专家认为, 中国可能会实现自己的排放目标, 并在2030年前达到二氧化碳排放顶峰。但这不是轻而易举的。中国将近三分之二的电力仍然依靠煤炭提供。随着经济的发展, 接下来的10年, 中国的电力需求依然会持续上涨, 更多发电厂也会继续在全国各地建成。

(Simon Denyer)



“二孩”政策下哪些公司将受益？

• 彭博社 / 2015.10.30

→ 中国最近宣布将取消于1979年开始实施的“一孩”政策，可谓是一项重大的政策转变，背后有着一系列的原因，但无论是哪个原因导致政府做出这一决定，该政策转变在全球市场掀起了波澜，影响了汇率、大宗商品市场和股市。据新华社报道，这个婴儿配方奶粉消费量全球排名第一的国家宣布结束实施了三四十年的“一孩”政策，允许所有夫妇生育两个孩子。

中国占全球全脂奶粉进口量的近半壁江山，但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由于经济增速放缓、且中国继续消化大量库存，今年进口量可能会大跌约40%。INTL FCStone乳品行业分析师John Lancaster表示，新的政策真正影响需求至少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已从8月低点开始反弹的价格，在明年第二季度前可能

也不会出现显著上升。Lancaster在都柏林通过电话表示：“如果政策使得婴儿数量大增，那么肯定会成为中长期的支撑因素。婴儿配方奶粉是中国进口产品的大头儿。”

就在中国政府全面取消独生子女政策决定公布的前一天，瑞信发布了一项对该国“孤独一代”的深入研究，因为生于上世纪90年代的他们正是受到“一孩”政策影响的一代人。正如近几个月美国“千禧世代”引发了分析师广泛关注一样，对年轻中国的憧憬也吸引了瑞信的极大兴趣。

陈昌华牵头的瑞信分析师团队发布了一份长达126页的研究报告，聚焦这一代受益于教育机会增加、现在又沉溺于智能手机的独生子女以及伴随他们而至的商机。瑞信称，“90后”的互联网用户已从2010年的2.12亿增加到



去年的2.77亿，他们有可能成为中国第一代愿意服务消费占比超过商品消费的人。这一趋势的主要受益者包括网上旅行服务商和影剧院。这份报告指出，其实目前中国大陆出境游的游客有60%年龄段在21到30岁之间。

鉴于独生子女政策导致中国年轻人口下降，瑞信看好机器人使用大规模提高的潜力，称“高温、高危及有害环境下的工作岗位会越来越难找到充足的劳力，这些空缺将自然而然地由机器人和自动化系统来填补”。即便现在

独生子女政策出现改变，面临的冲击也将是巨大的。瑞信跟踪中国工业和科技领域的分析师们将该国的机器人拥有量和日本及韩国进行了比较，称当前环境为该行业带来了机遇。

总而言之，瑞信基于上述趋势最为看好的行业为电子商务、运动服饰、旅行、调味品及汽车租赁，认为这些领域的企业有望受益于人口结构的改变和机器人需求的成长。具体到公司，被瑞信点名的有京东、安踏、中国国旅、海天味业和安飞士等。

中国过剩钢材去哪儿了？

• 《日本经济新闻》 / 2015.10.29

→ 中国产钢材大量流向亚洲。中国仅2014年就生产了8.2亿吨粗钢，超出本国国内需求1亿吨。其中，向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等东盟主要5国以及印度出口了接近2500万吨，是5年前的5倍。受廉价钢材涌入影响，泰国大型钢铁企业陷入破产，印度的塔塔钢铁也被迫裁员。亚洲钢铁产业的生存竞争愈演愈烈。

“据说一家工厂已停止采购原料铁屑”，在越南胡志明市郊外的钢铁厂商集中的Phu My

工业区，2015年夏季起，称将启动生产调整的传言四处飞散。因为看好越南基础设施投资将会加速，当地厂商、日本的共英制钢以及韩国浦项制铁一直在该工业区推进增产投资。但由于建材用钢管和线材产品方面，廉价的中国产品大量流入，很多工厂为开工率低下而苦恼。据国际钢铁统计局（ISSB）统计，2014年中国对越南的钢材出口为660万吨，与2009年相比增至近5倍。

中国大陆产钢材的流入还使台湾钢铁钢材受到冲击。台湾对菲

律宾的钢材出口量在最近5年减少了40%。廉价中国大陆产钢材将台湾产钢材挤出了市场。2015年10月1日，由日本钢铁企业JFE钢铁以及伊藤忠丸红钢铁出资的泰国钢铁企业Sahaviriya Steel Industries申请破产保护。其生产钢材中间材料的英国子公司受发源于中国的“钢材通货紧缩”导致的行情恶化影响，于9月19日停产，经营陷入困境。印度最大的民营钢铁厂商塔塔钢铁也将募集自愿离职人员。印度的《劳动法》严格限制解雇员工，不过该公司负责人事工作的副总裁Tripathi表示，“今后几年将通过提前退休制度来降低劳动成本”。

各国政府也在为保护本国企业而采取行动。泰国和马来西亚

2015年以中国产钢材为对象启动反倾销调查。不过，即使启动本地化生产，只要中国钢材厂商的产能持续大幅高于中国国内需求，钢铁行情就难以恢复。9月中旬，宝钢集团在广东省南部的湛江市投产了年产能达1000万吨的大型钢铁厂。当前面向家电及电子、汽车工厂集中的广东省供货，不过湛江与越南距离很近。日本的钢铁业界相关人士担心地表示，“早晚将成为对东盟的出口基地”。

在盈利状况恶化进而被淘汰之前该如何突出与中国产钢材的差异化？在无法切实感受到亚洲市场增长的背景下，各钢铁企业之间看不到尽头的竞争仍将持续下去。

中国低价团导游强制消费引发矛盾

•《洛杉矶时报》/2015.10.24

→ 最近，一名来自中国北方地区的54岁苗姓游客在香港被殴身亡。这一事件揭示出跟团旅游的某些现状，在这里，“购物直到你倒下”这话有了全新的含义。苗姓游客一事引发了广泛关注。这起事件，也许会对大陆游客加入赴港旅行团造成负面影响。

去年，超过4700万名中国内地游客赴港旅游，占赴港游客的77%。然而由于在公共场所小便等礼仪问题上的争论，以及去年持续十周之久的非法“占中”活动造成的紧张局势，大陆赴港游客人数现已有所下降。

郭俊萍（音）今年55岁，是河南省一名退休职工。她曾经感受过“免费”的港澳五日游是怎样一条艰难的旅程。她的家乡——漯河一家保险公司为这次旅行做了推广，公司员工说，他们参加过旅行，其中没什么陷阱。但她和另外24位游客刚到机场大巴上被索取了大约50美元。随后四天，她所在的旅行团被迫在一些商店里花上几个小时，包括珠宝店、电子产品店、巧克力店和化妆品店各一家。

近些年来，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导致了国内、国际游的兴旺。从巴黎到纽约，再到比弗利山庄，零售商们雇用了会讲汉语普

通话的店员，以满足中国游客狂热的购物需求。去年赴洛杉矶旅行的外国游客有650万人，其中约10%是中国游客，这使得中国成为洛杉矶的头号外国游客来源地。

起初，中国游客通常选择跟团出行，但现在，不少人都开始大胆尝试出境自助游。不过许多年纪较大或收入较低的游客还是会选择在自家附近报名，参加低成本或“零成本”的旅行团，然后便发现自己简直成了旅行社挟持的“人质”，旅行社安排他们进行购物游，并从销售额中收受回扣。如果不在指定商店购买一定数额的商品，游客们就会受到斥责，会被拒绝提供饮食，遭到暴力威胁，并被警告将无处住宿。9月有报道称，43名中国内地游客被锁在香港一家珠宝店里长达几个小时。

但现在，这种情形也许要发生极大改变。据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家旅游局日前将10家旅行社记入了黑名单，因为这些旅行社存在“违规行为”；其中5家被吊销经营许可，另外5家被“处以重罚”，受罚的还有7名导游。报道还指出，在国家旅游局收到的投诉中，强制购物在游客投诉中占据首位。官方《环球时报》则指出，发生在香港的游客被殴致死事件“证明了宰客购物团在这个市场上的猖獗”，揭示出“香港法治针对旅游市场的严重漏洞”。报道还预言说，这起事件将会“进一步损害香港在内地人心中的形象”。但另有一些评论员说，选择免费或超低价旅行团的游客应该知道，开价太低了，不可能是真的。（Julie Makinen）



香港凤凰卫视倾力打造 全球华人精品生活杂志

**《凤凰周刊》征订的读者
征阅全年《凤凰周刊》+《凤凰周刊·生活》**

可享受690元优惠，即刻节省90元

单订阅《凤凰周刊·生活》全年240元

用户可免费获得凤凰精美礼品一份！

征订热线：陈先生 0755-25934591

广告热线：张先生 0755-25469762

城市版合作：聂小姐 0755-25934586

征订传真号：0755-25934593

邮局汇款

收款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1008号荔景大厦9层

收款人：深圳凤凰生活文化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邮编：518001

银行汇款

开户名：深圳凤凰生活文化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帐号：7705 5795 9990

开户行：中国银行深圳分行红岭支行

若通过银行汇款，请将汇款收据及您的详细邮寄地址

一起寄回或传真至本刊发行部。

邮寄方式

平邮免费；挂号邮寄每本加收挂号费3元，

半年挂号费18元，全年挂号费36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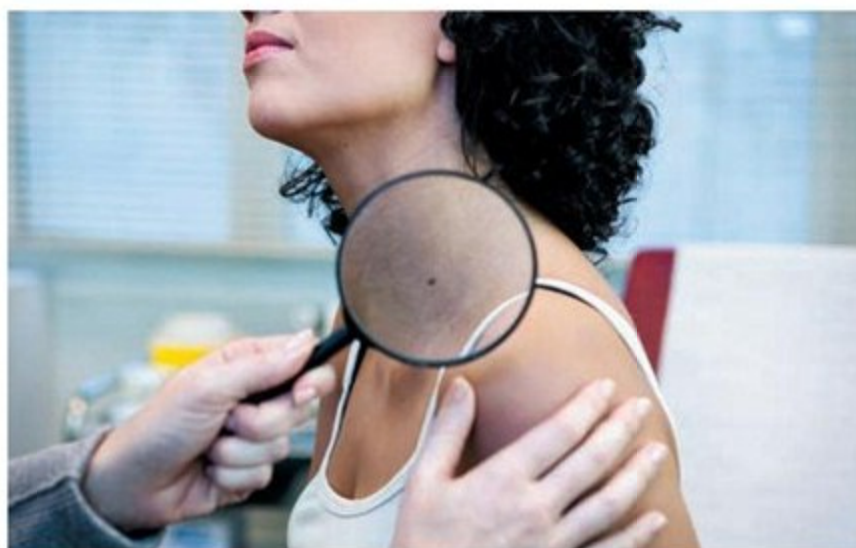
每多一颗痣 患皮肤癌几率增2%至4%

• 德国之声 / 2015.10.31

→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研究人员正研究一种新方法，让全科医生可以根据病人身上某些特定部位（如手臂）的痣的数目，迅速推断其全身的痣的数目，从而更轻易识别皮肤癌高危人士。研究人员表示，身上每多一颗痣，患皮肤癌的机会就会增加2%至4%。

科学家分析了1995年1月至2003年12月期间3500多名白人女性双胞胎的数据，发现根据她们右臂长痣的数目，能准确推断她们全身有多少颗痣。例如女性右臂上若有七颗痣以上，则有九成机会全身有超过50颗痣，如果右臂上有超过11颗痣，全身痣的总数就很可能超过100颗，预示有较高机会患上黑素瘤。男性方面，腿和背部长痣的总数也和全身痣的总数有密切关系。

一项近3000名成人接受过的



磁共振成像(MRI)扫描分析发现，随着时间推移，男性和女性的心脏老化速度有明显差异。负责研究的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人员说，这个发现或反映男女患上心脏衰竭的形式不一样，因此有需要为两性研发不同的心脏病药物。参加这个研究的人士年龄由54岁到94岁不等，没有即存

心脏病记录，接受追踪的时间长达10年。根据研究，男性和女性的主心室——即负责充盈和泵血的左心室，其体积会随着时间变小，导致进入心脏的血减少，被泵到身体其他部位的血液也会减少。研究发现，男性主心室四周的肌肉会随年纪增长而变大和变厚，但女性主心室四周的肌肉却没有

随年纪增长而变大，相反更有可能缩小。这项研究的主要研究员约翰·恩格说：“心肌肥厚、心室血液流量减少，患上与年龄相关的心脏衰竭风险就会相应增加。但按照我们的观察所得，反映男性和女性患上心脏衰竭的原因可能各不相同。”

关于孩子出生次序，社会上一直都存在这样的成见：初生儿女是完美主义者、次生儿女有外交才能、最后出生的孩子性格就比较反叛。但德国莱比锡和美因茨的研究人员最近进行了一个调查，对来自德国、美国和英国二万多名成人的核心人格特质进行分析，发现核心人格特质与子女出生次序基本上没有多大关系。研究人员发现，核心人格特质，例如性格是否外向、情绪是否稳定、个性是否讨人喜欢，以及处事态度是否严谨，都与出生次序无关。但研究却发现出生次序对自我报告式的理解力有轻微影响：初生儿女可能认识较多词汇，也较容易理解抽象概念。

中国将于2020年建造全球最大粒子加速器

• 法新社 / 2015.10.26

→ 中国将于2020年至2025年间开始建造世界最大粒子加速器，这项安装将可让科学家们能更多了解宇宙的运作。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向媒体表示，这项计划的最终概念将在2016年底完成。一旦中国完成这项计划，所建造的这个加速器至少将比由“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建造的目前全球最大加速器的强子对撞机LHC，还要大上两倍；这个加速器建造在法国与瑞士的边界。

LHC强子对撞机加速器帮

助科学家在2012年得以证实希格斯玻色子的存在。这个基本粒子被视为如同物质基础结构的基石。而恰恰就是这个希格斯玻色子成了中国这项计划的中心，这项计划所建造的加速器是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所产生出的数以百万的这些粒子比欧洲的LHC超越了几百代；LHC加速器长27公里，而中国未来建造的粒子加速器长50至100公里。

王贻芳所长解释说，LHC强子对撞机产生了希格斯玻色子，以及还有许多其他种类的粒子。而中国建造的粒子加速器将创

造出一个能单单产出希格斯玻色子的高纯度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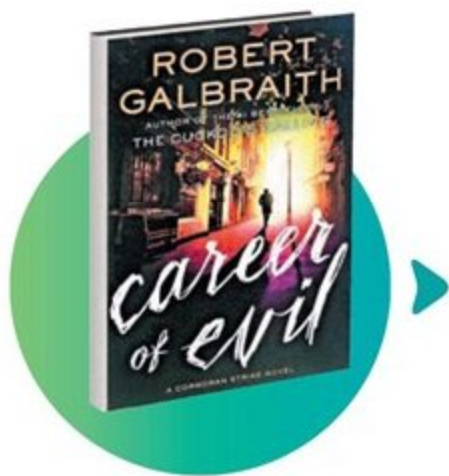
这个中国建造的新加速器所产生的能量是LHC加速器所释放能量的七倍，而LHC的能量最近才刚翻了一番，达到13TeV的碰撞能量。王贻芳还说，LHC加速器已到了能量水平的极限。似乎不可能在目前的设置中更进一步大幅增加能量。

值此经济紧缩措施导致许多已开发国家的研究计划被削减、无法具体应用之际，中国却大规模投资在基础研究，同时也进行应用；中国希望能在科学、

生物及宇宙学等领域，成为世界领头羊之一。

根据王贻芳在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网站上所贴出他在日内瓦提出的介绍文指出，中国的这项计划是从2013年开始筹划，也就是在欧洲发现希格斯玻色子后的不久开始有此打算。

中国河北的港口城市、万里长城起点秦皇岛是一个打造粒子加速器的理想地点，特别是这个地方拥有良好的地理位置。王贻芳还说，这是一个为了全世界、且由全世界一起打造的机器，并不仅仅属于中国；他还强调，外国物理学家也参与了这项粒子加速器建造计划。



李光耀与邓小平的交往秘闻

•《联合早报》，节选 / 2015.10.26

→ 从事新闻工作超过半个世纪的本地资深报人陈加昌，近日出版“历史笔记”《我所知道的李光耀》，全书22万字，共22章。本书书名虽是“我所知道的李光耀”，但内容除有关李光耀的政治生涯之外，更涉及不少这半个世纪以来的政坛轶闻、名人轶事。

陈加昌在本书前言说了撰写本书的原因，“半个多世纪来，我有着许多记者未曾有过的机会，在风云变幻的本地区巡回现场采访，见证了历史剧变。若我现在不将我所见、我所闻及我所经历的历史事件写下，我就是白做了半个世纪的新闻记者了。而且，我并不是普通的地方记者，若不书写历史，算是枉生在这个时代。”

陈加昌说，他所书写的“不是揭露秘密或暴露内幕，它是历史过程的事实记录，不是‘深喉咙’。认真来说，是‘迟来的真实报道’，不是明日黄花般的历史。我希望读者不要用文学的眼光读这本书，它不是一般文学著作，不

作任何文学加工。”本书忆述的一些“政坛轶闻”颇能引人入胜，例如第21章写到邓小平1978年11月首次访新加坡时，发生的“临时改讲稿”事件。本书写道，邓小平来到新加坡时，正是中国快马加鞭推行现代化改革政策的时候。新加坡寄望邓小平的到访会加强两国的贸易及工业合作，使得新加坡从中得到更多商机，但了解内情的人说，邓小平在和李光耀总理及内阁会谈时，却集中于政治课题，对经济并不热心。

会谈中触及最敏感的“华侨”课题时，李光耀持续强调新加坡华裔不应该被视为华侨，而是新加坡人。邓小平抵新当晚，李光耀在总统府设国宴，李光耀首先致辞，为了说明中国和新加坡的关系具有独特的地方，“他以两人身份对调的假设来阐明这个问题，他说如果他在中国生长，他将会湮没在人海里，世界观将大不相同。可是他在新加坡长大，他说他是以‘一个外人看中国和它的人民’。”话锋一转，他说假如邓

小平是在新加坡生长，中国和新加坡的历史将会大不相同。作为新加坡人的邓小平会对“过去29年来中国的有些事情迷惑不解，尤其在工业化方面刻意选择较长而不是较短的路程。”

邓小平在李光耀演讲后也受邀致辞，但他临时改动了讲稿，他首先把原先感谢的话“总理阁下刚才的友好讲话以及你们给予我们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接待”，临时改为“总理阁下给了我们热烈的欢迎和盛情接待”，不提“总理阁下刚才的友好讲话”。

本书中的“人物篇”也颇有看头，人脉极广的陈加昌书写了他在采访工作上认识的一些政治人物及其轶事。他在书中忆述前总统黄金辉说过的话，“我（后半生）很幸运，进了《海峡时报》，原打算退休后在通讯社里摆张桌子写写稿子。不久，政府召我出任驻马来西亚最高专员，之后又调到日本同时兼驻韩国大使，共十年。回来后原计划到你办公室借张桌子写回忆录，没想到，接了黄望青驻日本兼韩国全权大使职务回来，政府又要我接任新加坡广播局主席职位，前任主席又是黄望青，算是有缘。”（黄涓）

《哈利·波特》作者写了本重口味侦探小说

•《纽约时报》/2015.10.27

→ 哈利·波特最喜欢的乐队是一个名叫“古怪姊妹”的巫师组合，而他的缔造者J.K.罗琳则说自己最心爱的乐队是“披头士”。然而，为罗琳最新的小说《邪恶的事业》充当了背景音乐的，则是风格迥异、曾被称为“思想家的重金属乐队”的“蓝色牡蛎膜拜乐队”。这本书是罗琳以笔名罗伯特·加尔布雷思推出的，主角是她的王牌侦探团队，考莫伦·斯特莱克和罗宾·艾拉科特。

此小说是一个关于连环杀手的重口味故事，时常让人觉得恐怖，这个杀手喜欢把受害者切成片，切掉部分肢体作为战利品；很多章节都以“蓝色牡蛎膜拜乐队”充满不祥之兆，歌唱死亡、痛苦或“阴郁的知识”的压抑歌词作为开头。

罗琳以加尔布雷思这个笔名推出的前两部小说分别是《布谷鸟的呼唤》和《蚕》，它们当中最精彩的部分还要算是两位侦探主角——斯特莱克，邋里邋遢的退伍老兵，半是冷峻硬汉，半是擅长推理的福尔摩斯；还有斯特莱克勇敢的助手罗宾，被证明和他一样坚强聪明。罗琳曾经悉心研究过侦探类型小说，正如她曾经广泛研究从托尔金到荷马到弥尔顿在内的大量文学作品，从而创造出令人目眩的哈利·波特传奇。

罗琳可以一边推进长篇叙事，一边渐渐深入角色的背景故事，并展现过去的事情对他们情感的影响。在《邪恶的事业》中，她开始令罗宾和斯特莱克的形象丰满起来，生动具体地写出塑造了二人个性的冲突、秘密和焦虑，以及眼前这个连环杀手的案子如何勾起他们的创伤回忆。

日美拟加强太空军事联盟: 有利日本防卫

●《福布斯》网站 / 2015.10.27

→ 日本将成为一支更强大的太空军事力量。它声称,发展太空力量可以防范来自朝鲜和中国的安全威胁,同时巩固日本与美国的联盟。日本的太空相关能力是毫无疑问的。官方和高层对这方面给予的支持也无可辩驳。

尚未得到同等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日本意欲如何把集体自卫权扩展到外层空间。简单地说,集体自卫权就是使用武力保卫盟友或友好国家。日本拥有这项由《联合国宪章》规定的权利,但按照长期以来的宪法解释不予行使。这种情况已经改变。安倍内阁在2014年7月1日做出的决议重新诠释了日本的集体自卫权。

与以往不同,这次对集体自卫权的重新解释改变了日本向美

国或其他盟友施以援手的能力。具体地说,日本现在有保护美国军队的法律依据,只要它们是有利于日本防卫的。

《美日防卫合作指针》2015年4月进行修订引起的反应,展示了这些变化在美日联盟的背景下意味着什么。正如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所说,美国希望在该地区和全球以“新的方式”与日本合作。

这些新的方式尚不太明朗。日本已经稳步启动了好几件事。2008年,日本把对外层空间仅用于和平目的的司法解释从“非军事”变成“非侵略性”用途。2009年,日本防卫省表示有兴趣获得一系列用于保卫国家安全的天基能力,并表示需要与美国进行双边合作。2011年,日本与美国发



2014年2月27日,日本在鹿儿岛县种子岛宇宙中心发射了载有美日合作卫星的H-IIA运载火箭。



表联合声明,称有兴趣保护和探索太空。两国将在太空态势感知(SSA)、卫星导航系统、天基海域感知(MDA)和军民两用探测设备的使用上寻求合作。围绕弹道导弹防御(BMD)系统的长期合作也不应被遗忘,它也可用于开展进攻性反卫星(ASAT)行动。

2013年,日本实际与美国签

署了《太空态势感知服务与信息协议》。2015年,《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列明了太空合作的其他途径,谋求无缝、有效的天空保卫之道。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增强适应能力、防止损害、威慑外层空间里的威胁等主题在所有这些法律和政策变化中都有突出的体现。然而并不明朗的是,这种举动会阻止还是加剧日美两国在外层空间与中国、朝鲜乃至俄罗斯等国的敌对情绪。



2015年9月17日,在南海执行任务的“拉森”号(右)在海上接受补给。

中国“舰艇杀手”或令美军为难

●美国《星条旗报》网站 / 2015.10.30

→ 由于中国有了越来越先进的潜射导弹,中美海军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摩擦加剧所造成的风险越来越

复杂化。近日提交给美国国会的一份报告对中国的潜射反舰导弹鹰击-18进行了评估,突出介绍了上述危险,并指出该导

弹在接近目标时会加速到超音速,令敌方军舰上的官兵难以提防。

美国正在挑战中国在南中国海广大海域的领土主张。前些天,美国军舰进入中国在南中国海修建的人工岛周围12海里区域内进行了巡航,结果2艘中国军舰对美国军舰“拉森”号进行了尾随跟踪。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在10月28日提交的报告中说,鹰击-18导弹的巡航速度大约为每小时600英里(1英里约合1.61公里),略低于音速,可在距离海面仅几米的高度掠海飞行,然后在距离目标约20海里(1海里约合1.852公里)时加速到3倍音速。该委员会主席伍尔泽说:“超音速使得用舰上火炮将其击中的难度增大,也使之

成为对雷达来说飞行速度过快的目标。”

该委员会认为,一旦爆发冲突,鹰击-18的速度和射程以及广泛的部署,“可能对美国海军的水面舰艇在西太平洋自由行动的能力产生严重影响”。

这份报告是在美国军舰进入中国人工岛周围12海里之后发表的。中国海军司令员吴胜利10月29日对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森说,“如果美方继续进行这种危险的挑衅行动,双方海空一线兵力之间极有可能发生严重紧迫局面,甚至擦枪走火。”该报告表示,鹰击-18的射程约为290海里,远远超过之前的型号。鹰击-18可能会阻碍航母战斗群的推进。

□ 编辑 漆菲 □ 美编 青年



大陆中产阶级沉浮

2015年10月13日，瑞士信贷银行（Credit Suisse）发布《2015全球财富报告》称，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已达1.09亿人，超过美国的9200万人，报告认为中国已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富裕国家。

这一结论旋即引发质疑：有舆论认为，该报告仅进行绝对值的对比没有意义，因为1.09亿人仅占中国总人口的8%，而9200万人则超过美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还有观点认为，单纯对比经济收入无意义，一个人是否属于中产阶级，需要通过一个由收入、消费、职业、受教育程度、价值观等多方面标准综合起来的评价体系来衡量。

抛开种种争议，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大陆已经形成中产阶级群体是基本社会共识。由于“阶级”一词在中国语境中意识形态意味过重，官方更多愿意使用“中等收入群体”。大陆官方统计的中等收入人群数量为“近3亿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5年9月参加中美企业家投资座谈会发表讲话时就使用这一数字。

1.09亿也好，3亿也罢，在总人口数中占比仍然是比较低的。社会学理论一般认为，只有中产阶级占社会群体相对多数，形成橄榄形社会结构，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才能真正实现发达与稳定。

但目前有学者认为，大陆社会结构更接近于“土”字形。中产阶级规模偏小，且缺乏稳定性。对比西方发达国家，大陆的中产阶级面临着更为激烈的经济变化和社会变革，在就业、住房、教育、医疗和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承担着更多的压力。想要成为一名中产，需突破的关卡和付出的成本似乎更多；但失去中产的身份却相对容易。

2015年10月底，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国未来建成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已清晰可见。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也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

了解、认识大陆中产阶级的生存状况，关注成为中产阶级的晋升通道，在当前的中国意义重大。找到适合的改革方向，给更多的下层群体提供跻身中产的机会；给中产提供更多的人身、财富安全保障；制定更为公平的财富分配制度；甚至通过经济改革，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都将对大陆中产阶级未来发展产生巨大影响，也是对执政党和全社会的考验与挑战。

一个阶层的沉浮

重新认识大陆中产

记者/孙杨

2015年10月18日，直到天津港爆炸事故中受损住宅的估价报告鉴定公布近一个月后，海港城小区业主李润生（应被访者要求化名）才勉强在协议上签字。此前，由于对政府委托第三方机构评估的回购价格和赔偿政策有异议，他已多次和其他业主去相关部门协商，希望能提高补偿。

“爆炸让我失去的不止是一个房子，而是一个家，一种生活。”李润生说。爆炸前，他和妻子刚刚还清这套房子所有贷款。从河北来天津工作多年，好容易安家落户，但突然又变得无家可归的夫妻二人都觉得，政府仅仅以稍高于爆炸前的市价回购自己的住宅，远不能弥补其经济和情感上所受到的伤害。

但是，在多次协商无果后，李润生自认“耗不起了”，终于妥协签字。“又要重新寻找房子了，以天津现在的房价走势，除了搭上回购款，可能还要再贷些款。”李润生说，辛苦建立的生活一夜消失，让他开始考虑，是要继续留在天津，还是干脆回老家生活。

今年8月12日发生在天津港的特别重大危险品爆炸事故，不仅炸毁了危险品仓库周边小区内数以万计的业主们的生活，也令全国震惊。人们发现，多年辛苦打拼积聚下来的财富，也许只因一场“无妄之灾”就立刻烟消云散。

日益增多的公共安全事件只是中国社会因处于剧烈转型期而出现的隐患之一。随着近年来大陆经济增速逐步放缓，就业形势也变得日益严峻，贫富间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问题愈加突

出，上述种种均令公众的焦虑感和危机感有增无减。

此外，腐败、垄断及教育等领域的不公平现象，令一些低收入阶层感觉改变命运的机会越来越少，难度越来越大；而另一部分已经身为社会中高收入阶层的人，也因为缺少足够的安全保障，承受着巨大压力，担心个人财富和现有的生活水平，随时因为大病、股灾、突发事件等意外，或职场上的失败而被迫降级。

有海外学者研究多国案例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中下层普遍认为自己或子女跻身中产阶层机会越来越少，而中产阶层则普遍对自己的地位、财富感到不安全，那么就会影响到经济发展甚至国家稳定。

对大陆中产阶级崛起有长期观察研究的美国布鲁金斯学院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侃如认为：自毛泽东时代结束以来的体制改革使中国的中产阶级得以成长起来，但是，如果这一体制不以足够的速度继续演进，那么，这个越来越重要的社会阶层便会变成一种不稳定成分。

李侃如认为，房价飙升正在阻止人们新近加入中产阶级，医疗费用或其他紧急事由妨碍了遭遇意外者重返中产阶级的行列。

这些问题与挑战，也早已引起了中共最高决策层的重视。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正式提出了“中国梦”的重要执政理念，主旨包括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等。其中，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以及顺利迈过“中等收入陷阱”是实现“中国梦”的具体措施之一。

2014年11月10日，习近平在北京出席

APEC会议期间表示，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

“继续拓展跻身中产阶级的机会，其速度要足以让那些依然贫困的人觉得自己或孩子还有成为中产阶级的现实可能。”李侃如认为，国家继续支持中产阶级崛起和壮大，对中国未来发展与稳定至关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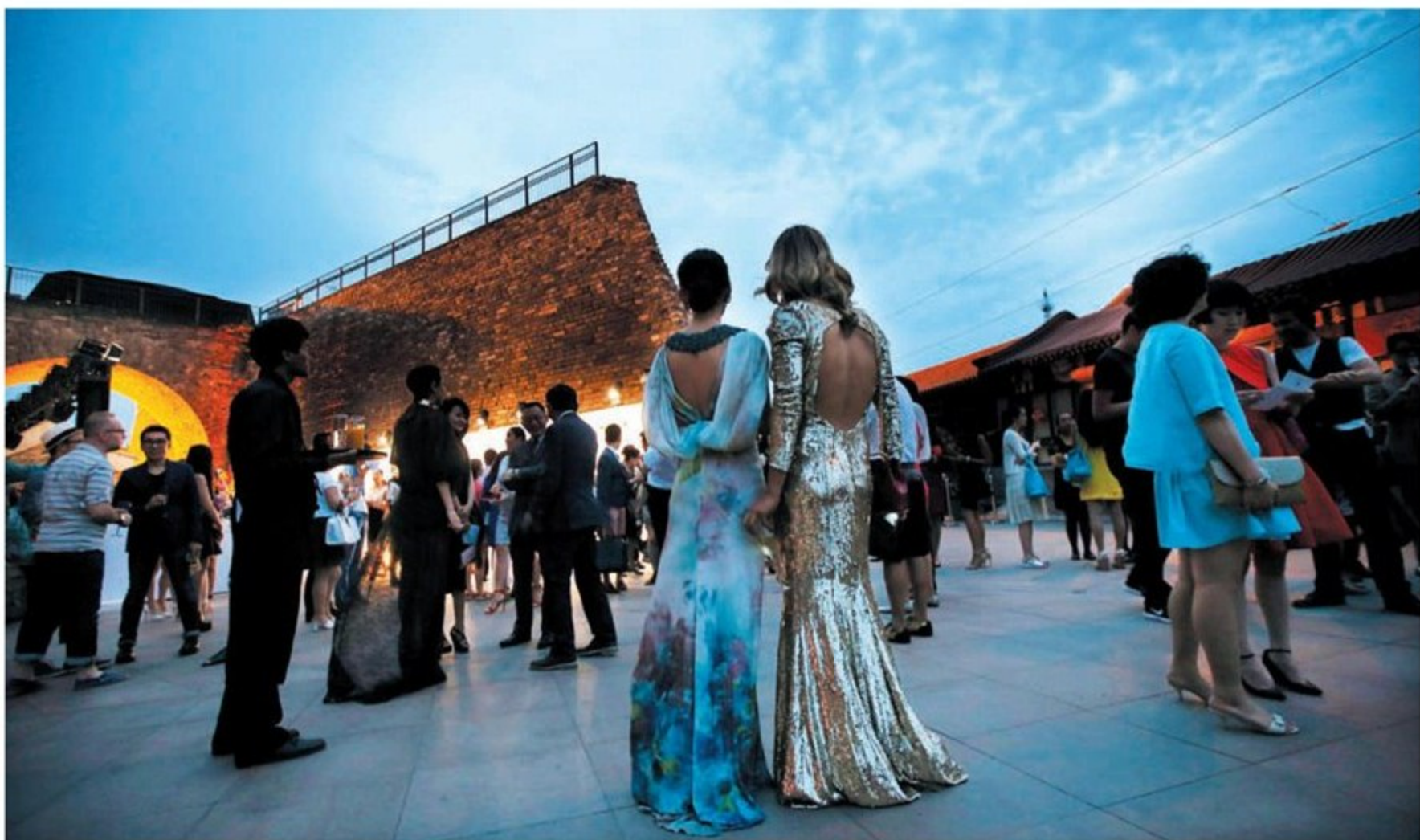
难度增大：如何挤进中产？

1985年出生的王争大学毕业后考上公务员，现在北京某市级政府部门工作。在朋友面前，他经常半开玩笑地说，自己30年的人生轨迹简直与网络盛传的“‘80后’是最悲剧的一代”里面的所有经历高度吻合。

虽然是独生子女，但是由于父母一代人口基数太大，王争也赶上了生育高峰年代，那个时候，中小学还没有提出“减负”，为了将来能考上大学，从小学起就要先努力考上重点中学，所以在他的童年记忆里，业余时间全部被奥数、作文、英语等各种辅导班填满。

好容易考上重点中学，却发现高校开始扩招，很多当年上了普通中学甚至是职高的同学，也一样进入了大学，找工作的时候又站回一条起跑线上了。

“没有赶上‘70后’们毕业包分配的年代，只好奔波于各种招聘会，但找到的工作不是高不成就是低不就。”王争说，终于听父母的劝去考公务员，被录取的时候以为从此端上了铁饭碗，结果却发现这些年，政府机关的福利也在严重缩水，福利分房自然早已取消多年，终身聘用制也改为合同制，绩



效考核、末位淘汰一样都不少，现在，连养老金也要并轨了。

最令他无奈的是，工作几年来一直在拼命攒钱，可怎么攒也赶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王争很清楚地记得，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学校附近一个著名开发商开发的小区刚刚开盘，房价是每平方米6000元。“买一套房子至少需要50万元，当时觉得简直是天价。”王争说，但自己的梦想就是毕业后能买到这个小区的哪怕一个小开间，他盘算着，如果父母帮他交了首付，自己每月收入能达到5000元以上，生活上节省一些应该可以供得起房子。

可是等他毕业那一年，该小区房价已经涨了一倍，涨到了每平方米一万二，几年来，该小区的房价一路看涨，现在已经直逼每平方米3万元。可是王争作为公务员的收入增幅，远远没有翻这么多倍。“最小的一居室也要250万元以上，别说已退休的父母无力支付七八十万的首付，就算能买下来，月供近一万元也是自己无力承担的。”王争说。

王争的无奈颇具代表性，几十年来，大

2013年6月21日，一场秋冬时装秀在北京明城墙遗址公园举办。这类时装秀出售了一种中产阶级的生活：随意，高品质，现代。

陆一直处于高速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之中，平均主义被打破，收入与职业差距迅速拉开，社会阶层分化加剧，数量巨大的底层民众为了自己或子女能够跻身中产阶层，想尽各种方法。

人们纷纷把希望寄托于教育改变人生、户口改变人生、房子改变人生，甚至移民改变人生、婚姻改变人生等方法上。以至于很多人从小到大的生活，就像通关游戏。而重点学校、重点班、名牌大学、城市户口、知名企业、中高层职位、房产证、结婚证、绿卡……就是一道一道的关卡。

还有网友总结，人生就是一场接一场的比拼。小时候拼出身、拼父母素质和眼光，上学后不仅拼成绩，还要拼人脉、学区房、赞助费，找工作要从招聘会上突围，入职后要从职场厮杀中胜出，面对婚姻这样的人生大事，还要拼老公，甚至拼丈母娘。有时候，哪

怕只有一项没拼赢，都会前功尽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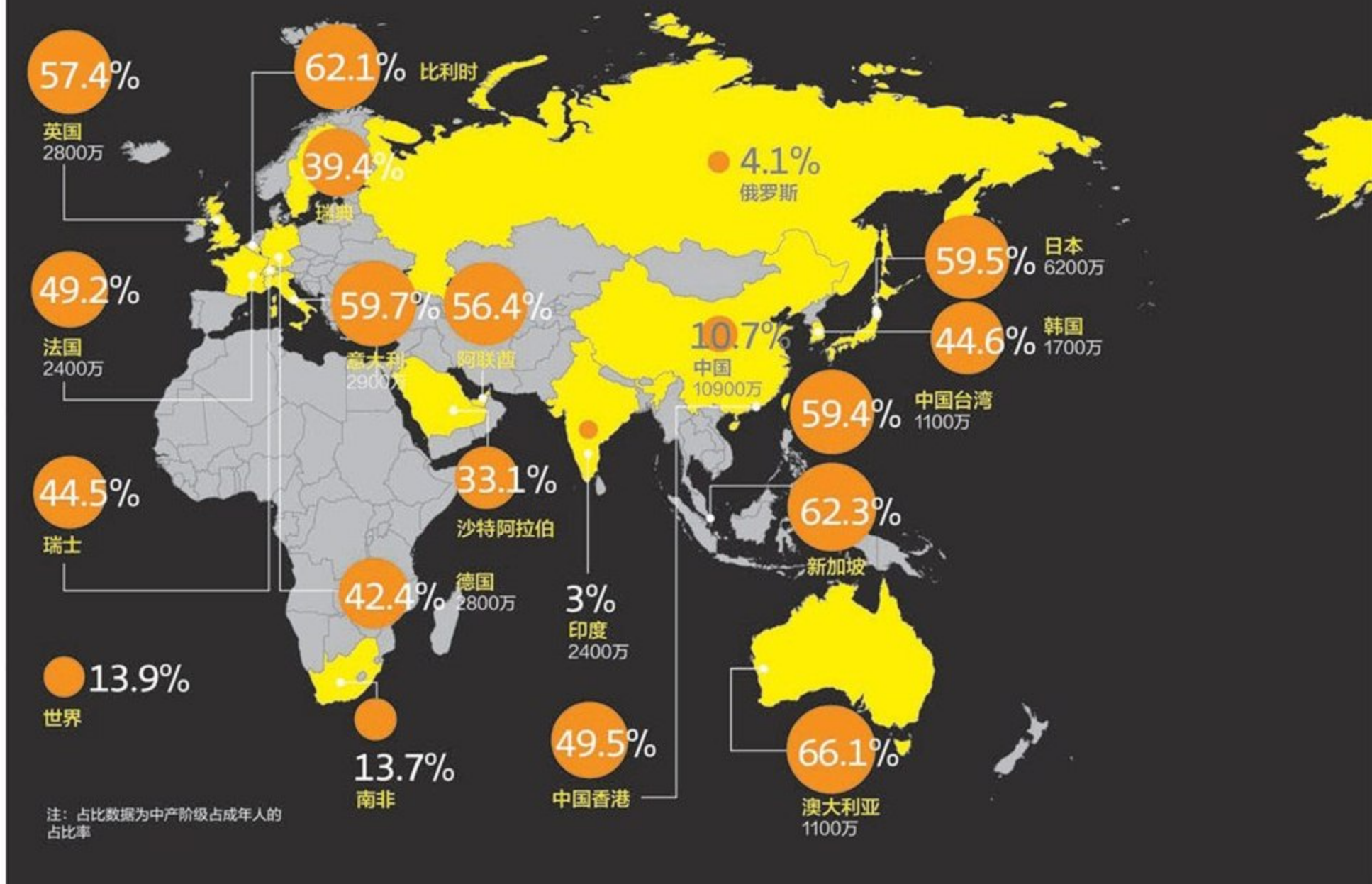
“生在大城市，知名大学毕业、工作体面又怎样？没有房子，我这辈子都不可能成为中产阶级。”王争说，现在他已经接受现实，不再做买房梦。

房子并不是中产阶级唯一的困扰。近年来，各种调查研究均显示，医疗、养老和子女教育也是中产阶级最关注的三大民生问题，更是中产阶级生活压力和焦虑情绪的主要来源。

全球知名个案研究中心益普索2014年初发布的《中国中产人群生活质量研究》报告显示，超四成内地中产阶级受访者认为，目前家庭生活成本压力大，最主要的家庭支出依次是子女教育、住房和医疗保健。62%受访者对所居住城市的教育资源与教育质量不满意，58%对城市就医状况不满，53%受访者对未来自己的养老问题感到担心。调研还显示，1/4的内地受访者未来考虑移民海外。

有媒体分析，该调查结果显示，因为社会保障不足、福利不健全、政策变化趋势不

2015年各个国家和地区中产阶级占比及人数



稳定等原因，大陆给底层民众提供的跻身中产的机会正在变得越来越少，而现有的中产阶层群体也正在面临流失问题。

学者杨继绳认为，中国社会阶层出现流动障碍主要原因包括：行政权力不受制衡，权力寻租现象严重，影响到了人才选拔的公平和畅通；户籍制度不够开放，阻碍农民社会地位的提高；教育不公平导致一些低阶层的后代失去了向上流动的机会等。另外，中国社会阶层垄断和固化的现象也日趋严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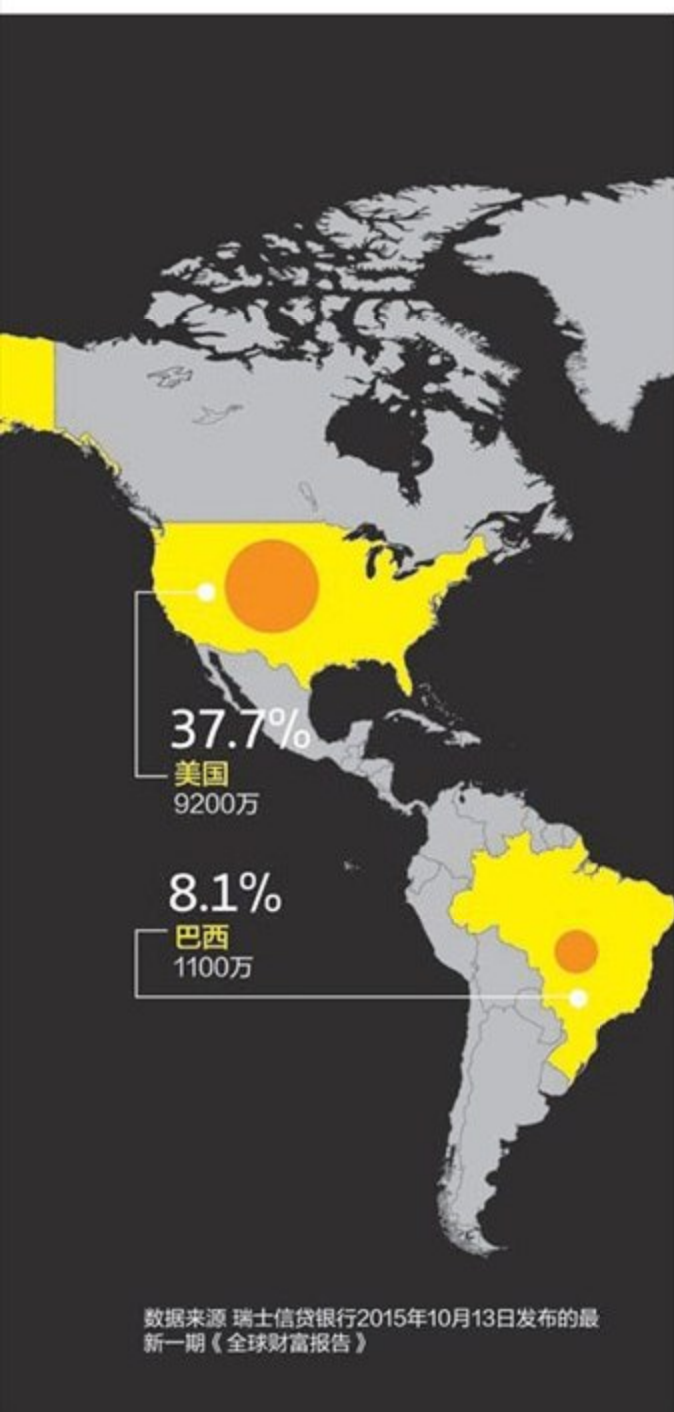
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研究发现，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大陆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是非常频繁的，一方面，大量农民进入乡镇企业或城市，虽然农民身

份尚未改变，但是收入和生活质量明显提高。城市中一部分人开始从事私营经济，有些成为最初的富裕户，一些下海的工人、国家干部，成为了或大或小的老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向上的流动。

但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阶层的流动门槛开始加高。孙立平认为，这种门槛可能是某种文凭或证书，也可以是进入必需的资本，或者是已经形成的势力范围或垄断。而中国当前社会流动门槛的提高，最重要原因是利益阶层的垄断。

其具体表现之一是，在讨论哪一个因素对个人成功更为重要时，选择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的人越来越多。也就是“拼爹”

如果一个国家的中下层普遍认为自己或子女跻身中产阶层的机会越来越少，而中产阶层则普遍对自己的地位、财富感到不安全，那么就会影响到经济发展甚至国家稳定。



越来越流行。比如上海总工会在1997年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 32.4%职工认为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对个人成功更为重要, 而只有28.4%认为自己勤奋努力更为重要。

2004年由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中, 社科院的调查显示, 父亲职业是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企业主的人, 最可能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而农民家庭出身的人进入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的比例要小得多。

6年后, 孙立平在《关于社会流动的调查随笔》中提及, 成都市人事局的调查显示, 在当时公务员队伍中, 父亲是“进城务工人员”的公务员比例最少, 仅占2.8%; 父母

是普通职工的占26%, 而父母是公务员的比例高达33.3%。

跌出中产或在一瞬间

相比向上之难, 返贫对中产阶级来说, 却始终是个缺乏防护栏的陷阱。

虽然距8月12日天津港那场令人猝不及防的爆炸事件已经过去几个月, 但直到现在, 事发地附近多个小区的居民们仍然没能从震惊中走出来。他们有的还沉浸在意外失去亲人的悲痛中不能自己; 有的虽然回迁, 但因为担心房屋质量而过得战战兢兢; 更多的则是担心危化物爆炸后会污染环境, 带来二次伤害。在他们生活半径内的哪怕一丁点反常, 例如变色的路面积水、雨后有异味的空气等, 都会让他们惶恐不安。

“从来没想到过, 一场意外就可以让多年的努力归零。那种人到中年却要一切重头开始的感觉太令人绝望了。”一位在爆炸事件中失去房子的女业主感慨。

天津港爆炸事件带来的“余震”可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几十年来, 部分地区只顾高速推进经济、严重缺乏长期规划和管理监督, 已经令当下中国进入公共突发事件的高发期。频发的意外使人发现, 很多辛苦多年积累下来的财富, 可能仅仅经历了一场意外, 就化为灰烬。

悉数近年来大陆发生的多起社会影响力巨大的意外事件, 很多背后都隐藏着中产阶级家庭陨落的悲剧。

发生在北京, 令人印象深刻的“意外事故”之一, 2012年7月21日特大暴雨。因为防灾减灾的预警机制不健全、排水系统的建设跟不上城市发展的飞速步伐, 导致广渠门桥下严重积水, 私家车车主丁志健溺水身亡。

身为某期刊编辑部主任的丁志健, 在北京打拼多年, 有车有房, 一人担负起妻女

和父母两个家庭的责任, 一场意外夺走他的生命, 也令两个家庭失去最重要的经济支柱, 脱离中产阶级群体。而一位中产的意外死亡, 更给这个社会留下了隐痛, 让中产阶级增加了不安全感。

与意外致贫相比, 因病返贫的例子则更多, 由于大病、罕见病等医保体系缺失, 医疗费正在成为中产阶级可能因紧急情况失去中产身份的重要因素。

如果说公共事故、重病, 对于大部分年富力强的中产阶级来说, 还算是小概率意外, 那么因为经济增速放缓而带来的就业、升职压力, 金融体系不健全而带来的投资理财风险, 以及子女教育投入水涨船高等则是实实在在摆在眼前。

益普索的调查报告显示, 近半数(47%)的大陆中产受访者坦承在工作方面面临的压力很大。

友邦保险2015年7月在华发布的最新一份《中产阶级愿望与梦想调查报告》也显示, 近七成(69%)大陆中产阶级把健康列为首要人生目标, 随后是“愉快的婚姻或关系”、“成功的职场生涯”、“安心无忧”和“舒适的退休生活”。

中产阶级的压力和不安全感的一个重要体现, 就是大陆居民一直位居世界前列的高储蓄率。数据显示, 2008年, 中国家庭的储蓄率为可支配收入的40%, 同一年, 美国家庭的储蓄率仅为3%。此后多年至今, 大陆居民储蓄率一直保持在40%至50%的区间。

另外一个趋势是, 越富裕的家庭储蓄率越高——根据2012年上半年, 西南财经大学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对8000多户中国家庭进行调查发现, 55%的家庭没有或几乎没有储蓄, 储蓄率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增高而增加, 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储蓄金额占当年总储蓄的74.9%。



↑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天津业主的新公寓。之前他的房子位于滨海新区“8·12”爆炸点附近。爆炸后他在距离爆炸点12公里之外买了一个房龄6年的二手房。据其透露，爆炸导致很多业主需要购新房，目前当地房价上涨了10%左右。

社会保障不充分和预期不稳定，诱导居民通过储蓄来实现自我保险，被认为是大陆中高收入群体热衷储蓄的主要原因。

中产风光难掩脆弱和焦虑

以时下流行标准来衡量，时会理应该算得上是一个成功的中产阶级：大学毕业后来京工作，经8年打拼，一度升任北京知名财经媒体图片总监，固定薪酬加上利用业余时间兼顾的商业拍摄工作加起来，每月收入可达5万至10万元，拥有东四环附近某知名中产社区100余平方米住宅，出入驾驶宝马汽车，妻子美丽贤惠，儿女双全。

“如果让8年前的我看现在的我，一定会觉得自己简直是完美的人生赢家。”坐在一间精致的咖啡厅里，时会理说，再过一个月，就是他30岁生日。“可事实是，三十而立的我，每天都生活在金钱、职场和家庭的压

力中，特别焦虑心慌。”说话时，他随手拿起桌子上的一块精致甜点放进嘴里：“好吃吗？可在我嘴里根本尝不出滋味儿。”

“当年来北京闯荡，就是为了过上今天这样的生活，可真正拥有了，却发现一点也不开心、满足。”时会理称，更多时候，自己只是人前风光，背后的辛酸无人能懂。

“你能体会我每天一睁开眼，就想到身上还背着几百万贷款，每个月不赚到5万元都觉得过不踏实的心情吗？”时会理再一次给记者算起了账。因为之前积蓄不足，他的一辆车和两套房全部系贷款购买。其中，北京的房子商业贷款190万元，每月需还1万元，分30年还清；沈阳的房子，贷款40万元，每月需还3500元，分20年还清；宝马轿车贷款19万元，每个月5000元，需3年还清。

此外，为方便接更多的业务，满足更多不同需求的客户，2015年初，他还租下一处

写字楼内的物业，投入20余万元改造成摄影棚，并购买了全套最新的摄影器材。现在，摄影棚的月租金是7500元，聘请的一位固定助理月薪则为6000元。也就是说，一个月即使什么都不做，也有3万多元的固定开销。

另外，女儿私立幼儿园的学费是10万元/年，将来儿子也计划在此就读。这意味着，两个孩子三年幼儿园需要另外准备60万元学费。

“我不敢休息，甚至不敢生病。”时会理说，因为他觉得，只要自己一停下来，所有的一切都会消失。

“有一天一个朋友突然问我，你有什么爱好吗？”时会理说，“我一下就愣住了，脑海一片空白，我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沦为一部没有感情的赚钱机器，对生活中的一切都失去兴趣，于是只好回答，我的爱好是赚钱。”

“最近，我开始特别羡慕身边的很多



↑ 2012年7月27日，北京，广渠门桥下摆放着悼念的鲜花。此前的7月21日，北京广渠门桥下积水深达4米，越野车车主丁志健不幸溺水身亡。

朋友。”时会理说，他有一位同事，家住燕郊，月赚五六千元，进城要挤2个小时的公交车，可是每天可以睡足10个小时以上；相比之下，自己每天睡眠时间最多只有四五个小时，有时候身体明明已经累到不行，但就是睡不着，脾气也变得暴躁易怒。

还有一些朋友，虽然只是时不时在朋友圈发一朵形状可爱的云、带着光晕的花，或者夕阳的倒影，但也让他异常羡慕，因为连看电影都走神的他，已经很久没有冲动去抬头看一看天，低头闻一朵花。

“如果有一天，我赚到足够多的钱，实现了财务自由，只想好好休息一个月。”时会理说，这一个月，他什么都不要去想、不要去做，每天只要无所事事地躺着发呆、晒太阳。不过，赚到多少算足够，他并没有仔细去想过。

时会理的这种心态在大陆的中高收入人群中并非个案。全球个案研究集团益普

索在2014年早些时候发布的《中国中产人群生活质量研究》报告也得出类似结论。根据调查，内地中产人群的整体幸福感评价得分仅为6.78分（满分为10分），与收入水平显然并不匹配。

扩张还是萎缩？

随着近年来大陆经济形势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中产阶级是在扩张还是萎缩，成为一个愈来愈引人关注的话题。

一方面，官方主流声音一直在表态，政府正在致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不少官方媒体也经常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中产阶级的萎缩做对比，力证大陆中产阶级正在明显增长，甚至有学者评价中国已进入中产阶级发展的黄金时期（陆学艺2010年2月11日《现在是中国中产阶层发展的黄金时期》，发表于《中国青年报》）。

但是也有一些观察人士持慎重观点。有学者提出，前两年得到迅速发展的不过是中产阶级中的一个子群，即官员和国企管理者，这种发展是以牺牲其他中产阶级群体为代价的。

甚至有观点认为，虽然没有全面的统计，但是通过各个层面的观察可以发现，经济危机造成的就业困难、金融资产流失以及高企的房价，已经造成了中产阶级的萎缩与流失。

这与大陆中产阶级的焦虑是不谋而合的：求上不能，又害怕被拖回底层。近年来的移民热潮，在一定程度上来看，就是焦虑情绪的反映：当一个人认为自己已经没希望更进一步，下一代也缺乏清晰的前景，就会图变。

因此，在经济增速放缓、就业与提高收入等均面临严峻挑战的今天，如何通过社会保障体制、福利政策、税收政策等方面做



2014年夏，29岁的时理带着3岁的女儿和再次怀孕的妻子在京郊度周末，虽然当时其月收入已达到3万至5万元，但因政策限制和积蓄不足，仍然没有能力在北京买房。

出适当的调整，非常重要。

悉数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的历次政策调整，如私营制的放开、外资企业的进入、住房制度改革、股市重开、高校扩招、城市化进程提速，物权法通过实施等，有不少新政都给中产阶级的成长营造了合适的环境，促成了中产阶级规模的扩大。

但是也有一些制度阻碍了中产阶级的继续扩大，例如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平衡、股市等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户籍制度的不够开放等。而这些，也是中国未来改革进程中无法忽视的内容。

税收政策也从细微处影响着中产阶级群体的走势。但在近年来海内外的各种统计

报告中，中国大陆的“税负痛苦指数”一直高居前列。

按照一般定义，大陆中产的标准一般为月收入1万-5万元，但根据现行个人所得税率，月收入超过8000元税率即高达20%，12500元以上则为逐级可累进至25%-45%，这种简单“一刀切”，没有考虑生活成本和家庭负担，是很多中国纳税人感觉痛苦和不公的原因之一。

近年学界倡议按家庭征收个税，可以把家庭所有成员的收入叠加，都纳入到个人所得税的计税基数中，在扣除抚养孩子、赡养老人、房贷、医疗等基本生活成本支出后，再对总收入的剩余部分征税。做到了因

人而异的纳税，这也是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通行的个税征收方式。不过，出于政府的保税需求，以及缺乏配套执行措施和人力等原因，这一方案至今仍在原地踏步。

在一些中产阶级看来，大陆近年来一系列的税费政策调整，不仅没有减轻他们的压力，反而令他们的负担愈加沉重。例如一直居高不下的消费税，以及正在酝酿、即将出台的房产税、遗产税，甚至交通拥堵费等。

以房产税为例，虽然该税收在讨论阶段被很多专家预测将可以有效打压房价，改善大陆房地产发展模式，但是已有专家指出，根据外国经验以及市场经济学原理，现阶段开征房产税，不仅不会降低房价，反而会成为房价上涨的激励机制。一方面房产税是按照住宅价格的一定比例征收，地方政府完全有动力进一步抬高地价，进而抬高房价，这样就可以多征税。另一方面，房产税的代价完全可以向下游转嫁，提高二手房购房成本或者租房者的租金。

经济学家谢国忠曾称，“中国大多数反常的经济行为都是由政府急切地寻求财政收入所推动的。”在一些学者眼中，该税种最终又将演变为压在中产阶级头上的一根稻草。

中国社会学会副主席卢汉龙则认为，为社会流动提供均等的机会，是对一个公平社会的基本要求。当机会均等时，社会可以容忍的差异也较大。在一个充满机会的社会里，人们想得更多的往往是如何抓住机会，改善生活，而不是别人拿了多少、拿得是否公平。而公正程度最差的社会则导致劳动人民极少获得，甚至完全没有改善生活的机会。

卢汉龙认为，打造公平的阶层流动渠道，特别是制造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是中共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减小贫富差距的最有效办法之一，也有利于中国乃至世界未来的稳定发展。




Biemlfolk
比音勒芬

中国国家高尔夫球队指定品牌

公司官网: www.biemlf.com 全国服务热线: 400-113-2228



关注比音勒芬官方微信

中产阶级的界定标准



年龄

20岁至60岁（以“60后”、“70后”、“80后”为主）

20-60 岁



受教育程度

接受过高等教育
（至少拥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



收入

60000-500000 元

家庭年收入6万元至50万元（且收入中至少有1/3可自由支配，即一定的消费能力）

工作所属行业在社会声誉较高的、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是中产阶级的主力。

具体分类：

经济群体（私营企业主、主管、个体商人和农民企业家；外资企业中高层雇员、管理人士）

专业人士（医生、律师、教师、工程师、技术人员、金融、房地产业从业者、媒体从业者等）

体制内群体（政府官员、公务员群体；国企中高层员工、从事管理工作的员工）

文化群体（学者、公共知识分子、演艺人士、艺术家等）

职业



其他指标

生活在城市里；至少拥有一套住宅；一辆10万元以上私人汽车；至少相当于3个月收入以上的固定存款，有股票等金融投资产品，有退休保障、有医疗保险，子女有享受良好教育的机会；每年有假期

资料来源 本刊记者依据大陆官方及学术界主流认可的标准综合整理

大陆中产崛起 对中国乃至世界意义重大

文/李成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5年9月22日至28日访美期间发表的一系列公开讲话、演说,在海内外影响非凡。

有媒体在盘点成果时发现,保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扩大中等收入人群比重;集中力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国梦”等话题多次在习近平的演讲中出现。

而习近平做出的“目前中国的中等收入人群已经接近3亿人,预计在未来十年内还将翻番”的表述,也再度引发世界对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和消费能力的关注和兴趣。

在影响中国发展的多股力量中,我们有理由认为,从长远来看,没有一股力量会比中国中产阶级的迅速崛起和急速增长更有意义的了。

大陆中产阶级或已达 3 亿

迄今为止,中产阶级这一概念在中国大陆仍然是存在争议的,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官方、学者和媒体普遍使用“中间层”、“中等收入群体”等词汇替代。而中产阶级的具体标准是什么,也尚没有形成人们普遍接受的标准。

实际上,这并非中国特有的问题,而是困扰各国研究者的难题。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中产阶级都难以用一个单一的标准界定。这一方面是由于中产阶级自身一直在不断地变化中,随着时代的变化,十年前的定义自然不适用于今天;另一方面,每个国家发展水平不同,也导致具体标准的不尽相同。

总体来讲,被各国引用较多的衡量标准

是世界银行曾作出的一项测算,即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每日可供消费的资金在10美元至100美元之间的群体

在中国大陆,被较多人认可的中产阶级定义来自前社科院学者陆学艺、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春玲等学者经调查研究形成的标准,即中产阶级需要以收入、职业、消费以及自我认定等多方面标准综合界定。

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些没有工作和月收入的人,因为出身中产阶级家庭,或通过炒股、继承等隐性收入达到中产阶级的标准;一些人从收入标准来看已达到中产阶级水平,但是并不用来消费,而是储蓄起来。他们

李成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主任,现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理事、美国国会美中工作小组学术咨询班成员、以及百人会会员。2009年,主持编著了《“中产”中国》,是第一部有关中国中产阶级的英文学术专著。



不属于中产阶级尚存争议,而这也是为什么中产阶级不应该单凭某一方面的标准来判断,而是需要一个综合性的界定的原因。

习近平在访美期间参与中美企业家投资座谈会时曾表示:目前中国的中等收入人群已经接近3亿人,预计在未来十年内还将翻番——这一数字与陆学艺在2010年的研究几乎一致。

据陆学艺测算,2010年,中国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人口占比23%,即约2.47亿人。随着经济发展,这一群体将以每年就业人口1%的速度扩大,加上股票、房地产等因素的影响,2015年,这一群体比重预计将达到3亿人。

不过,在公众的印象里,中产阶级的标准更多时候是由商业界而不是学术界界定的,因为他们日常生活中接触更多的是广告宣传、公关活动以及媒体报道。

2000年以来,包括大型外资企业、合资银行、咨询公司等越来越多的商业机构开始承认大陆中产阶级的存在,并且认识到这一群体的崛起将会带来巨大商机。

正在由分裂转向趋同的中产价值观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历程,现在,中国的中产阶级已主要包含有三类人,一是经济领域的精英;二是政治领域的官员、公务员;三是文化群体,包括教师、艺术家等。这三个群体社会地位、情感各不相同,有些立场、诉求甚至是相悖的,甚至社会上还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很多中产阶级也不认可自己的身份。以至于一些学者和研究认为,中国中产阶级尚没有如西方国家中产,

形成较为统一的群体形象及价值观。

实际上,在中国中产阶级群体中,是存在一些共同的价值观的,也就是说,他们的部分核心利益是相同的。

首先是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对中产阶级来说,私有财产既包括个人财富,也包括私有企业,还包括私有财产。

其次是对教育的认可,从恢复高考到高校扩招,大陆中产几十年来的迅速壮大,离不开教育普及的作用,而保障子女接受良好教育的权利和机会,也是当前中产阶级的重要需求。

另外,对腐败的深恶痛绝,要求破除行业垄断等,也是绝大部分中产的一致诉求。

虽然到目前为止“中产阶级”一词在中国还具有一定的争议,但是可以看到,随着经济发展,社会整体意识的改变,中产阶级统一的价值观也在逐步形成中,而中产阶级这一身份标签,也在逐渐被接受的过程中。

不难发现,近年来,一些媒体、官方、半官方机构,也已经开始越来越多地直接使用“中产阶级”,而不再像以往,隐晦地以“中等收入群体”、“中间阶层”等词汇代替。一些原本回避中产标签的人,也开始慢慢接受这个身份,甚至引以为傲。说明中产阶级的形象和地位都在逐渐上升。

中产崛起对实现“中国梦”至关重要

最近,习近平在访美期间所做的演讲《中国梦是人民的梦》被媒体纷纷关注并转载。习近平在演讲中表示,发展依然是当代中国的第一要务,中国执政者的首要使命就是集中力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为此,我们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就是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在稍早前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习近平还表示,目前中国“中等收入者比重在提高”,中国在“今后一个时期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有基础也有条件”。

习近平在外交场合的公开表述,充分体现了中共领导层对中产阶级崛起的支持和重视。

当前,中国正在面临经济转型,转型成功的一个最关键性因素就是消费,只有消费才能促进内需,而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在拉动内需方面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

近年来,海内外商家一直在致力营造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中产阶级消费市场”这

一概念。可以理解,刺激起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内需这一前景,会让商界怦然心动。

确实,站在全球角度来看,中国中产阶级的壮大,将可能成为拉动世界经济的新引擎。而对于中国国内民众来说,中产阶级的崛起,对实现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也至关重要。因为说到底,“中国梦”的实质就是要促成中产阶级的发展,让更多贫穷人口进入中产阶级的行列中来,实现共同富裕。

在今天,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多国都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两极分化会令富人和贫困阶层的矛盾日益激烈,最终成为难以把控的社会隐患。而中产阶级的发展与一国贫富差距变化密切相关。

很多国家的经验显示,中产阶级的崛起





中国正在面临经济转型，转型成功的一个最关键性因素就是消费，只有消费才能促进内需，而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在拉动内需方面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

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日益加大的贫富差距，令富人和贫困阶层的矛盾得以缓和。不过，也有一些国家出现了令人担心的相反情况，随着贫富差距的日益加大，中产阶级开始萎缩。然而，各个国家国情不同，中国最终将呈现哪一种结果，将非常考验执政者的智慧。

另外，西方国家也普遍存在着一个顾虑，那就是中国中产阶级的壮大是否会成为全球资源的挑战，是否将以环境污染作为代价。有学者甚至担忧，世界已经无法承受一个在能源需求和消费等方面始终追赶美国的中国中产阶级了。

上述种种矛盾的心态意味着，在全球学者眼中，中国中产阶级崛起的意义早已远远超出了经济学范畴，不仅关乎政治、民生，甚至可以影响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形象。

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中产阶级一方面在这个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发挥着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紧跟跨国文化潮流，改变着中国与国际社会打交道的方式。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都必然会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重要影响。

中产崛起带来的挑战亦不容轻视

近年来，不断有研究报告和媒体调查显示，大陆中产阶级是生活压力最大、最为焦虑的群体，这说明，中国社会在短时间内高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一些制度缺失和社会问题，中国大陆急剧变化的紧迫感令追求稳定、安全的中产阶级倍感压力。

一些压力最终转化为了群体诉求。这也是为什么在大陆很多地方，群体聚会、抗议

以及其他呼吁行为层出不穷的原因之一。

在国外，社会保障、环境污染、公共安全等一直都是中产阶级的主要议题。而在中国，也已经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中产加入了表达诉求的队伍中。这些诉求的主题包括对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的不满；对腐败的深恶痛绝；对环境污染、公共安全、法治建设的关切等。

但是，如果有人担忧，中产阶级的崛起将会对既有的社会制度和政府管理形成挑战，进而成为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因素，其实是大可不必的。

在大多数时候，中产阶级扮演着社会发展中一个稳定的力量。很多西方发达社会能够保持政治稳定性，中产阶级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因为从本质上来讲，富裕、稳定是中产阶级的主要诉求，面对社会发展中的问题，这一群体普遍希望渐进的变革，而不是暴力的革命。同时，中产阶级呼吁的法治与民主化建设，也都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制度。

而对中共政府来说，未来想要继续扩大中产阶级群体的规模，最大的挑战之一，是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将金字塔形社会变为真正的橄榄球形社会，避免重走部分拉美国家的老路。

在这方面，美国的经验值得借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国内经济、国际局势等一系列变化，美国也曾出现贫富差距增大、中产阶级锐减的趋势。为了遏制社会两极分化，美国对多项公共政策做出方向上的调整，例如在国内重视发展新兴经济、新兴产业；在全球，积极推进经济全球化。正是这些举措，最终令美国服务业、金融业等诸多行业得到升级改造，亦令美国经济重新崛起。

（采访整理 记者 / 王衍 孙杨 实习生赵梦媛对本文亦有贡献）

中产流变

“土”字形社会中的大陆中产

记者/孙杨

住在东三环与东四环之间的小区，开Mini Cooper上下班，去国贸或新光天地购物，周末约上闺蜜喝下午茶、去京郊散散心，每年至少一次出国旅行……

“这就是我理想的中产生活，也是我现在的生活。”今年32岁的李舒是北京一家生活类媒体的部门负责人，她举着手中英国作家的畅销书《hello 中产》称，这是其最近每晚的睡前读物，虽然该书是吐槽英国中产阶级标签化生活的，但“里面提到的生活方式和高档品牌都是我向往的”。

不过，过上“中产阶级生活”的李舒并不认为自己是真正的中产阶级。因为房子是父母出钱买的，车子是自己贷款买的，而维持上述水平的日常开支几乎等于她月收入的全部，也就是说，她没有任何积蓄。

李舒有一个在公关公司工作的男友，收入相似，但家境普通。“我们感情很好，只是每次一提结婚生子就会卡壳。”李舒说。在她看来，成家后就不能再做“月光族”，就要学着节俭，还要为子女教育、家人保障做长期理财计划，“生活质量肯定会降下来”。

和李舒住在同一小区、收入更高的同龄人王波也不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在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工作的他，有房有车有积蓄，但是没有时间享受生活。

“加班到九、十点钟是家常便饭，有时一个月有半个月在外地出差，回到家累得只想倒头就睡。”王波说，在他心目中，中产阶级不必透支健康和时间去换金钱，生活质量很高。

李舒和王波在北京属于“中高收入群体”，但他们却都认为，自己离中产还很远。他们的反应并非个例，在《凤凰周刊》记者

的采访过程中，很多高度符合中产特征的受访者在面对“你觉得自己算是中产吗？”的问题时，要么不自信地反问“你觉得呢？”要么忙不迭地摆手否定。

这个有趣的现象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媒体所关注。虽然近年来“中产阶级”这一词汇伴随着商业广告和媒体报道越来越多地出现，但它还是一个让人感到遥远和模糊的术语，很多经历过“阶级斗争”年代的人，甚至对这个词汇感到恐惧和避讳。中产的标准是什么，谁是中产阶级，远没有在大陆民众中形成共识。甚至在中产阶级内部，也严重缺乏身份认同。

在一些社会学家眼中，这是因为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中产崛起的环境不同，身份构成更复杂，价值观也更分裂，尚且无法形成统一的形象和社会认同。“混杂的成分与多重的认同是中国中产阶级的特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教授李春玲如是评价。

从避忌到承认

回溯中国大陆百年历史，20世纪上半叶，“中产阶级”作为一个舶来词，仅在少数城市中流传。成员包括“富民阶层”、“工商阶层”、买办、民族工业资本家、专业人士、学者、艺术家和政府官员。

对其时的中产阶级，大陆民众更多的认知是来自毛泽东1925年所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文中认为，中产阶级就是民族资产阶级，亦敌亦友。

1949年中共建立政权后，土地革命和工业化进程开始，随着计划经济和平均主义的配给制度建立，中产阶级全面退出历史舞

台，有的被当做敌人打倒，更多的则被并入无产阶级队伍，按照当时的意识形态，全国只有三个阶级、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令体制再一次大转弯，市场经济开始出现，非国有经济比例逐年提升，职业类别越来越丰富，收入分配和社会地位差距拉开，各阶层也打破平均开始分层。

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20多年间，中国发生了急剧的社会分层流动。根据李春玲对中产阶级的调查研究数据显示，56.5%的人在进入中产阶级前，从事蓝领职业。

但是对于一个曾长期处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中的民众来说，“中产阶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被当做“敏感词汇”极少被提及。

不过，这并不妨碍社会上出现其他具有时代特征的替代性称谓。例如，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人们普遍将当时出现的一批以农村工厂主、乡镇企业老板为代表的农民企业家，以及城市里的个体户称作“万元户”。

随着外资经济在全国范围内的兴起，人们又将在外企工作、从事脑力劳动、收入较高的国人称为“白领”，将他们对舒适生活、物质享受的追求总结为“小资”的生活方式。

2000年以来，房地产、金融等专业领域的繁荣及互联网的兴起，造就了新一批高收入的专业人士，“新富阶层”一词诞生。

至于舆论环境更为宽松的网络世界，网民们的想象力则更为丰富，多年来，不仅创造了“高富帅”、“白富美”这样高度概括的词汇，还戏谑地将高收入、高学历、高社会地位的人称为“三高人士”，而其中的女



性则被称为“白骨精”，即高级白领、业务骨干、行业精英的简称。

相比民间称谓的形象、直接，官方用词虽然严谨，但对这一群体的称谓也发生了几次变化，代表了一个国家对中产阶级的定位和认知正在逐步改变。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产阶级尚没有官方称谓。媒体及专业人士在提到收入和生活水平较高的人群时，普遍引述邓小平的话语，将其称为“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或实现了“小康生活”的人。

2000年起，“中等收入者”开始成为官方对中产阶级的婉转表述。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开，首次在报告中正式提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该表述被舆论解读为：意味着中共决定将“培育中等收入阶层”作为明确的政策目标。

自此，收入分配改革开始成为政府工作重点之一。2006年，收入分配改革目标被确定为“提低、扩中、调高”。其中，“扩中”即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

虽然至今，大陆官方仍然没有在书面上正式使用“中产阶级”一词，但是“中等收入群

2014年9月2日，上海奥迪展示厅内选车的顾客。中产阶级拥有汽车，一般不是指有没有汽车，而是指是否拥有较好品牌的汽车。

体”、“中间阶层”等词汇被提及的越来越频繁，“中产阶层”、“中产阶级”等也开始不时地出现在官方与半官方人士的口头表述中。

2007年12月，身为当届政府中海智囊团要人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在国务院新闻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开表示：预计到2020年，中国中产阶级占总人口比例将过半。

2012年3月，社科院社会学所主持“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研究的课题组长陆学艺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称，“现在是中国中产阶层发展的黄金时期”、“所有的工业化国家在经济起飞时，都是中产阶层大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也不例外。”

最模糊的边界

瑞士信贷银行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中，另一个争议点是其对中国中产阶级的界定标准。

该报告以美国当地拥有5万至50万美元

财富（按2015年年中的价格计算）的基准来界定中产阶级，然后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购买力平价价值系列，按本地购买力计算，得出其他国家的等值中产财富范围。按照这一标准测算，中国中产阶级财富拥有额约为17.5万-175万元人民币。

报告将中国社会的“中产阶级”定义为：月收入4.5万元人民币，年收入在50万元以上；除稳定的收入，还要有百万元级的资产，以及还要有房、有车、有社会地位等。

这一标准与大陆官方的统计口径大相径庭。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课题组曾在2005年发布《中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探究》，将大陆中等收入群体的家庭年收入标准界定为6万元-50万元。该报告据此推算，2005年中产占城市人口5%，到2010年将增至14%，到2020年将增至45%。

不过，这两份报告的标准都遭到公众的质疑。很多人认为，中产的收入标准应该是一个地区人均收入的平均值或比平均值稍高。以“两大一小”的三口之家为例，年收入6万元相当于夫妻两人每人每月收入为2500元，这在大部分一二线城市中，都属于中低收入群

体,温饱尚可满足,但很难有余力像人们心目中的中产一样,追求舒适与享受的生活。而月收入4.5万元,在当下大陆任何一个地区,都属于高收入水平,绝对不是社会中游。

实际上,梳理各国的中产阶级标准不难发现,如何界定中产是一个很普遍的难题,即使是在被公认为是中产阶级国家的美国、日本等,中产阶级也是一个相对模糊、含混的概念,特别是经济收入与消费标准,不同研究者站在不同的角度给出的统计口径宽窄不一。

但是,在上述国家和地区,中产阶级的概念却都因多年的普及深入人心。以至于社会上对这一群体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整体认知,“富裕”、“稳定”、“传统”以及“受过良好教育”、“注重生活质量”等都是中产阶级标签。

而在中国,由于人们对中产阶级身份的认识和接受程度不高,导致标准更为模糊。即使仅仅从经济收入角度衡量,除前述瑞信的报告以及国家统计局的研究外,还存在着各式各样的数据与结论。

美国商业杂志《福布斯》在2010年为中國中产阶层做出的定义是:生活在城市里,25到45岁之间,有大学学位,专业人士和企业家,年收入达1万-6万美元。

同年,前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陆学艺在其著作中表示,根据全国范围的大规模调查,自2009年起,中国中产阶级已占总人口的23%,其中,北京、上海等大型沿海城市的中产阶级已占40%。

2011年,由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对中产阶层的统计进一步宽松,报告称,到2009年我国城市中等收入阶层规模已达2.3亿人,占城市人口的37%左右。北京和上海的中等收入阶层规模较大,分别达到了46%和38%。

由此不难看出,不同的调查报告结果

相差很远,一方面是因为各家的统计口径不同,一方面是由于经济发展太快,很多社会指标在不断更新。

实际上,那些认为大陆中等收入群体已经超过40%的研究,几乎可以肯定是高估了中国中产阶级的数量。按照世界公认标准,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属于中产阶级国家的几条重要标准包括:这个国家的中产阶级是否超过40%的比例;城市化率是否超过七成;基尼系数是否控制在0.25至0.3之间等,很显然,DGP全球排名100之外、城镇化率刚过50%、基尼系数0.469的中国,并不属于中产阶级国家。

此外,由于中国大陆的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发展水平和收入差别太大,为中产阶级定一个全国通用的标准是不可能的。例如,一个月收入5000元的成年人,如果生活在三线城市和小城镇,已经可以高枕无忧。而如果是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可能只是刚刚迈过了温饱线。

同时,仅凭收入水平判断中产阶级在中国大陆还有另一层尴尬,任何人都不难发现,同样月入5000元,“体制内的”如公务员、事业机关职工等与“体制外的”如私企员工生活水平,也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土”字形社会里的大陆中产

尽管定义难准确,但中产阶级的很多标志还是十分明显的。中国社科院研究院朱迪认为,“追求个人快乐和舒适的倾向在中产阶级的日常消费、品位和物质欲望中非常明显。”

因此,在商家眼里,消费水平和消费文化才是判断中产的硬指标,越来越多的媒体也似乎更愿意通过各种商业数据更直观地观察中产。

信用卡的普及一直被认为是中产阶级崛起的标志之一。在美国,信用卡的出现和

流行曾一度被认为帮助催生了中产阶级和消费主义文化。而在大陆,2003年,全国信用卡发行数量仅为300万张,但是到2008年年中,已经超过1.32亿张,到2014年,更达到3.91亿张。有观点认为,大陆成为全球银行卡业务增长最快、发展潜力最大的国家,有赖于中产阶级的壮大。

私家车的数量也被认为是衡量中产阶级人数的有利标准。一个流行的说法是“每辆私家车的背后都站着一个中产阶级。”统计数据显示,私家车保有量在大陆的增长正越来越快,1990年,全国只有240万辆私家车,到2003年已达到1219万辆,2010年,更高达7000万辆,而截至2014年,私家车保有量已经超过1.2亿辆。

判断中产阶级数量的消费指标还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分。除了房子、汽车、金融产品等大额消费品外,购物中心的数量与营业额,健身房、美容店、SPA中心、酒吧、咖啡厅的数量和上座率,甚至苹果产品、进口红酒、有机食品等的销售量都成为关注重点。

不过,即使收入与消费已成为当今大陆判断中产阶层的最主要方式,但是在很多社会学家看来,这还是与真正的中产阶级定义相去甚远。有社会学家指出,中产阶级不应是一个经济名称,而是一个社会名称。判断中产阶级,还需要很多软指标。如受教育程度、职业、精神追求和价值观等。

在这方面,西方的界定标准显得更为全面和科学。

以美国为例,“专业上受过教育、政治上温和、经济上自信”是社会普遍认可的中产形象。具体的评价体系一般包括:稳定的住房、医疗、子女受教育的机会、受教育程度较高、从事脑力劳动、社会地位较高的职业、合理的退休及职业保险、以及可满足度假和休闲爱好条件的薪水。

2000年-2010年 中国社会结构变化对比▼

资料来源：清华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李强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测算而出

欧洲发达国家也通常采用一种包括教育资源、职业和收入的综合指数作为标准。

此外，在上述国家，因为中产阶级的观念较为普及，发展历史较长，所以这一群体均已形成了较为统一的形象气质、社会精神以及价值观。

“世界其他地区中产阶级的许多表征——广泛存在的公民组织、一种特定的社会精神、对于体制自身价值所持的基本的保守主义态度，还没有成为中国中产阶级的主要特征。”李侃如说。更多时候，人们还是套用美国的标准衡量自己，而这也是很多人认为自己“被中产”的原因。

如今，中国的社会学家也开始制定更为全面的中产界定标准。李春玲认为：应该用四项标准界定中国中产阶级，即职业、收入、消费和自我认定。

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宛丽则为“中间阶层”总结了更为细致的七项指标，包括一定的知识资本及职业声望资本；从事以脑力劳动为主的职业；对其授权管辖的工作对象拥有一定的调度、支配、控制权，对其上司及其业务安排有一定的建议权、发言权；收入及财富水平；具有中等以上国民教育学历水平、具有专业技术培训资历及掌握相应的职业专业技能；有能力支付其中等水平的家庭消费；以及对社会公共事务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等。

在所有根据职业对中产阶级做出的统计中，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的报告是最有说服力的研究结论之一。2015年5月25日，李强公布了由他根据2000年第五次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对比而产生的中国社会结构变化趋势图。

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在2000年以前，中国社会中下层或下层比例、数量巨大，工人、农民、农民工占据了社会群体的主要比

农民群体 ▼

农业从业人口、农业户籍人口、外出打工群体

63.20%

46.49%

体力劳动工人 ▼ 群体

工业、制造业体力劳动群体

9.8%

13.58%

技术工人群体 ▼

11.2%

9.8%

其他白领群体 ▼

管理人员、专业人员、经营销售群体和普通办公室人员

2.9%

13.34%

例，而中间层弱小，中产明显缺失。但是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却显示，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比例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十年间，中国已经由倒“丁”字型社会逐渐向“土”字形社会转变。

首先，由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传统农业劳动者2010年占比46.49%，与2000年的63.20%相比减少了16.71%。而工业、制造业的体力劳动者在2010年占比13.58%，2000年时则为9.8%，上升了3.78%。这个群体属于最为典型的体力劳动工人，是生产一线的直接操作工人。这一比例与很多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相近，虽然是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推动力量，但不属于中产阶级。

被看作是一个社会中的准中产阶级的技术工人略有变化，2000年曾占比11.2%，2010年为9.8%，下降了1.4%。

至于社会公认的中产阶级群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白领群体中，管理人员、专业人员变化微小，但经营销售人员和普通办公室人员增速惊人。由2000年占比2.9%升至2010年的13.34%，增加10.44%。

包括营业人员、各类销售人员、办事员、普通办公室职员等在内的经营销售人员和普通办公室人员，多属于白领中下层，而他们正是中国中产阶层10年来变化最大的群体。

根据这一数据勾勒出的图形，李强认为，整体来说，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中的底层群体出现了明显的向上流动的趋势。中间层的某些群体主要是中下群体，有所扩大。但是，从总的社会结构图形看，大体上还是属于底层比较大的社会结构特征。虽然中产阶层的某些群体有所扩大，但是，整体社会结构还没有根本改观，中产阶层在全社会中仍然比例较小。如何扩大和稳定中产阶级，依然是未来大陆发展中将长期面临的重大考验。

中共整肃“秘书腐败”

《省部级领导干部秘书管理规定》旨在限制秘书的隐性权力，并杜绝官员与秘书形成长期的命运共同体。

记者/张弛

10月16日，为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后的首次中央纪委通报，周本顺、杨栋梁、潘逸阳、余远辉等4人被“双开”格外引人注目。不仅一日内“双开”4名省级高官是首次，而且通报中首次提到“违规选用秘书”。

巧合的是，除潘逸阳外，其余3人均与秘书相关。通报中直陈，杨栋梁“违规选用秘书”、余远辉“违规任用亲属担任秘书”。而周本顺曾任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秘书长近10年。“违规任用亲属担任秘书”的余远辉也曾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秘书长。

“秘书”溯源，原本只是掌管典籍或起草文书的小吏，但在中共体制内却被赋予更多含义，其对大陆政治生态的影响亦不容小觑。秘书从属的领导干部大都是部门、地方或单位的“一把手”。官场有“欲见领导，先求秘书”之说，有向领导反映情况或请示批复者，能否上传或见面都由秘书安排，这种隐性权力往往成为一些秘书弄权敛财的途径。

高官秘书们大多神秘、低调，但社会对这个群体的关注度一直居高不下。以此为原型创作的官场小说，除了2013年的《秘书政治》，还有此前颇为畅销的《二号首长》等。而十八大后，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落马，再次将高官秘书置于聚光灯下，民间甚至一度出现“秘书党”的说法。

秘书提拔“紧箍咒”

有大陆媒体报道称，中共有关秘书管理的最新规定是2014年中央下发的《省部级领导干部秘书管理规定》。据中组部相

关人士证实，该规定旨在限制秘书的隐性权力，并杜绝官员与秘书形成长期的命运共同体。

依据新文件规定，以往秘书们“直接提拔当领导”的现象有望得到遏制。新规明确要求，省部级及以上领导配备秘书必须经中组部同意，秘书不能直接提拔转岗，官员调任新职不能将原来的秘书、司机带走。

“秘书不能直接提拔转岗，意味着秘书转岗只能是平级调动”，该人士解释。至于究竟离开秘书岗位多久才能提拔，文件并未给出明确期限。

根据中纪委通报，“违规选用秘书”属于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前述人士透露，中共高层早已注意到秘书选用存在的问题，之前也曾经试图规范，但实际执行情况并不理想。以致十八大后中央“打虎”，“秘书腐败”一度成为高频词汇。据公开报道，截至目前，仅省级秘书长就有约30人落马。

“领导秘书必须要组织配备，其实并不是新精神，一直以来都是这么要求的。”该人士称。曾给李鹏当过10年秘书的吕聪敏在《外交人生》一书中透露，外交部干部司在接到中组部的调令后，才派人通知他

专职秘书很难接触实务，平时干的都是些沟通、联络的具体事务性工作，某种程度更像“护士”，直接提拔转岗当领导独当一面，就是要“护士”去当“医生”，显然不合理。

本人尽快办手续。当时负责通知他的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司长刘华秋告诉他，李鹏同志需要一个外事秘书，部里认为他去比较合适，并强调这是组织决定，不是征求他的意见。而他本人，事先对此一无所知。

《凤凰周刊》记者接触到的多位省部高官秘书，也不乏这种经历：基本都是组织谈话通知，询问本人意向，很多人事先并不知情。偶尔，也有官员拒绝组织选配人选的情况发生，但官员并不能直接指定秘书人选，至多会根据工作需要划定一个范围，比如，我需要一个懂外事的秘书，或者我需要一个懂专业的秘书等等。至于具体人选，仍然需要组织调配。

早期关于高官秘书配备有据可查的文件，是1986年中办、国办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县以上领导机关秘书工作人员管理的规定》。其中一项条款，“领导同志的秘书，应由组织部门会同领导同志所在部门的办公厅（室）审查调配。领导同志也可推荐，但要经过上述部门审查同意，个人不得指定自己的亲属和不适合做秘书工作的人员担任秘书。”

2010年3月，中办颁布实施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指出，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有八种情形之一的，将追究有关领导干部和人员的责任。其中特别提到“要求提拔本人近亲属，或者指令提拔秘书等身边工作人员的。”同时，该文件强调，对“违反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规定，导致用人失察失误，造成恶劣影响的”，将追究党委（党组）主要领导干部或者有关领导干部的责任。

2010年4月，中办又印发《党政领导干

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事项报告办法(试行)》,重申领导干部的秘书等身边工作人员提拔任用的,在作出决定前应当征求上一级组织(人事)部门的意见。2013年6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亦明确,“不准违规配备秘书”。

而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曾多次在公开场合重申严明组织纪律,其中之一就是规范领导的秘书。2014年4月,《人民日报》海外网刊发文章,是1990年3月习近平与地县办公室干部谈心时的一篇讲话稿,主题就是谈秘书工作。习要求秘书不自恃,“不能认为‘机关牌子硬、领导靠山硬’而有所依仗,有恃无恐”。

“潜规则”盛行

但规定是规定,在实际执行中有时会走样,秘书配备也一样。2014年7月,中组部课题组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官员为“留后路”违规提拔秘书等“潜规则”盛行。一旦“老虎”落马,其曾经的秘书也应声倒下,已经成为大陆官场的规律。

据陆媒披露,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先后担任过胡乔木、陈云秘书的全国政协委员朱佳木,曾被记者问及如何看待“秘书腐败”问题,朱的回答是,“秘书出问题,领导也有责任。”他还说,现在很多秘书干的事,是他们当年不敢想象的。

10月2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消息称,周本顺被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周本顺曾在周永康主政中央政法委期间担任秘书长,落马前官至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一度被认为已安全着陆。

秘书长、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副主任,都被坊间视为“大秘”。在此之前,周永康的其他6个秘书,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四川省文联原主席郭永祥、中石油天然气集团原副总经理李华林、中油国际原副总经理沈定成、中央政法委办公室原副主任余刚和公安部警卫局原正师职参谋谈红,均已落马。

其他高官秘书中“胆大妄为”者也不乏

其人。“河北第一秘”李真、“上海第一秘”秦裕,都曾经“名震全国”。新近引起外界关注的,则是10月8日落马的福建省省长苏树林的秘书。就在苏落马前的9月30日,福建省委组织部发布了一则任前公示,现年33岁的孙健,福建省政府办公厅秘书处处长,拟提任副厅级领导职务。孙健此前曾担任苏树林的秘书。

颇具盛名的“明星官员”仇和,其与秘书先后落马,前后只隔3天。他的秘书谢新松,时任云南省昆明市委常委、副市长,跟随其长达20年之久。据陆媒披露,谢悟性很强,对仇的所思所想拿捏很准,善于运作且颇有文采,深得仇的器重并屡屡被委以重任,不断提任要职,两人关系已远超正常范围。

此外,根据1980年中办《关于中央领导同志机要秘书工作的暂行规定》要求,只有正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才允许配备专职秘书。但在大陆很多地方,不但市县领导,甚至连乡党委书记、镇长都有事实上的专职秘书,只是对外叫法不同。配备专职秘书成为一些人显示领导身份的一种标志。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表示,党政机关应只有工作秘书,如今却有些秘书给领导办私事,如帮着接送孩子、买机票,这是不正常的。据陆媒报道,在中央“八项规定”等一系列新规发布后,多地都发文要求陆续清退“专职秘书”。

“秘书腐败”或终结

一位与省部级官员秘书多有接触的官方人士对此持支持态度。他认为,专职秘书很难接触实务,平时干的都是些沟通、联络的具体事务性工作,某种程度更像“护士”,直接提拔转岗当领导独当一面,就是要“护士”去当“医生”,显然不合理。

但更多人支持新规的出发点,则是出于限权考虑,“不能否认秘书中确有优秀分子。但必须划定底线,不然他们太猖狂了”。

“辛辛苦苦做三年,升官发财在眼前”,说的就是领导秘书。秘书虽然没有名义上的权力,但因其直接服务对象是领导,被认为

是领导“身边人”、“自己人”,拥有巨大的隐性权力,坊间更称其为“二号首长”。

在中共体制中,因为占尽左右权力的资源,秘书历来是升迁捷径。一些曾任秘书的落马领导干部,都有被“火箭提拔”的经历。如前面提到的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曾有过十年秘书经历,期间从一名部委办公厅助理调研员,一路升迁为正局级干部。

现实中,被选为领导秘书时大多会“官升一级”,但均不用经过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程序,也不属于“破格提拔”。有级别的秘书“外放”时,再“官升一级”的现象亦比较普遍,且多数属于跨部门或异地任职,同样规避了很多选拔任用方面的程序和监督。而一些有私心的官员在离任前,会想方设法把不带走秘书安置好,以便自己的权力或影响力得以延续。

有观点认为,秘书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共体制中派系争斗的存在。官员存在不安全感,必须使用信得过的秘书。此外,在官本位的大环境下,官员的能量远不限于纸面规定的权力范围。而权力运行不公开,无论是官商勾结还是为官员亲属谋取利益,或者是跑官买官,都需要信得过并且熟悉政商关系的人去操作,最好人选自然就是秘书。利益共同体其实还是比较客气的说法,严重的甚至会形成一种准封建式的人身依附。

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要杜绝官场中的山头主义。秘书和官员,本身就是个小团体,是山头派系的核心和萌芽。再加上官员信得过的下属、亲人,以及秘书的关联人员,这形成了山头派系的骨架。

这种情况下,新规被视为破除“秘书腐败”的杀手锏。省部级官员配备秘书必须上报中组部,这就将高级官员的秘书任命收归上级。秘书不能直接转岗,意味着高官的秘书直接转任地方领导成为了历史。官员调职后不能带走原有秘书、司机,这是打散山头派系的抽薪之策,杜绝了官员和秘书形成长期的命运共同体。●

道协“大管家”王哲一轶事

王哲一曾著文强调，人应该少私寡欲，正确对待金钱、地位。但现实生活中的他却非常爱钱，“喜欢搂一把”。

特约撰稿/解轶鹏 记者/张弛

“宗教界首虎”国家宗教事务局副局长张乐斌落马仅月余，又一宗教界官员落马。

《中国纪检监察报》10月24日发布消息称，中国道教协会原秘书长、党支部书记王哲一被立案调查，因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王哲一之前曾在国家宗教事务局任职，与张乐斌是同事。2008年，王哲一任宗教事务局一司副司长时，张乐斌是该局办公室主任。据陆媒公开报道，二人2010年3月曾一同到北京龙泉寺视察工作。

身在道教协会的王哲一并非道士，而是中国道协的“高管”，属于管理宗教事务的官员。

中国道协成立于1957年，其成立初衷是民主管理宗教，因而其组织机构均仿照国家政治体制建立。道协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全国代表会议，理事会是全国代表会议的执行机构，下设会长、副会长和秘书长。

秘书长是道协的“大管家”，具体主持日常工作，包括执行各种会议的决定、主持办事机构开展日常工作等，可谓“实权派”。

中国道协第八届理事会中，秘书长王哲一是唯一的官员，会长任法融和14名副会长均为宗教人士。道协理事会今年6月完成换届，经选举产生了第九届理事会领导班子，王哲一未获得连任。当时已有传闻其可能“有问题”。

喜欢钱，爱发黄色短信

王哲一的公开简历在网上查不到，其详细工作经历也没有公开。现在能够了解到

的是，他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和中央民族大学民语系。在担任道协秘书长一职前，他至少从2004年起就已经在国家宗教事务局工作。2008年，他曾担任国家宗教事务局一司副司长职务。根据官方网站，该司具体负责佛教、道教相关事务工作。

担任道协秘书长期间，王哲一在北京白云观内办公。白云观是中国道协所在地，殿宇精美，气势恢弘。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王哲一的办公室是一间平房，坐落在白云观中一个颇为偏僻的位置，光线昏暗，也没有华丽的外观。

从其公开发表的多篇学术文章中，不难发现王哲一近年来遍访宗教名胜。他时不时地有感而发，撰写一些触景生情的怀古文章，尽量表现出儒雅风度的一面。他曾在一篇名为《道教文化在当今时代的价值》的文章中强调，人应该少私寡欲，“道教主张正确对待金钱、地位，反对因贪婪而迷失本性。”

但就这一点来看，王哲一的修行显然未到位。据一位与他有着颇多接触的宗教研究人士回忆，“这个人其他还好，就是太喜欢钱了”。该人士透露，他对王哲一的印象其实相当不错，觉得他符合体制内精英官员的一些基本特征，“工资低，权力大，平时为人、工作都不错，但喜欢搂一把”。不过，他也坦陈，因为大多是在公开场合见面，很多通报中涉及到的事情，“事前一点也看不出来”。

与人们对于宗教人士的想象不同，作为管理宗教事务的官员，王哲一并不“仙风道骨”。据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透露，她曾与王哲一合作推广某道教胜地

的旅游项目，王哲一邀请她到北京白云观中找“大师”看面相。当时，她见到一些身体有缺陷的人，用自己的“神力”给她算命。这位女士告诉《凤凰周刊》记者：“虽然知道他们看的面相并不准确，但看得出来，这是王哲一结交合作伙伴、拉拢官场人士的惯用伎俩。”而在工作往来之外，已婚的王哲一竟然不时发送“黄色短信”对她进行骚扰。

“现在回想起来，王哲一存在个人作风问题似乎并不太令人意外。”这位女士称。虽然该女士的描述尚无更多信源印证，但《中国纪检监察报》曾引述通报称，与巡视组谈话的很多干部职工及宗教界人士，均表达了对王哲一在“个人作风”等方面的看法。

个人作风有伤“道风”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王哲一此次被查，系巡视发现的线索。今年5月，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巡视组开展内部专项巡视，巡视单位包括王哲一之前任职的国家宗教事务局一司和中国道协。

根据通报，巡视反馈的措辞相当严厉，包括存在党务工作和业务工作“两张皮”现象，重业务轻党建情况比较普遍。党组织对党员干部的监督管理不到位，对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批评教育不够、谈话提醒不够。有的单位队伍风气不正，一定程度上存在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现象，领导班子不团结，关系错综复杂，内部管理混乱，等等。

而对于王哲一的不满，早就在道协内部发酵，很多人对他的政治素质、工作能力及个人作风提出意见，并向巡视组反映了其涉嫌违纪的问题线索。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

王作安对巡视组的决定表示支持，用他的话说，巡视组“一针见血、切中要害”。这样的评语被认为是给王哲一的问题定了性。

查询陆媒对于王哲一的报道，其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今年6月1日。当天，香港道教联合会主席梁德华一行44人赴京参访，中国道协副会长张继禹和秘书长王哲一会见并宴请客人。从时间上推断，6月换届时，王哲一应该已经被查出问题，因而未能实现连任。

对于王哲一的业务能力，陆媒也多有质疑。据微信公号“政知圈”披露，在2014年的一段专访视频中，有王秘书长介绍中国道协基本职责的内容。但令“政知圈”惊讶的是，尽管从事与道教相关工作已超过10年，在谈及这样的基本常识时，王哲一竟然全程念稿。

6月28日，中国道教协会九届一次常务理事会议通过意见，对道教界作风建设提出了新的标准和要求。意见称，道教协会和宫观负责人作为道教事业的带头人和骨干力量，是道教社会形象的标杆，其道风好坏影响着道教的健康传承，要求中国道教协会驻会领导要带头加强组织意识和集体观念。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似有所指。

王哲一的“朋友圈”

宗教界官员在公众眼中，承担着更多的道德责任，毕竟他们是“离神更近的人”，这也使得宗教界如果出现腐败现象，比其他部门的腐败更容易引发公众不满。

但今年以来，宗教界并不太平。9月22日下午中纪委发布消息称，在国家宗教事务局担任了5年副局长的张乐斌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在团中央工作期间，张乐斌与令计划有8年的交集，且绝大部分时间，令计划都担任张乐斌的直接领导。

更早些时候，少林寺方丈、全国人大代表、佛教协会副会长释永信也被实名举报涉及腐败，国家宗教事务局、中国佛教协会曾于7月30日就“释永信网上被举报”一事作出回应，称已要求河南宗教事务部门协调

对于王哲一的不满，早在道协内部发酵，很多人对他的政治素质、工作能力及个人作风提出意见，并向巡视组反映了其涉嫌违纪的问题线索。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对巡视组的决定表示支持，用他的话说，巡视组“一针见血、切中要害”。



王哲一

了解核实有关情况。但目前官方对于释永信被举报一事始终未有正式说法。

之前曝出丑闻的“伪道士”李一，也曾在中国道协副会长任上待过两个月。有传言称，“道长李一”的师傅并不是“道人”，而是官员，时任宗教局一司副司长的王哲一就是其中之一，正是在他这样的宗教界官员帮助下，李一才在质疑声中当上了副会长。但此传言并无确切信源证实。

还有与王哲一交集颇多的原中国道协副会长张继禹。今年6月换届时，已连续三届担任副会长的张继禹不仅没有连任，连理事会理事也不再继任，所谓“一撸到底”，而他今年仅53岁。正当大家还在好奇到底发生了什么的时候，8月29日新华社发布公告，称张继禹已经不再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也相应终止。据陆媒披露，张继禹与张乐斌关系相当密切。

在中国道协，张继禹是老资格。1986年道教协会第四届理事会时，年仅24岁的张继禹被选为理事。他在道教内地位也很特殊，出身道教世家，是道家创始人正一派祖师张道陵的第六十五代裔孙。

在道教研究方面，张继禹也颇有建树。除了担任《中国道教》主编一职，他还撰写并参与编撰了很多道教著作，并主持了道教经典总集《中华道藏》的整理点校。

据微信公号“政知圈”援引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齐晓飞称，早在王哲一担任国家宗教事务局一司副司长期间，张继禹和王哲一就已熟识。当时二人共同来找他，希望借陕西楼观台修缮竣工之际举办一个大型祈福法会，希望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提供支持。

查询公开报道，二人交集也不少。去年2月，中国道教协会召开第三届国际道教论坛第一次筹备工作会议，就是张继禹主持，王哲一出席；9月，中国道教第六届玄门讲经暨东岳论道活动在山东泰山灵应宫开幕，二人也共同出席。但目前未有更多细节披露。

市场还是管制？

网约车管理新规激辩背后

记者/赵福帅

10月10日，中国交通运输部出台《关于深化改革进一步推动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稿要求网约专车车辆变更为营运性质、兼职司机需考出租车从业资格证，允许各地对专车采取数量和价格管控，并要求网约平台在全国各地申请行政许可。

内地舆论场迅疾爆发并延烧激烈争议。

10月15日晚，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组织研讨会，北大国发院教授周其仁、张维迎及来自交通运输部、国务院研究室、国家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几位学者、官员参会发言，交通部官员在会上直呼“被审判”，原定21:00结束的研讨会，激烈争论到22:30。

无界智库和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则在组织十余位各界人士研讨后，集体上书国务院，建议暂缓制定《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该建议书认为，规章大量条文违反上位法，存在法外设定权力、没有法律法规依据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监管思路存在方向性错误，仍然用监管传统出租车行业的思维监管网络约租车；将严重遏制新兴行业发展；除非进行系统性重大修改，否则不应出台。

该规章所涉当事公司滴滴出行也投书交通部，建议给兼职司机和车辆留出发展空间，以“政府管平台，平台管专车”的方式管理网约专车，为地方探索网约专车发展和管理留出空间。

代表传统出租车行业利益的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同样向交通运输部致函，呼吁公正评价传统出租行业为社会做出的积极贡献，维护行业市场公平正义，警惕资本行为，杜绝扰乱行业市场正常秩序。

征求意见稿涉及出租车改革、私家车盘活、公共交通治理，涉及创新创业与新兴产业发展，涉及各群体生存利益，更直指权力与市场对决。

一叶知秋。本轮激烈论争可说是中国各方力量经过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短暂沉寂，围绕改革开放的第一次全面交锋。在大

陆经济节节下行背景下，类似交锋恐将不断上演。

要不要数量管制？

在交通运输部及相关人士看来，为防止交通拥堵、防范安全隐患、维持市场秩序，需要网约专车车辆变更为营运性质、兼职司机需考出租车从业资格证、允许各地对专车采取数量和价格管控等。

交通运输部党组成员兼运输服务司司长刘小明引用了一组数据，“高德公布二季度北京、广州、杭州、深圳四城市拥堵指数，在已经限购、汽车保有量增长3%-5%情况下，拥堵指数比去年上升13%、15%、17%、11%。他们认为专车是重要因素。所以这不是单一问题，少数人对交通资源过度消费，却让全体市民承受负担。而且交通没有良性发展，你有再好的专车坐在里面也开不动。”

周其仁则认为，专车恰恰与中国发展公共交通、缓解拥堵的方向一致。公共交通的主要敌人不是出租车，而是私家车。中国需要大规模投资公共交通，但很难一步到位。由于各种原因，私家车仍在不断增长，道路越来越拥挤。

“网络约车这时真是天下掉下来的解决方法。因为司机不是全职，能调节交通峰谷，提升城市出行效率。专车会抑制私家车购买或上路。因此，它跟传统出租车及其他公共交通不是相互冲突，而是相互补充。这是交通部最应该考虑的。”周其仁说。

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在致交通部函中称，网络约租车出现了无证非法经营、人员把关不严、安全不能保障、引发行业冲突、违反市场



经济基本规律和规则等一系列问题。函件强调,政府应坚守“私家车不得营运”的底线。

刘小明说,“一个良性的市场是不是就是放任不管的市场?要管就要有方法、有门槛,设置门槛是一种约束,也是一种保护。”

张维迎对此不以为然,“要求网约车重新注册成运营车,仅这一条就可以把平台公司全消灭掉,因为没一个人愿意转变。难道非改成运营车才能保证安全吗?我看现在质量最差的网约车,也不比出租车质量差。”

滴滴出行公司也告诉《凤凰周刊》,滴滴平台上75%的司机每天接单数不超过4单,属兼职性质,有效满足了城市交通的峰谷落差。滴滴出行希望政府给兼职司机和车辆留出发展空间,将管理人员和车辆权力下放给网约车平台,以“政府管平台,平台管专车”方式,共同制定准入门槛和监管标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能力,放开专车数量和价格控制,以满足群众多样化出行需求。

打压创新?

目前中国传统经济发展路径已无法延续,需要“互联网+”等新形态进行结构调整和转型。在中央高层反复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情形下,本次推出的意见稿恰是中国政府部门是否真正尊重创新、敬畏市场的试金石。

工信部电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副总工程师何霞就指出,政府监管有两个目标:保护消费者利益,促进产业发展。

“如果简单加以限制,就无法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新交通业态包括网约车在全球都是迅猛发展。我们希望有非常开放的政策,引导和促进产业发展。现在的政策还是有一些修改余地。”

国家发改委城市中心综合交通研究院院长张国华更批评不能回到计划经济手段,

“互联网+到哪儿就‘乱’到哪儿,但对这种不确定性应该怎么看?难道要回到过去吗?整个社会要鼓励大家去冒险、去创新,而不是墨守陈规,甚至用计划经济的手段将其扼杀在萌芽中。”

刘小明反驳说,交通部绝无打压创新之意。“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次改革释放一些改革红利,更好服务百姓出行,促进城市交通良性发展。”

直接参与本次部门规章制定的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出租车管理处处长王秀春提醒各方,征求意见稿实际对创新留出了发展空间,“交通部在暂行办法中是留了缺口的,比如对真正体现共享精神的顺风车、拼车,我们在办法中目前没有详细的规定。”

国务院研究室工业交通贸易司司长唐元则认为应讨论的核心问题不是网约车,而是传统出租车。

在唐元看来,网约车有一系列好处,可以盘活汽车资源,缓解出租车供需矛盾,减少自驾或搭黑车需求,在解决出行难的同时,遏制了私家车过快增长,增加就业机会,实现节能减排。相反,传统出租车行业则问题突出,这是网约车与传统出租车之争的根本原因。加快出租车行业改革,才是解决网约车问题的关键。

恰恰是政府对出租车牌照进行数量控制、特许经营,导致了乘客、司机、业主、政府四方都不满意的结局。“司机工作艰苦,份子钱重,是现代‘骆驼祥子’。居民出行难,行业屡发事端,严重影响政府形象。部分以高价购买牌照的业主,由于投资大,份子钱不足,网约车又打破了垄断经营,使得牌照大幅贬值,对网约车最不满意的还是牌照业主。”

唐元认为,出租车行业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建议抓住时机解决改革问题,核心是取消特许经营。而且网约车的出现使得特许经营的条件已经不存在。出租车行业的管理应当从过去政府高度管制的机制,转向更多依靠市场供求决定出租车的数量、价格和从业人员的机制。

暂缓颁布?

在讨论中,全国律协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委员汪涌建议,意见稿经过充分修改后再出台也不迟。“良法善治。好的法律才能达到

好的治理。如果规则不好,不仅达不到立法者的初衷,还会滋生各种意想不到的问题。”

不过,刘小明认为不能再“让子弹飞”了,“在中国环境下,一旦事情发展到一定程度,集中爆发的时候,再管就很难了,政府治理的社会成本就更高了。我们已经了解到个别城市,有普通司机为了开专车,花20万甚至更多买一辆车,将来一旦被踢出去,损失惨重。”

王秀春也透露,上海方面曾与交通部沟通,在现有法律法规下,上海能做的试点内容非常有限,所以需要推出全国层面的法规规章。

“即使必须立法,也应该优化立法机制。”汪涌指出,现有的立法机制是部门立法,每个部门都尝试用法律的方式把自己的势力范围划分出来。如果不能真正简政放权,把人减下来、将部门撤掉,就会产生基于部门利益而巧立名目,从而导致网约车新业态被拉回到出租车管理体系的怪现象。

刘小明对此反驳,“我们这次是代表国家来起草文件。工信部、发改委、工商、质检等部门都参与了研究。政府监管必须要取得综合管理最大公约数,尤其要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最前面。而且过程中我们听取了方方面面专家的意见,包括周其仁老师也有参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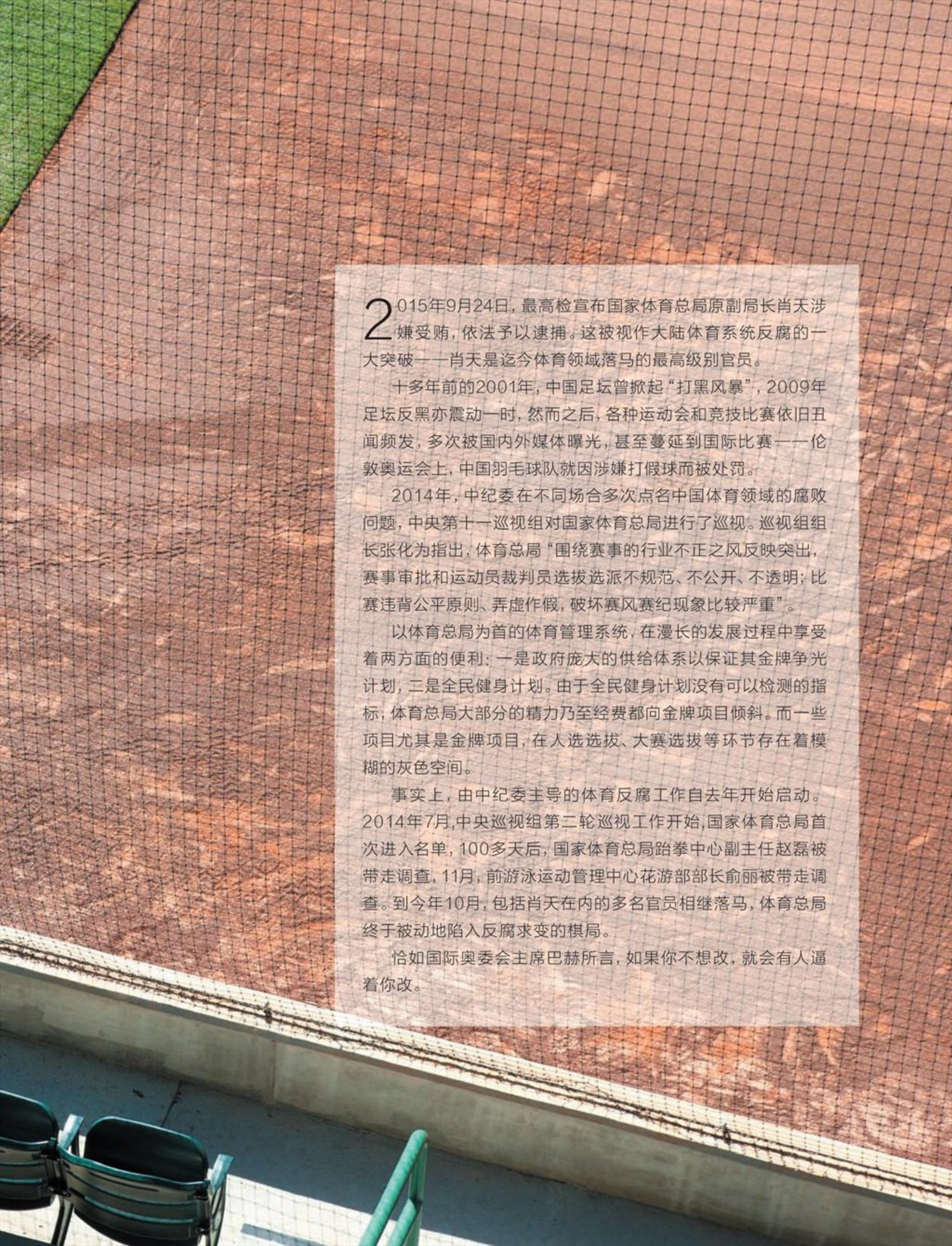
周其仁认为,中央应出台框架性文件,鼓励各个城市试验,经过一段时间,进行全国性的交流总结,同时委托学术界、新闻界进行第三方评估。

“现在的文件在小范围内就这么大情绪,如果轻易发出去,搞不好会更乱。又冒出大量黑车你管得住吗?除非把公安部放进去。现在还没到火上房的程度,可以先让市长们着急,交通部着什么急?”周其仁说。

刘小明在会议最后表示,“听了大家的建议我还是蛮困惑的,我们现在做的法规,其实是给了专车一个合法的地位。当然我们今天来真诚听取各方的意见,我觉得每个意见都值得我们去研究。”

“清污”进行时





2015年9月24日，最高检宣布国家体育总局原副局长肖天涉嫌受贿，依法予以逮捕。这被视作大陆体育系统反腐的一大突破——肖天是迄今体育领域落马的最高级别官员。

十多年前的2001年，中国足坛曾掀起“打黑风暴”，2009年足坛反黑亦震动一时，然而之后，各种运动会和竞技比赛依旧丑闻频发，多次被国内外媒体曝光，甚至蔓延到国际比赛——伦敦奥运会上，中国羽毛球队就因涉嫌打假球而被处罚。

2014年，中纪委在不同场合多次点名中国体育领域的腐败问题，中央第十一巡视组对国家体育总局进行了巡视。巡视组组长张化为指出，体育总局“围绕赛事的行业不正之风反映突出，赛事审批和运动员裁判员选拔选派不规范、不公开、不透明；比赛违背公平原则、弄虚作假，破坏赛风赛纪现象比较严重”。

以体育总局为首的体育管理系统，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享受着两方面的便利：一是政府庞大的供给体系以保证其金牌争光计划，二是全民健身计划。由于全民健身计划没有可以检测的指标，体育总局大部分的精力乃至经费都向金牌项目倾斜。而一些项目尤其是金牌项目，在人选选拔、大赛选拔等环节存在着模糊的灰色空间。

事实上，由中纪委主导的体育反腐工作自去年开始启动。2014年7月，中央巡视组第二轮巡视工作开始，国家体育总局首次进入名单，100多天后，国家体育总局跆拳道中心副主任赵磊被带走调查，11月，前游泳运动管理中心花游部部长俞丽被带走调查。到今年10月，包括肖天在内的多名官员相继落马，体育总局终于被动地陷入反腐求变的棋局。

恰如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所言，如果你不想改，就会有人逼着你改。

能吏肖天“贪塌”录

多年来，肖天在业界名声颇佳，被视作擘划中国体育未来的学者型官员，随着他的落马，人们逐渐看到他阳光形象的另一面。

记者/郭天力 李克难

说起肖天，宋木顺立即来了兴致。今年78岁的宋木顺依然生活在蚌埠五中教师宿舍区，他退休前在五中担任体育教师，肖天是他最得意的学生：在校时成绩优秀，毕业后功成名就。即使此时肖天已从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这一省部级高位跌落，亦并未影响肖天留给宋木顺的美好印象：学习努力，尊敬师长，官至部级仍感恩中学母校，善待故友。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肖天的确是少有的理论型体育管理人才。他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不仅体育专长过硬，也颇有文化素养，口才尤其出色。大学毕业后，肖天直接进入国家体委工作，还曾在中央党校取得哲学专业研究生学历。他工作中的言行，与一般体育官员相比，多了些儒雅之风；与人交流时也充满自信，脸上标志性的微笑也让他看起来颇具亲和力。所以，即便他在2009年

济南全运会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陷入“爆粗风波”，仍有人站出来为他辩解。

他是统揽全局的官员，也是擘划中国体育未来的学者——这是一般人眼中的肖天。

然而，随着体育界反腐力度的加大，作为中国体育决策层的国家体育总局成了反腐的重心。2015年6月25日，中纪委官方网站的一条新闻震惊了体育圈：数次带队出征亚运会、奥运会的学者官员肖天，被贴上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标签。

肖天曾经是家乡蚌埠的骄傲。他的猝然落马在家乡蚌埠掀起了阵阵涟漪。次日，蚌埠本地媒体《淮河晨报》在一个不起眼的位置报道了这位乡党落马的消息。而他当年的师友，则连连用“想不到”来表达惊诧。在互联网上，一些多年前关于肖天的网帖被重新翻出，与多年前的赞美和骄傲相比，网友们而今更多是叹惋和疑虑。

9月24日，最高检宣布对肖天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并依法逮捕。与此同时，中纪委亦宣布，因肖天严重违纪，对其施以“双开”。肖天违纪的内容包括干扰、妨碍组织审查，订立攻守同盟，转移赃款赃物；违规安排其妻工作并提任职务；收受礼金；利用职务便利谋取利益……这些粗线条的话语为人们勾勒了儒雅肖天的另一面。

小城骄子

蚌埠市位于淮河以南，是安徽省第三大城市。此地位于中国南北方分界线，在同等规模城市中，蚌埠的体育传统深厚，曾涌现出多位体育界名人。1970年，15岁的肖天进入蚌埠五中初中部就读。当年，蚌埠五中综合实力并不强，但体育教育颇有特色。老教师宋木顺曾是这所学校的体育名师，肖天是老人从教多年来印象最为深刻的学生之一。肖天入学后不久，宋木顺在初中部组建篮球队，刚上初一的肖天是篮球队的活跃分子。宋木顺当时不会想到，这个小小的篮球队，会出现一位国际篮协副主席。

“我们的训练通常是下午四点之后，别的同学都放学回家或者在班里上自习，我们队员们在操场上辛苦训练。”宋木顺回忆，很快他就发现肖天在篮球队里起的作用不一般：“他的个子在同龄人中不算高，但是他非常机灵，身体条件好，爆发力和弹跳力都强于其他队员，所以我指派他为球队队长。”老人记得，在后来的一次蚌埠全市初中篮球联赛中，综合实力一般的蚌埠五中篮球队，在40多所中学里排名第六。

1972年的一次运动会上，肖天在100米



肖天

短跑中成绩达到11秒3。在上世纪70年代，这一成绩极为罕见，“肖天创造的校纪录一直保持了20年才被打破，”宋木顺对此印象颇深，在他看来，肖天在初中生时代就在体育领域表现出众，训练刻苦：“而且，一般练体育的孩子，文化课成绩都偏差，但是肖天的文化课成绩在班里也能排到中上等。”宋木顺说，有时候训练结束，别的队员都走了，他还要单独多练一会儿，直到筋疲力尽才离开篮球场。

第二年，肖天从蚌埠五中毕业后，考入省城合肥的安徽省体育运动学校(以下简称安徽体校)，这是一所中专学校。肖天在安徽体校喜欢上了一个在当时非常时髦的体育项目——击剑，这为他后来成为中国击剑领域的大总管打下了初步的基础。两年后，肖天重新回到了蚌埠五中，这次，他成了宋木顺的同事。对一般中专生来说，能进市区的初中教书，已是不错的工作，但肖天似乎在教书之余，仍在不停学习。1977年，文革结束后首次高考开始了，一心要在体育事业上更进一步的肖天迎来了他体育生涯上最初的起跳，他考入了体育领域的最高学府——北京体育学院。

肖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曾经回到安徽省体育局工作，又到了他读过书的省体校大院里。一位与其相识的人士透露这样一件往事：肖天在省体育局时并非挂职，而是全职，并带来了家眷：“局里觉得他可能不会再回北京了，便在一次福利分房时分给他一套房产。哪里知道，房子刚下来没几天，他又被调回国家体委，刚分的房子，闲置下来。当时房源有限，有些老职工还没分到，而一个短期工作的人却分到了，此事引发了很多争议。”

肖天成为中国体育界高官后，他的部分亲属也在安徽省内的体育领域进入仕途快

车道。现任安徽省棋院院长肖丽莎，即系肖天侄女，至今仍在老体校里办公。而今，安徽省体校已更名为安徽省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院，在城南建设了更加宽阔的新校区。老校区里成了各种体育项目训练场和俱乐部。这里的人们曾经以肖天为骄傲，但对这个熟悉的名字，他们而今也不愿再提起。

送给母校的名牌鞋服

无论今日怎样回避，肖天至少在蚌埠五中的回忆中都是温暖而美好的词汇。

2011年是蚌埠五中百年校庆，校方向众多知名校友发了邀请函，有些已是高级官员的校友没有回音，而肖天接到邀请函后当即回复：一定会来参加典礼。校庆仪式前，肖天与老同学和校方领导同游淮河后准备合影留念时，扫视了一眼同行人员，问道：“怎么宋老师没来？”当时有校领导还不知道这个已经退休数年的老教师，有人赶紧给宋木顺打电话，让他打车过来拍照。

这成为宋木顺最难忘的往事：“肖天就职于国家体委期间，我曾到他北京家中。肖天握着我的手一直说：‘你是我的启蒙老师啊’。”多年以后，肖天仍能在人群里记起他来，宋木顺感动不已。

校庆是当年10月5日举行的。因为《蚌埠日报》国庆长假时停刊，在恢复出版的10月8日，《蚌埠日报》在报眼位置隆重报道了蚌埠五中百年校庆活动。报道介绍，肖天作为校友向母校赠送了纪念品——2008年奥运会中国所有获得金牌选手的亲笔签名，并致贺词。

除了向校方赠送纪念品，还向校方赠送部分健身器材。让老师们意外的是，临别时肖天向蚌埠五中所有在职教师赠送了名牌运动服和运动鞋。“全校有在编教师近170人，这么多套鞋服，价值不菲。老师们感

受到肖天对母校沉甸甸的感情。”一位老师动情地回忆。但是也有老师对此心生疑虑：

“如果是个人赠送，肖天应该不会拿出这么多钱；如果是企业赞助，那副局长拉企业赞助学校校庆活动，怎么说也有点不妥当。”

一位老师记得，当年蚌埠五中官方网站也浓墨重彩地报道了肖天出席校庆活动。近日，《凤凰周刊》记者浏览该校网站，关于肖天的文章已不见踪影。

大学里的转折点

1977年是恢复高考第一年，肖天考入北京体育大学。在这里，他接受了更正规的击剑训练，这段求学也成为他进入国家体委工作的重要基础，也是他之后步入仕途的转折点。

从50年代便开始练习击剑的陶金汉与王守刚、丁振港同是中国击剑元老，也是中国最早参加国际击剑比赛的运动员。进入北京体育大学的肖天选择击剑作为自己的专项，便开始在王守刚教练的手下练习击剑。时任佩剑教练陶金汉也曾训练过肖天半年：“击剑项目比较特殊，需要相当细致的指导，当时王守刚老师带不过来，我也就有一段时间带肖天他们四个人。”

1980年，在陶金汉的带领下，肖天和另外三名同学一起参加了一次全国锦标赛，拿到了一个团体第四。据陶金汉介绍，北体大虽然是体育学院，但击剑队本身不是专业队，平时还要上各种课程，不像专业队那样只是训练。平时他们组队参加全国专业比赛，对手都是全国各地的专业队伍。

在北京体育大学念书的肖天不仅要练习击剑，还要参加各种运动项目的练习，以及文化课程。北体大的教学目标即是培养体育教师和体育干部，大部分毕业生分配进入高校，或者基层机关，能够进入国家体

委的只有为数不多的佼佼者，而国家体委的干部中，有相当部分都是北体大出身。在陶金汉印象中，肖天文笔好、口才佳，在学生中很突出，且体育专业过硬，参加比赛时也不像别人那样会胆怯，有一股冲劲。

肖天当年的同学、现中国击剑队领队王健回忆，肖天学生时代文化课算是名列前茅。这也是他之后被选入体育总局最重要的原因。进入国家体委后的肖天在多个部门任职。从击剑处到成为时任体委主任李梦华的秘书，之后又逐渐成为自行车击剑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国家体育总局主管竞技体育的副局长。

好名声下的权钱交易

肖天担任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至今已有10年之久。这是中国竞技体育蓬勃发展的10年，在历次国际赛事的领奖台上，中国运动员的身影越来越多。10年中，肖天多次带队出征，曾任伦敦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副团长、索契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副团长等职务。

新华社曾援引吉林省体育局人士的话说，在好成绩的掩盖下，因为缺乏监督，腐败分子在其擅长的领域有极大的权威，加上公众和管理部门更多把注意力放在成绩上，腐败行为在“成功光环”下容易被忽略。去年11月，中央巡视组在对国家体育总局反馈巡视情况时表示，体育赛事的行业不正之风突出，反馈同时提及，巡视组还收到一些反映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移交中纪委等部门处理。反馈意见发出不久，前游泳运动管理中心花游部部长俞丽即被带走调查，据称其“涉嫌收受贿赂，操纵比赛”。

但让很多人想不到的是，巡视中提及的“一些领导干部”并非虚指，而是半年多后的肖天。陶金汉直呼想不到：“肖天为人比

在好成绩的掩盖下， 因为缺乏监督，腐败分子 在其擅长的领域有极大的 权威，腐败行为在“成功光环” 下容易被忽略。

较正派，在击剑界名声不错。对老师比较尊重，过年的时候聚会也不会忘记给以前的老教练送些礼物。”

中国大陆击剑圈并不大，“他究竟犯了什么事”？熟悉肖天的朋友各有猜测。早在2014年9月，一份名为“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录用的高官子女及国企领导人子女情况”的文件被网络曝光。该文件曝光了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5名员工的名字，其中一位名为“肖阳”的人士2013年入职该证券公司，职务为高级副总裁，网帖显示其父亲为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肖天。一家大陆媒体曾报道，肖天之子名字确为肖阳，其英文名字为Sonny Xiao。报道指，肖阳早年前往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南卫理工大学留学，拿到工商管理学士学位和MBA学位。获得MBA学位不足两年，2010年肖阳便成为美国国家篮球协会发展联盟(NBA D-League)的克萨萨斯传奇队的首位华人老板。该报道同时指，肖阳还曾在销售北京奥运会门票的北京歌华特玛捷票务有限公司任职，负责商业运营与政府公关。

媒体引述摩根士丹利内部员工消息称，员工名字属实，但其亲属是否为高管或高官，并不确定。事实上，高官子弟或亲属任职金融机构高管在大陆并不鲜见。如已落马的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其妻段雁秋曾任银河证券投资银行总部董事、总经理；原福建省副省长徐钢，其妻亦曾任职于某知名股份制银行。这份材料在互联网上引发

热议，而肖天一直未出面回应。

不仅其子，关于肖天妻子的传闻也不在少数。本刊记者获悉，肖天前妻是原北体大的团委书记，年龄比肖天大一些，人品不错，十多年前因癌症去世。此后肖天与田桦再婚。据大陆媒体报道，田桦比肖天小十多岁，三年前从东北某单位调动到北京国家自剑中心。据悉，在来自剑中心之前田桦已经没有体制内的编制了，但却在自剑中心获得了马术部副部长（副处级）的职位。尽管只是副部长，但田桦的办公室实际上跟中心主任的一样，且配有专职司机和轿车，这些都违反了相关规定。

另外，作为主管竞技体育的副主任，肖天的落马或许也与近年来全运会诸多丑闻有关。在去年中纪委巡视组对体育总局巡视反馈中便提出，录用本局干部亲属过多导致利益关系复杂，干部兼职严重，也并非无的放矢。出事前肖天的身份除了体育总局副局长，他还担任中国奥委会副主席、中国击剑协会主席、国际击剑联合会终身荣誉委员、中国滑冰协会主席、中国马术协会主席、中国体育战略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体育法学研究会会长、国际篮联副主席等众多职务。

同时，在肖天落马前后相继落马的国家体育总局自行车击剑中心副主任、中国马术协会副主席沈利红，排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潘志琛都与肖天有密切联系。据大陆媒体报道，田桦能够调入自行车击剑中心与沈利红的帮助不无关系，而潘志琛也曾担任自剑中心主任，被认为是肖天的嫡系。

肖天落马正值中国申办冬奥会关头，当时有接近体育总局的人士猜测，肖天之事尘埃落定，加之申奥成功或可缓解中国体育总局头顶的重压，工作重点或将转向接下来的改革。●



2015年7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岐山在北京出席2014年中央第二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并讲话。

大陆体育反腐风暴

吹动一池“黑水”

记者/李克难 特约撰稿/杨旺

伴随着纪检监察力量的加强，体育系统的整顿与改革开始启动。8月，随着《中国足球协会调整改革方案》的公布，体育系统四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有望在足球领域打开缺口。

2014年7月，中央巡视组第二轮巡视启动，国家体育总局首次进入名单，体育反腐的风暴开始刮起。这一年中，数位体育官员落马，多年来饱受诟病的中国体坛开始经历一场反腐风暴的洗礼。

大陆体育领域的反腐风暴不仅吹向体育系统内部官员的命运，更影响着大陆体育半个多世纪以来形成的举国体制的前景。但体育乱象根植于多年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体制问题，体制惯性与金牌政绩紧密联系，肃清体坛歪风绝非朝夕可行。

乱象丛生的全运会

中纪委针对体育部门的第一阶段反腐，是以全运会为切入点。应该说，作为地方利

益的集中体现，全运会向来成为各地方体育局角力的重要场合，其背后，干系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体育局价值几百亿的利益大盘。而相对于中国足球这样的职业体育，全运会接受法律和媒体的监督要少得多。

1959年创立的全国运动会，自成立初期采取和借鉴的是苏联模式。而等到上世纪90年代和奥运战略合拍之后，它的影响和手段也日渐升级。由于其运行体系和积分体系，与地方体育官员的升迁直接挂钩，因此



也是相关利益链条最多，最不透明的一个。加之这个体系是以金牌为导向的体育考核体系、发展模式和配置方式，因此全运会也是去年中央巡视组公布的巡视问题账单最严重的区域。中央第十一巡视组对国家体育总局的巡视反馈意见中指出，赛事审批和运动员裁判员选拔选派不规范、不公开、不透明；比赛违背公平原则、弄虚作假，破坏赛风赛纪现象比较严重；赛事开发经营混乱，缺少必要的规范和监督；总局直属单位行政、事业、社团、企业四位一体，权力高度集中；干部兼职普遍，利益关系复杂。可谓对体育领域多年存在的问题鞭辟入里。

近年来，媒体对于全运会中各个代表团为获取金牌而不择手段的报道不绝于耳，更是聚焦在那些依靠裁判主观判断的打分项目上。第十二届全运会花样游泳双人赛中，排名第三的四川选手蒋文文、蒋婷

婷拒绝参加颁奖仪式，在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两位运动员泪洒当场：“之前就有人放话（获得冠军的辽宁组合）一定会得到金牌。但是大家都可以看到，她们的侧重点并非在这个项目。她们在一天之内成绩提高了两分，我们不知道她们有什么神奇的力量可以在这么快的时间里有这么高的成绩提升。这是一个很蹊跷的情况，在国际国内比赛中都不可能出现的。”

大陆《成都商报》、《河南商报》媒体曾经报道过田亮与当时中国跳水队的主教练周继红交恶后的内幕，这内幕来源于一位资深跳水裁判，当年田亮被排除出国家队，恰逢十运会举行，田亮参加的跳水比赛中，裁判被要求无论田亮跳得有多好，最多只能给8.5。比赛中，在田亮一次完美入水后，除了该位裁判按标准给出9.5的高分以外，其他裁判果然只给出8.5。该裁判也因此失

去了参加“最佳裁判”评选的资格。自知已得罪领导的他不久后便辞职。

这位裁判还透露，这种打分“内定”的情况并不罕见，但一般不会出现像压田亮那样有明确的指示，而是只会“派人来放出一口风，下面的人自然知道该怎么做。就算后面有人来查，也查不到任何证据。”他还表示，对于跳水裁判的近乎傀儡的状态无能为力。“比赛都是有很多替补裁判的，你不听话，不用你就行了，很多人在那儿等着呢。所以很多比赛，我们都是带着耳朵去：不用看比赛，听领导招呼就是了。”二人这段往事已成公案，她本人在不同的媒体上多次解释田亮被开除出国家队只是因为田“耍大牌”、不遵守纪律等原因，但“田亮事件”至今舆论未消。

从1997年全运会开始，连续四届全运会的金牌榜第一名都被东道主垄断，直到

← 2013年9月5日，辽宁大连，无缘花游女子双人项目金牌的四川队名将蒋文文、蒋婷婷以个人名义召开发布会，就昨晚仲裁问题发表看法。姐妹俩认为昨天的比赛涉嫌暗箱操作。

2013年辽宁举行的十二届全运会，辽宁队位居第二，东道主拿第一的定律才被终结。但东道主在山东举行的十一运男子3000米障碍赛上，当时被认为是国内此项目第一人的江苏选手林向前以8分27秒14的成绩夺得亚军，冠军被山东选手孙文利夺得。在比赛中，林向前就受到了“重点照顾”，一位山东交流到新疆的运动员，在跑到第3圈和第4圈的时候先是阻挡林向前加速，接着又频频使用肘击，最后甚至向林“绊腿”。林向前赛后向记者们诉苦：“他的腿都伸到了我两个腿中间了，这能不是有意的吗？我提醒他注意安全，但他仍然用肘部向外扬来挡我。”赛后林向前在冲过终点时找裁判理论，但无济于事。

为了追求高名次，东道主往往不惜血本引进外地优秀运动员。九运会的东道主是广东，代表团中引进人才超过100人，有报道称当时广东的条件是退役后解决工作，并给一套住房。十运会江苏共引进了140多名“外援”，这些人中有15人获得金牌。十一运的东道主山东则更进一步，仅在国家体育总局公布的255人联合培养大名单中，山东与西部地区联合培养的便达到了184人。

2010年冬运会的男子短道速滑1000米赛场上出现一个奇景，三名长春选手在吉林籍的解放军选手宋伟龙身后不紧不慢地跟滑，而宋伟龙似乎也显得悠哉悠哉。比赛一圈圈进行却丝毫不见短道速滑应有的冲刺与追赶的刺激场面，获胜后的宋伟龙也没有笑容。

十运会的女子柔道比赛，辽宁队的奥运冠军孙福明面对同为辽宁籍但代表解放军的选手闫思睿。比赛开始后闫思睿轻轻一推，孙福明便倒地。比赛不到一分钟便结束。明目张胆的假摔让赛场内嘘声四起。赛后孙福明称自己看到教练让她倒下的手势，

于是就倒了。而教练刘永福则认为，两人谁拿冠军都一样，因为都是辽宁的。

为什么全运会成为各种乱象的聚集地？在东方卫视今年1月的一档节目中，前央视著名主持人崔永元道出了圈内几乎人人皆知的奥秘：

“奥运金牌、亚运金牌对各省没什么用，意思不大。重要的是全运会那个金牌，因为全运会金牌得的多，就说明这个省的体育抓得好，然后给你拨的经费比往年还要多。运动员都全力争全运会的金牌，全运会金牌的奖金是30万元，没有奥运会的50万多，但他为什么还要争呢，因为他不挣，省体育局的领导就不可能往上升，省里的经费就可能往下减。所以为了整这个，各省体育局就不择手段，像收买裁判、收买对手，像优秀运动员参加比赛的时候，他们连别人提供的水都不敢喝，一定要自己拿着自己的水，否则会有人往水里下巴豆，或者有可能查出来兴奋剂。”崔永元在节目中对体育黑幕大加鞭挞：为了让对手不出好成绩，收买对手、收买裁判、破坏对方的器械等等手段不一而足。同时参加节目的著名游泳运动员乐靖宜回应：游泳项目中确有兴奋剂的事。此前自己当运动员时就很强的保护意识，绝对不会喝桌子上放的水，矿泉水打

层出不穷的各种黑幕、混乱、弄虚作假已使全运会公信力大打折扣。场外因素甚至压过了运动员赛场上的表现成为关注的热点。如有好事者愿意整理，仅全运会就可以写出一本“造假指南”。

开之后喝一口，出去溜达一圈回来后，这瓶水也不会再喝。

为何会有运动员主动输掉比赛？曾有媒体报道了一个调查结果：在现行的全运会规则下，为鼓励各地将运动员输送给解放军队，解放军队的运动员获得金牌，除了给解放军代表团计算1枚金牌外，输送该运动员的省区市代表团也将同时获得1枚金牌，这就是“双计分制”。因此在争夺金牌的赛场上，如果解放军选手与其对手同籍，地方往往会做个顺水人情，故意输掉比赛，这样双方都受益，不得罪人，才出现各种消极比赛的奇景。

层出不穷的各种黑幕、混乱、弄虚作假，已使全运会公信力大打折扣。场外因素甚至压过了运动员赛场上的表现成为关注的热点。如有好事者愿意整理，仅全运会就可以写出一本“造假指南”。

金牌光芒下的阴影

国内赛场中的各种乱象，即如巡视组指出的：比赛违背公平原则、弄虚作假，破坏赛风赛纪现象严重。而这些乱象的根源即是长期以来形成并广受业内诟病的金牌政绩观所致。

如果说全运会是最厚实的底子，那么金牌队则是最瞩目的明珠。由于二者在从业环境、输送管道甚至奥运战略目标诉求上（奥运会金牌等于一块全运会金牌）的互相纠葛，导致双方含混不清的灰色地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在针对全运会的整肃风暴中，也不忘对金牌队进行警告和敲打。

被称为花样游泳教母的前游泳中心花样游泳部主任俞丽，在去年11月因涉嫌受贿和操纵比赛被带走调查，业界四座皆惊。此事被媒体称为业务派掌门人的命运缩影。

→ 2012年7月29日，伦敦奥运会女子举重53公斤级，周俊遗憾无成绩。

的确，在国家体育总局内部，几乎每个战绩彪炳的项目中，都存在着一个俞丽式的人物。他们为项目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另一方面也因为缺乏监督，在自己的小圈子当中权力极大。其中个别人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成为重要比赛结果的操纵者。俞丽统帅的又是打分项目。而跳水、体操、艺术体操、花样游泳等项目，在缺乏统一的计量单位、裁判主观性比较强的情况下，也为众多的幕后交易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遗憾的是，俞丽事件并未令国家体育总局警醒——在中纪委取消全运会奖牌榜的禁令之后，体育总局也提出不再公布全运会金牌榜，但两天后，总局官网上发布的《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草案)的通知》与《第十三届全国冬季运动会竞赛规程》中，仍然将公布各省市代表团的成绩榜。事件爆出后，体育总局宣传司回应称，该事件是内部的技术失误，而中央纪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组副组长施泽华表示要追查追责，将责任落实到人。

一位体育系统内人士分析，尽管近期总局开始对金牌政绩观进行反思，但多少年来形成的工作思路已经定型：“现在觉得过去的做法不能用，但又没有新的方法来替代，因此存在一定的消极情绪。”

北京体育大学体育道德与廉政风险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闫旭峰认为，所谓金牌政绩观即是将获得的金牌数量作为衡量一个地方体育工作好坏的指标。在这种指标体系下，金牌获得的多少，与体育官员的升迁、教练员职称的评定、运动员获得的奖金，甚至部门的奖金等都联系在一起。把金牌作为衡量体育运动好坏的标准，就使得各地体育部门为了拿金牌而不择手段，衍生

出赛场上的各种不正之风。

以体育总局为首的体育管理系统，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享受着两方面的便利：一方面是政府庞大的供给体系以保证其金牌争光计划，另一方面是全民健身计划。由于全民健身计划没有可以检测的指标，使得总局大部分的精力乃至经费，可以堂而皇之地向金牌争光项目倾斜。每届奥运会前，在总局各中心主任的电脑中，都有一个表格，上面列举本队能夺多少金牌、多少银牌，对手竞技情况如何等等。而一些项目尤其是金牌项目，在人选选拔、大赛选拔等环节存在着模糊的灰色空间。

另一方面，体育职能体系的审批权、职业赛事的所谓管理权等油水，也提供了巨大的寻租空间。以中超联赛为例，目前国内由中超公司负责管理的中超联赛，实际上为占36%股份的中国足协控制，而年均投入过亿的每家俱乐部只各占4%的股份，俱乐部对联赛运营没有话语权；而在司法介入足球常态化机制尚未形成的环境中，默契球、人情球及各种“微腐败”仍存在法律盲区。

自我封闭之下，导致这个体系的分配制度问题百出，这里面的利益链条更加错综复杂。由于奥运战略的庇护，这些项目长期处于监督视线之外，因而引发诸多问题，比如运动的收入分配就常常烽烟四起：有联名举报相关教练，有队员炮轰管理部门，也有教练和队员、教练之间的互相争吵。

在闫旭峰看来，金牌政绩观形成多年，绝非体育总局一处：“每到全运会的时候，省里面开始下任务，再到省体育局，再一层一层向下。所以体育领域的反腐倡廉，扭转金牌政绩观是一个非常复杂艰巨的任务，仅靠总局是不可能解决彻底的，总局的工作也必须依靠各省的工作”。

透明选拔待何时

蒋文文、蒋婷婷组合与刘鸥、黄雪辰组合是中国花样游泳的王牌，蒋氏姐妹擅长自由自选；而刘黄组合擅长技术自选。然而伦敦奥运会花游项目中国只能有一对参赛。时任游泳管理中心主任的俞丽宣布两个组合将通过队内选拔赛决定奥运资格。但比赛只进行了技术自选，没有进行自由自选，文婷组合也因此失去了奥运资格，消息爆出国内舆论大哗。

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女子53公斤级举重，湖北的17岁小将周俊三次试举均失败，遗憾退场。当日，《中国青年报》和新华网分别刊文指出，周俊入选奥运会本身便是个意外。只是因为总局为平衡各省利益，将48公斤级的名额给了湖南，湖北原本实力更强的48公斤级运动员田源失去了奥运机会，为安慰湖北才将53公斤级的名额给了周俊。

去年人大会上，已是冰上中心官员的前著名运动员杨扬作为人大代表提出公开透明选拔运动员的提案，而她本人也曾是受害者。为准备2006年都灵冬奥会，30岁的她推迟自己的留美学业，中断了自己的职业规划，全身心投入备战，并且在奥运前一年的世锦赛上获得金牌，但就在奥运会500米短道速滑比赛前一天被告知“500米没给你报名”。由于缺乏一个申诉的渠道，杨扬也无法维护自己的权益。在她的提案中，她建议建立运动员听证制度，给予运动员更大的话语权和申诉的渠道。

闫旭峰分析，过去选拔运动员，各个中心不同的项目选拔机制是不一样的，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文件进行规范。国际上一般是通过打比赛确定积分的方式来确定，而国内有的是总教练说了算，有的是主管中心领导说了算，各个项目不一致。这种选拔制度



在计划经济行政体育下有它的特殊性，但到现在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到现在应该有一套新的统一的选拔制度。

对于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选拔问题，国家体育总局于今年1月出台《全国体育竞赛裁判员选派与监督工作管理办法（试行）》与《国家队运动员、教练员选拔与监督工作管理规定（试行）》。今年7月，各个项目中心关于运动员、教练员与裁判员的新的选拔规章陆续出台。

新的运动员选拔规定，要求各国家队要根据本项目特点，公开选拔工作的原则、要求、程序、方式、条件、标准和入选与退出国家队的选拔结果。选拔办法由各项目中心负责，以中心办公会的形式集体研究决定。主教练员和教练组提名国家队运动员名单，但最终决定权仍在项目中心的主任办公会，其中也并未见杨扬所提的运动员听证会制度。

审批权寻租背后的四位一体

2014年，中国越野拉力赛正式创立，办赛方希望让这项赛事成为像达喀尔拉力赛那样的世界顶级拉力赛，但赛事第一届便面临参赛费用昂贵、奖金太低的质疑。比赛汽车组报名费单车10万元人民币，卡车组15万元，摩托车组5万元，而奖金汽车组第一名3万元，总成绩第一还能拿5万元。如此一来，即使比赛成为冠军也得赔钱。赛事到第二届已出现参赛者大减的状况。

如此寒酸的奖金和高昂的报名费，缘自赛事高得惊人的办赛费用。据一位业内人士透露，像中国拉力赛这样级别的比赛，上交汽联的“审批费”“协调费”以及裁判、设备及通讯费用便高达1000万元人民币。在这其中40万元的“赛事审批费”并不包含任何服务，但如果不上交审批费，承办方就得不到办赛的批文。各种官方收费中

的猫腻还有很多。汽联规定赛事裁判、医疗救护等相关人员由汽联聘请，费用约为400万元人民币，但承办方如果自己聘请顶级团队，成本可能会节省一半。

据大陆媒体爆料，如今国内环塔克拉玛干、阿拉善、中国越野拉力赛以及漠河拉力赛四大赛事，在“审批费”和“协调费”上每年总共要上交约2500万元到汽联。

去年9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提出取消商业性、群众性赛事审批权。审批不公正、不透明，部门利益纠缠其中被纪委巡视组点出。体育总局则于去年12月出台《关于推进体育赛事审批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规定原则上取消审批，禁止巧立名目违法违规收费，并加强信息公开。但审批乱象并非单一的问题，其背后是亦被巡视组指出的体育管理机构四位一体、权力集中的问题。

一位体育业内人士认为，无论是赛事

→ 2005年十运会女子柔道78公斤以上级的决赛，孙福明未经“战斗”就自己倒下，将金牌拱手让给闫思睿。孙福明赛后向媒体哭诉“让金”，结果引起轩然大波，该场比赛重赛，最终孙福明再败。

审批中的问题，还是运动员、教练员选拔，裁判员选派中出现的乱象，以致比赛中的各种弄虚作假，其背后都有着体育管理机构权力集中的问题。在现有体制下，各项目中心不仅是行政机构，又是事业单位，又是社团，一些还经营企业。各中心既是裁判者又是运动员，既审批体育又办体育，项目中心又有权力选择参加赛事的运动队，这就为滥用权力提供了空间和机会。只有通过转变职能、放权分权，改变这个制度才能最终解决问题。

上世纪80年代，体育领域开始进行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改革。当时的国家体委将其内部好些业务部门分离出来，将以前的竞赛司改为一个个项目的中心。当初将项目中心与体育项目协会二合一的制度安排本是一个过渡性的设置，此后的目标是项目中心与协会再分离，让体育协会成为真正的社会团体。但这种过渡性质的机构却逐渐凝固，成为长期的制度，项目中心和项目协会成为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状态，随着体育市场的发展，项目中心便成为了行政、事业、社团、企业四位一体的结构。

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受国际体育单项联合会管辖的各个单项体育协会应当是一个社会团体，而非政府机构。国际足联章程中甚至规定，各国足球协会如果在运作中有受到行政干预，该国足协将可能被驱逐出国际足联。然而在中国，从计划经济时代便形成了行政体育，依靠行政力量推动管理体育的制度。在总局层面，国家体委、中国奥委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三块牌子，但基本上是一套人马。这其中行政的力量处于强势。在中心里面，改革以前是由体委下设各司来管项目，而体委下设的各个运动协会更多是虚设的建制。现在项目中心不与协会分开，事实上还是延续着以前的制



体育方面的腐败问题有时并不仅仅是体育系统中的问题，整个社会环境的腐败风气使得体育系统难以独善其身。

度模式。发布行政命令时用中心的名义，在另一些场合则用社团协会的名义。

一位大陆资深体育媒体人认为，中国体育腐败问题并非可与普通官员腐败同等看待，而应当充分考虑体育的特殊性。在举国体制的指导下，多年来中国体育系统培养了一大批体育官员，却极为缺少专业的体育市场开发方面的人才。在各个项目“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的体制下”，一些体育管理者因此担当了很多赛事主办者、经纪人的角色。在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中，经纪人、赛事主办者从中获取一定酬劳无可厚非，但如果他们的职能只能让同时兼任主管部门官员的协会成员来做，他们所获得的酬劳的合法性则很难说得清楚。

不仅如此，体育方面的腐败问题有时

并不仅仅是体育系统中的问题，整个社会环境的腐败风气使得体育系统难以独善其身。另外，不同的项目的情况也很有差别，需要根据项目特点具体分析。例如，组织一次赛车项目会占用大量的公路资源，同时也需要大量的安保、技术的保障，交通、安保等管理部门同时也获得了寻租的机会。“现在体育反腐的一个结果是没人办比赛”，一位曾参与体育赛事承办的人士称，“对于主管官员来讲，哪些钱该收、哪些钱不该收并没有正式标准，容易犯错误。现在民间办赛逐渐增多，但一些大型的赛事仍然脱离不了官方的身影。”

改变这个与举国体制同构的管理体制绝非易事。体育总局在回应巡视组的《通报》中提出诸多规划，包括足协改革力度、项目比赛试点，这些规划除足球现今已经出台足协与足管中心脱钩的方案外，都属于试点性质，并且进行分权试点的项目都非常边缘。一些项目在社会上不容易普及，群众性活动开展不起来，但同时又承担着为国争光的任务，并不适合完全交由社会来办。在目前可见的体育改革中，或许足球改革会成为打开局面的里程碑。

专访陈培德

体坛反腐迟来十年

记者/马军

陈培德在体育圈里的“雅号”是“扫黑斗士”，也有人叫他“反黑局长”。这缘于2001年，他联手浙江绿城、广州吉利等俱乐部掀起足坛扫黑风暴，揭露足球圈里的假球和黑哨，彼时，他任浙江省体委主任、浙江省体育局局长，此外，他多年来一直炮轰全运会兴奋剂泛滥、裁判问题突出等问题。

体制不改，腐败难破

记者：为何说这是一场迟到十年的反腐？

陈培德：以肖天落马为重要标志，中国体育的反腐进入了深水区，这是一场迟来的战斗。2000年悉尼奥运会前夕，伍绍祖调离，袁伟民荣升体育总局局长，李志坚任党组书记。当时我就给他们二位写信，恭喜他们荣挑重任。在信中，我跟他们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你们俩烧一把就可以，就是大刮体育战线反腐败的龙卷风。当时，全国各条战线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下，体育系统的反腐败仍是静悄悄。我希望他们两个把这把火烧起来，可惜他们两位并没有这么做。就这样，十几年就过去了。

我向总局多次反映情况，（腐败）从全运会到各项锦标赛都有，但是体育总局某些领导一直视若罔闻。到后来愈演愈烈，甚至只说不抓、包庇腐败。过去足协甚至不给仗义执言的记者发采访证，更不会理睬我的呼吁。

记者：您在这么多年来一直呼吁体坛反腐，有没有遇到过什么阻力？

陈培德：阻力当然有，有说客甚至从北

京到杭州来请我吃饭，让我少说几句话。这么多年来，总局都没有哪个领导公开肯定我对体坛反腐的呼吁。肖天当年来浙江的时候，私下里曾说，总局对不起陈培德，但也没有公开说。我去总局、去和兄弟省市的体育系统开会，一些官员对于我的呼吁都避而不谈，甚至对我退避三舍。

记者：您认为体育腐败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陈培德：体育的腐败是全方位的，尤其是在竞技体育当中。这里有很多体制问题，就是原国家体委、现国家体育总局的问题。革命时期我们说“一切权力归农会”，现在是一切权力归总局，归项目管理中心。我说的一切指的是从项目规则的制定、赛事的组织、裁判的选拔、职称的评定、场馆的选择、运动员的培养、赞助商的遴选……都是管理中心说了算的。甚至连某些比赛的结果，也都要由管理中心制定。

在现有体制下，运动员要成绩、教练员要业绩、领导要政绩。在科学的管理和指导下，人们对成绩的要求可以体现体育精神，振奋民心，但如果政绩观歪了，发展观就会有问题，体育系统就会用歪门邪道的办法提升成绩。

记者：您曾给习近平总书记写过信反映这个问题，当时您是怎么表示的？

陈培德：孟子说过，熙熙攘攘皆为利来。怎么能保证利益的获取是通过正常的途径？这就是体制问题。我曾经在给习主席的信中写到，一定要深化体育体制改革。我认为原来伍绍祖任内搞的机构改革犯了一个方向性的错误。

本来机构改革的指导思想是简政放权、管办分开、政企分开，结果项目管理中心设立让一切权力集中起来了。当时全国有24个运动项目管理中心，我曾在全国体育局长会议上公开抨击，这24个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就是24个从国家机关笼子里放出来饿得发昏的小老虎，现在要下山扑食了。当年有一个省统计，因为管理中心的增加，一年的接待费多了六十几万。原来搞体育只要面对一个竞技体育司，现在要对付二十几个单位。

这些管理中心，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既是监督者又是管理者。大到赛事的主办权，小到会议召开、公务接待，每一个环节都有腐败的空间和可能。以前为什么改不动，就是因为阻力来自于体育系统内部的既得利益者。现在只有最高层的习主席出面，才有了一些改变。

写给习近平的信

记者：您给习主席的信都有哪些具体的意见？

陈培德：2001年的足坛“扫黑”，是有高层命令中纪委和总局的调查组进行调查的，也找我了解了很多的情况，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何就被叫停了。我给习近平主席写信就曾经提出过，一定要反省当年途中叫停反腐的教训。正是当年反腐的突然叫停，才导致足球后来罢赛、打裁判等乱象肆无忌惮地出现。用列宁的话讲，这就是“无政府主义”对当年“机会主义”的惩罚，一定要吸取教训。

第二条就是要举一反三，足球腐败，其

他的项目也不会干净。我和习主席说，体育几十个项目，无非就是三种。第一种是有成绩的，田径、游泳等。这种项目弄虚作假的方式就是服兴奋剂。全运会里为了逃避尿检出现过故意倒骑车的事情，还有前十名都能破世界纪录的马家军，一看就是弄虚作假吃了兴奋剂的。全运会里捞够了金牌，国际比赛就不敢出去比了。

第二类就是那种打分的项目，体操、跳水等。这种比赛就可以事先拿钱来买通各中心，然后管理中心就可以通过裁判来影响比赛，甚至分配金牌。有的比赛在赛前就能知道排名，这种比赛还有什么意思？

第三类就是吹哨的比赛，球类项目属于这一类。操纵这类比赛的方式主要就是黑哨，买通裁判，这种情况在中国的足球、篮球赛场司空见惯了。

我给习主席的第三条意见就是启动问责，之前那么多官员都对腐败问题充耳不闻，其渎职的责任一定要追问。

第四条意见就是深化改革，管办分开。

这封信到了习主席的手里，也得到了最高层的批示，说“陈培德同志给习近平主席的信收到了，提的问题发人深省，体现了一个老体育工作者的高尚情怀，值得大家学习尊敬”。

消除利益驱动是根本

记者：具体问题上，您提出过什么改变的方法？遇到了哪些困难？

陈培德：我曾经多次呼吁，全运会里腐败的风气愈演愈烈，干脆就应该取消全运会，改为单项的全国锦标赛。按照过去那种劳民伤财的方式搞，全国只有北上广等几个城市有能力承办。但如果搞成单项比赛，西北、西南的欠发达地区都可以搞，比如曲棍球就可以放在甘肃搞，那边的场地和群众基础都很好，但是这个建议没有

人理睬。

有体育系统内部官员跟我说，取消全运会，那我们这些人怎么办？国家就更不重视体育系统了。我们现在的很多官员都是先考虑自己，再考虑国家利益和体育事业的发展。

举个例子，足球的管办分离提出了好久，但是只要高层不动，足协就不改。习近平总书记出访时屡次秀足球，很多人都解读这是他的个人兴趣，其实不然，这是一种信号，一种高层寄希望于体育改革的信号。但是下面就是理解不了这个信号，或者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不愿意动。

记者：体育总局还能安排比赛？这您能举一个具体例子么？

陈培德：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我们浙江的羽毛球运动员叶钊颖是很有希望拿到金牌的，但是临出发前，羽毛球管理中心和体育总局给我打电话，说龚智超赢丹麦队的概率更高，让浙江做叶钊颖的工作。总局给出许诺，这枚金牌照样计算在全运会浙江的总排行榜上，奖金照给。这就不只是羽毛球队说了算的，肯定是总局最后拍板的。我们没办法，只能服从了。

越是地方上有求于国家队的项目，腐败的概率就越大。我们浙江是全国唯二的两个历届奥运会有金牌的省份，每任体育局长压力都很大。2000年好在我们还有占旭刚拿的一枚举重金牌，否则打破这个纪录的很可能是我。在地方政绩压力下，就会出现给国家队送红包的情况。有的运动管理中心领导，自己开公司、搞比赛，各省、市、自治区都去给他公司捧场，实际上就是买人情。

记者：足坛反腐之后，目前中国足球的情况是不是好多了？

陈培德：只能说表面上已经好很多了。目前中国足坛的情况和其他领域一样，腐败



不敢像以前那样张狂、那样为所欲为了。但腐败会更隐蔽，会转向地下。利益的驱动是万恶之源。足球现在功利的诱惑这么大，反腐不会毕其功于一役。不过，应该说整个足坛的风气正在好转，正气正在上升。

记者：对于未来体育领域的反腐，您有什么期待？

陈培德：未来的改革阻力一定会很大，但在中央的强力推动下，社会上一片呼声，对改革充满渴望。在这种党心、民心的强力推动下，体育系统的反腐一定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但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以后，对体育官员的考核一定要变，不能再以金牌论英雄了。我们的经费八九成都花在了竞技体育上，而且都放在了几个可能冲金的人的身上，没有放在群众体育上。我曾经发表过一篇论文，讲的就是竞技体育要降成本。我算过，一块奥运金牌的成本是17亿元，这还不算基层的培养费用。未来，我们一定要设计一个体育工作的综合评估体系，但这个工作还没有人来做。

最后，我还要提出一个主张，未来中国的竞技体育要业余化、职业化，而不是专业化。在一些市场认可的运动项目中，一定要管办分开，让市场成为决定赛事的主体，要跟国际接轨。至于一些社会基础薄弱、国际上比较冷门，但是是我们强项的项目，还是需要国家养，这部分的费用也不会很多。

□ 编辑 路琰 □ 美编 虎妹

FENDI



产品垂询热线: 8621-53859078



时隔三年重启会谈 会面意义大于实质
中日韩三国“演义”内情

记者/漆菲



“我们去喝杯茶吧!” 1999年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东盟10+3”首脑会谈时,时任韩国总统金大中与小渊惠三和朱镕基说的这句话,为之后的三国领导人会谈埋下伏笔。

2008年,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同意

将单独举行会议机制化,此后每年轮流举行。直到2012年,由于日本政府推行钓鱼岛国有化措施、加上首相安倍晋三2012年末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三国关系急剧恶化,会议由此中断。“政冷经热”乃至“政冷经冷”也不时被用来形容中日、韩日关系。

时隔三年半,随着三国领导人会谈在首尔重启,其间停滞的各种协议体也将恢复,外界关注程度之高也就不足为奇了。《凤凰周刊》记者从韩日两国外交人士和主流媒体获得的反馈表明,由于之前期望值“没有太高”,各方对此次领导人会晤表示基本满意,但前期的日程设置和中日、韩日等双边会面的敲定,费力程度远超想象,这也从各方措辞之谨慎可见一斑。

大部分受访人士在谈及此次会晤时都会强调,“首脑会谈重启本身的意义远大于会谈具体达成了多少目标”。的确,会谈虽在关系改善上释放回暖信号、打开了疏通渠道,但仍回避历史和领土等问题的争议;三国对朝鲜的核试验齐声反对,但在具体措施上存有差异;南海问题、慰安妇问题也基本从主要议题中排除,重点放在扩大经济、社会、文化交流上。

会谈前的“暗战”

与中日韩领导人会晤相比,中日及日韩双边会谈更受瞩目,背后的各种暗战和博弈也反映出三国关系的现实处境。

10月26日,韩国青瓦台发布“韩方已经提议11月2日举行首脑会谈,但尚未得到日方答复”的消息后,正在韩国访问的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长石兼公博立刻反驳称“绝无此事”。日本外务省的官员则向《凤凰周刊》透露,这主要是因为安倍10月下旬在蒙古和中亚五国进行访问,

所以东京方面暂时确定不了在首尔的行程。

而中日双方是否会面早前也暗藏玄机。本刊记者最早得到的消息是安倍仅于11月1日访问首尔,这样一来很可能只能进行一次双边会面。直到后来韩日双方确认了双边会面时间,安倍改为1日中午赴韩,2日下午离开。

相比中韩双边会晤早早达成协议,直到10月28日,日韩两国政府一直未能确定双方领导人的单独会晤,

“慰安妇”问题似乎是争议核心。韩国总统朴槿惠此前接受日本《每日新闻》采访时强调,会将韩日首脑会谈作为解决慰安妇问题的机会。安倍也于10月28日接受本国媒体采访时就慰安妇问题表示“希望与朴总统就此问题坦率交换意见”。当时多数观测认为,安倍不会在慰安妇问题上表现出进一步的立场。

此外,虽说朴槿惠分别会见李克强与安倍晋三,但接待规格的不同也引发外界的议论。

据韩国《中央日报》10月29日报道,朴槿惠计划与李克强举行双边会谈后共进晚宴。同时青瓦台则宣布,朴槿惠11月2日与安倍晋三会谈当日不举行日方希望的首脑午餐会。

对此,青瓦台外交安保首席秘书官金奎显称,“韩日首脑会谈是借安倍首相访韩参加韩中日领导人会议之际顺便举行,不存在午餐会或联合记者会,李总理是正式访韩,因此安排了晚宴。”韩国外交部方面也解释称,安倍首相访韩属于工作访问,而李总理访韩属于正式访问,两者之间存在很大差别。

有韩国舆论认为,屡因领土和历史问题陷入低谷的日韩关系与进入深度发展“快车道”的中韩关系成为鲜明对比。日本《产经新闻》则

◀ 2015年10月31日至11月2日,李克强总理出访韩国并出席第六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时隔三年,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机制再次启动,或将加快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进程。

抱怨称,10月31日的中韩首脑会谈有“两国在中日韩首脑会谈前事先通气”之嫌。

会谈中的虚与实

“中日韩三国会谈得以重启,与其说是美国等外力因素的影响,不如说关键是三国感觉到必须向前迈一步,因为之前很多属于不理性的愠气行为,这样下去对各方都没有好处。”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张琰瑰向《凤凰周刊》表示。中日韩同为全球重要经济体,其生产总值合计超过16万亿美元,占世界20%以上。三国对外贸易额近7万亿美元,占全球贸易额的20%以上。

“此次会谈将三国的合作制度化,强化东北亚的对话与和平,”会后在共同会见记者时,韩国总统朴槿惠将中日韩首脑会谈的定期化视为此次会谈的重大成果。除此之外,三方还就经贸合作、应对朝鲜核问题和环保、防灾等领域展开合作,达成共识。

面对“政冷”的现状,李克强指出,三国应担负起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责任,推动政治安全与经济发展“两个轮子一起转”,以对话合作塑造安全与发展环境,为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营造良好氛围。

三国还同意将韩国政府推展的“创造经济”、中国政府的“创新经济”、日本的“革新政策”紧密合作,建立三国经济政策合作下的协商机制。

在备受关注的历史问题上,三方只是保留了各自原有立场。据《凤凰周刊》记者了解,三国首脑会谈上朴槿惠没有提及从军慰安妇问题。李克强在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的重要年,而没有像往常一样指出也是中国抗日

战争胜利70周年。

“合作应该是在妥当处理历史等敏感问题的基础上进行的,应该是在增进东亚地区相互理解的基础上推进的”,“不幸的是我们三国虽然地理上相邻,但部分国家之间却没能实现深度理解,令人遗憾”,会谈一开始,李克强在不点名的情况下提及了历史问题。朴槿惠也表示“引发政治安保层面的矛盾与覆辙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安倍则回应,“将焦点仅仅瞄准那段特定历史的态度是不具建设性的,希望编织日中韩合作的积极的历史。”他还解释自己8月发表的战后70周年谈话,向中韩寻求理解。

在会后发表的《关于东北亚和平与合作的联合宣言》(下称《宣言》)中,三方表示,将基于“正视历史、开辟未来”的精神,妥善处理三国之间的有关问题,为改善双边关系、加强三边合作而共同努力。

外界推测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将就朝鲜核问题发表联合声明以对朝鲜施压,但最终的《宣言》只是强调了“坚决反对在朝鲜半岛发展核武器”、“应忠实落实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尽早恢复有意义的六方会谈”等既存立场。《中央日报》记者崔翼宰注意到,《宣言》中使用的是“朝鲜半岛”的措辞,没有特指朝鲜。一名出席人士表示,这反映了考虑朝中关系的中国意见。“李总理在记者会上始终未谈及‘朝鲜’与‘核’问题,能感受到中方在应对朝鲜问题上和韩国、日本的基调不同。”

中日会面慎谈南海

“虽然外界一开始都认为中韩两国可能借机一起‘排挤’日本,但从最后的结果来看,获利最多的其实是安倍。”韩国《文化日报》政治

记者朴世颖向《凤凰周刊》记者解释道,“他既可以与中韩两国领导人首次正式单独会面,也并没有涉及到太多令其尴尬的历史问题。”

11月1日,中日双方选择在李克强下榻酒店的一个房间举行会谈,中方以东道主身份布置了会场。当地时间6时29分,安倍面带微笑走进房间,李克强迎接并与其握手。

对于这次会面,大陆官方的用词是“应约”。据凤凰卫视记者张凌云观察,此次两人合影背景中悬挂有中日两国国旗,意味着这是一个正式会面。“而前两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安倍的会面中,背景是没有两国国旗的。”

日媒认为,会谈显示中国对日姿态发生了变化。据共同社报道,中日双方同意重启外长互访,以及在明年较早时期举办日中高层经济对话。此外,双方同意力争早日重启东海油气田共同开发相关磋商,还确认将积极致力于尽早启用防卫部门间的海上联络机制。中日在2008年曾达成共同开发的共识,但由于2010年东海撞船事件陷入中断,日本政府曾抗议中方在此进行单方面开发。

“这次三国峰会依然给人各自立场悬殊的印象,李克强虽然有意针对日本历史问题,可是实际上他更重视的是自由贸易等经济合作。”日本NHK电视台记者现场报道称,“这主要由于中国经济减速以及需要对抗美国主导的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对此,《日本经济新闻》分析称,中国之所以同意此次的一系列会谈,是因为在南海问题上中美关系出现恶化。“中国希望与日韩加强合作,以打破美国主导的对华包围网。”

对于西方媒体最关注的南海问题,此次并未出现在三国领导人的主

历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1

2008 年

★【第一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地点：日本福岡

★会议签署并发表了《三国伙伴关系联合声明》，首次明确了三国伙伴关系定位，确定了三国合作的方向和原则。

2

2009 年

★【第二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地点：中国北京

★三国领导人回顾总结了中日韩合作 10 年历程，会议发表了《中日韩可持续发展联合声明》及《中日韩合作十周年联合声明》。

3

2010 年

★【第三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地点：韩国济州岛

★三国领导人重点就未来十年中日韩合作进行了规划，通过了《2020 中日韩合作展望》，确定了未来十年将稳步推进五大领域的 40 多项重点合作内容。

4

2011 年

★【第四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地点：日本东京

★会后发表了《第四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宣言》，以及加强灾害管理合作、核安全合作、可再生能源和能效合作等成果文件。

5

2012 年

★【第五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地点：中国北京

★三国领导人同意年内正式启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并见证签署中日韩投资协定。

2013 年、2014 年 中断

6

2015 年

★【第六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地点：韩国首尔

★三国领导人在举行会议后发表的《关于东北亚和平与合作的联合宣言》称，韩中日合作机制完全恢复正常，三方必须摆脱政治安全领域矛盾重重的情况。

要议题中。在中日领导人会面前，有日本记者向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提问，安倍可能会在中日首脑会谈中提及南海问题，王毅毫不犹豫地反问道：“南海和日本有关系吗？”

中日会谈后，安倍向媒体表示“双方就诸多悬案坦率地交换了意见，该提的主张当然也都提了”，但他颇意味地补充道，“关于具体讨论了什么内容，因为涉及到中方，目前不便透露。”不过在次日韩日会面后，有日媒披露，安倍在会谈中提到中国在南海建设“人工岛”问题，并表达了支持美国的想法，但韩媒在报道中对此只字未提。

“虽然中方还保持对推进两国关系谨慎的态度，譬如中方并没有发表这次中日达成的具体成果，但会谈的气氛还是不错的。”日本外务省一位不具名官员向《凤凰周刊》记者透露：“对我们来讲，这次最重要的其实是确定明年的首脑会谈在日本举行。这意味着李克强和王毅都会访日，意义不小。”

韩日提及“慰安妇”

对于韩媒来说，由于与中方的

会谈“可以预期”，因此关注的反而是 11 月 2 日举行的韩日首脑会谈。虽说在见面前舆论消极，有韩方官员预测这很有可能是一次“冰冷的首脑会谈”，但实际结果却比预期好得多。

2 日上午，两国首脑进行了长达 100 分钟的单独会谈和扩大会谈。朴槿惠在双边会谈上提出，日军慰安妇问题成了改善韩日两国关系的绊脚石，日本应拿出慰安妇受害者和韩国国民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安倍会谈后接受日媒采访时也表示，鉴于今年是韩日邦交恢复正常化 50 周年，韩日两国元首同意为尽快解决慰安妇问题而加快谈判步伐。双方还商定，若韩方决定加盟美国和日本主导的 TPP，将就此进行合作。

据分析，朴槿惠此前在接受《每日新闻》采访时表示“慰安妇问题谈判要在年内达成协议”，这番话给日方带去压力，由此安倍接受了韩方的部分要求，就加快慰安妇问题谈判进程达成共识。

不过，安倍对历史只字未提，仅表示“为了构建面向未来的日韩关系，希望与朴总统一起加倍努力”。

双方仍难以就撤走日本驻首尔大使馆门前象征慰安妇的少女雕像和保证最终解决慰安妇问题达成妥协。

对于本次三国领导人会谈的重启，舆论总体认为“谨慎乐观”，但这仍然意味着三国之间的些许暖意正蔓延至更高层级。青瓦台相关人士则表示，“此次三国领导人会议的首要任务是恢复此前疏远的关系，比起历史问题，更重视经济发展。存在矛盾根源的历史问题可以等到关系恢复后慢慢解决。”

张琬瑰认为，当前东亚各国间存在着诸多矛盾和对抗，虽然原因复杂，但究其根本，相当程度上都与有关各方是否认识到并正确对待三个历史趋势有关：中国崛起，重新成为世界强国；日本摆脱战败国身份，重新成为正常国家；朝鲜半岛克服分裂局面，重新走向统一。

他提到，在东亚主要国家力量对比发生历史性翻转、一种新趋势正在形成时，有关各方都会产生困惑、不适应。“但这只是一个短暂的历史过程，当这种历史趋势已成定势，一切都会恢复正常。”

□ 编辑 李光 □ 制图 美编 虎妹

日本高校“去文科化”之争

对日本政府来说，应当给予大学更多的空间，让其在实践中思考未来的发展问题才是明智之举，靠发布《通知》来指导大学改革不仅有越俎代庖之嫌，也难免让人怀疑其背后的政治意图。

特约撰稿 / 鲁净

由于今年夏天的一纸通文，日本文科系面临的危机正在一步步加深，反抗也在加剧。10月26日，日本17所国立大学的人文系学部长（相当于文学院院长）联名向文部科学省（下称“文科省”）递交抗议信，要求撤回通知，打响了“文科保卫战”。

这份名为《关于重新认识国立大学法人组织及综合业务的通知》（下称《通知》）是今年6月由日本文科省颁发的，旨在推进国立大学改革，其中提到“对以培养教师为主的教育学系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相关的院系予以裁撤，或者促使其转型以适应社会需求。”《通知》一出，日本国内立刻出现“废除文科”、“文化亡国”等质疑声，“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等批判声也不绝于耳。有学者更指出，无论70年前的暴行还是今天对和平宪法的背弃，日本政经“精英”一再显示人文精神的缺失。

文科省与大学之间的博弈

《通知》发布一个多月后，日本NHK电视台进行的一项针对64所大学的问卷调查显示，虽然所有被调查者均表示不会“废除”人文社会科学院系，但总体上有83%的大学表示“会考虑改革现有院系，削减人员”，其中25所院校对“通知的主旨表示理解”。而《读卖新闻》发表的另一项针对60所院校进行的调查

结果也显示，26所院校表示将对文学系进行裁撤或实施专业重组，其中17所院校总计将减少约1300人的招生规模。种种迹象表明，文科省的《通知》实质上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另一方面，对《通知》的批评则愈演愈烈。7月23日，素有“科学家国会”之称的日本学术会议举行新闻发布会，以“学术会议干事会”之名发表声明称，“人文社会科学作为支撑学术发展的重要支柱，与自然科学协同发展，而《通知》单独提出建议‘废除或重构’人文社会科学的做法令人费解。”

国立大学的反应则不尽相同。10月20日，各国立大学向文科省提交了未来6年的中期目标草案。据NHK电视台报道，包括东京外国语大学、九州大学等知名学府在内的33所大学表示有计划对文学系、经济学系等人文社会科学院系进行重组，横滨国立大学等9所大学明确表示将废除“教师培训”相关专业中的“免认证课程（无需取得教师资格证也可以毕业）”；但另一方面，信州大学等17所国立大学人文科学院系召开学部长会议并发表共同声明抗议文科省的《通知》，称“轻视人文社会科学将不可避免地从根本上动摇国家的人文基础”，要求文科省应充分尊重各大学自身的特点。

这场由《通知》展开的文科省与国立大学之间的博弈显得突如其

来，但事实上，日本社会对教育改革的议论从未间断过。二战后日本的民主化进程中，教育改革是重要一环。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吸取战前教训，摒弃过分注重职业教育的做法，着力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学术素养以及对民主的理解。这期间国立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得以迅速发展。但随着时代发展，国立大学的一些弊端也显现出来。由于直属于文科省，大学要想进行学科调整以及募集研究经费等，往往受到制约。例如，北海道大学国际传媒研究科的成立就是经过其前身——语言文化学系教员们长达十年的努力才得以实现的。

为了促进国立大学间的自由竞争、鼓励大学为社会培养多元化人才，日本从2004年开始正式实施国立大学法人化。在此过程中，许多大学也对组织结构及学科做出相应调整，而“学院派”与“实务派”的争论（即大学应该重视学问研究还是该为学生步入社会进行相关职业教育）也从未间断。正因为如此，文科省在这个时候发布《通知》就显得突兀和多余。

“人文社会科学与社会需求脱节，‘文科无用’等质疑一直存在，现在以《通知》的形式来‘老调重弹’，实在令人费解。”北海道大学文学系学者押野武志在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指出，“或许这与当前日本政

界及其支持者存在的‘重实学’倾向有关。”

独立性VS地方保护主义

面对坊间的争议，文科省在各种场合予以澄清和解释。文科省大臣下村博文8月10日接受《日本经济新闻》采访时表示，“《通知》绝无否定或轻视人文社会科学的必要性之意，也从未要求注重实学。”9月18日，文科省高等教育局局长出席“日本学术会议干事会”，向与会者分发了题为《立足新时代的国立大学改革》的说明文件。这份长达12页的文件一方面举例说明了所谓“废除”只是针对培养教员的新课程，另一方面解释《通知》重点是呼吁国立大学努力向社会需求高的领域转型。

对此，日本学术会议干事会10月

15日发表了主旨为“面向大学改革，形成国民共识”的声明，对文科省的解释给予一定程度的理解，但同时指出，单从《通知》的表述是无法读出上述所谓“澄清”内容的。干事会提出四点建议，敦促政府建立公众讨论的平台，听取社会各界对教育改革的意见，并呼吁大学应积极参与讨论，同时要求政府应提供足够的财政援助，以保障大学可以自主完成改革目标。

前北海道大学国际传媒观光学院院长、现于樱美林大学任教的高井洁司对《凤凰周刊》解释称，“日本国立大学一直实行‘教授会’制度，教授会对大学事务有决定权，确保大学自治。例如，对于安倍内阁推行的“新安保法案”，一些宪法学者就直指其违宪。”

前述日本学术会议干事会发表声明批判文科省《通知》也体现了学者的独立性，但另一方面，这样的自治容易形成类似“地方保护主义”的氛围，使大学组织趋于保守、不愿放弃自身利益、与社会生活严重脱钩。

“对安倍内阁来说，显然认为前者的影响是‘麻烦’，所以自然会极力强调改善后者问题的重要性。”高井分析道。而文科省的《通知》正是针对国立大学教育“难以适应社会需求”的问题而出台的。

在谈及国立大学如何面对《通知》的问题时，押野坦言，地方国立大学表现得更为焦虑。据称，日本的国立大学主要依靠学生缴纳的学费和政府拨款维持经营，但日趋严峻的“少子化”问题让确保生源成为大学的一大难题。同时，国际各大学竞

博识天下
一扫尽知

一码不扫，何以扫天下！



鳳凰週刊
PHOENIX WEEKLY

不信？来扫！

瞬息万事

信手可得

安倍政权高校改革一览:



2013 年

日本制定《国立大学改革方案》，要求国立大学向以下三个方向强化：世界性，负责尖端科研创新；全国性，负责国家科研活动；地方性，培养适应地方需求的人才。

2014 年

日本财务省公布《文教科学技术关系资料》，指出国立大学并没有很好地履行大学的社会职责，表明在国立大学改革方面将会通过运营经费的“倾斜配给”来促使国立大学明确自身定位。

2015 年

日本文科省发布《关于重新认识国立大学法人组织及综合业务的通知》，重申“人文社科专业”将作为组织改革的重点对象，其“合理化”方式要么是进行重组，脚踏实地、面向社会需求，要么是“废除”，为理工科发展腾出空间。该《通知》遭到包括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日本学术会议、大学教育团体以及日本各大媒体的强烈抵制。

争激烈，究竟要培养出什么样的合格人才，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都在思考。日本产业界中，针对日本大学培养出的文科生，出现了“和理科生相比，文科生的培养，从产业生产和技术改革方面，难以量化教育成果。日本的大学没有培养出拥有即战力的学生”等批判的声音。

而自国立大学法人化以来，日本政府以每年1%的规模逐年减少对国立大学的拨款，迄今已削减了约12%。从明年开始，日本政府明确提出拨款将对组织和业绩评价高的大学倾斜。这对本来就经营困难的地方国立大学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迫使他们在面对《通知》时不得不做出反应。

在前述NHK的调查中，滋贺大学是表示“不得不接受”的院校之一。滋贺大学每年的收入中近一半来自政府拨款，最近十年政府拨款缩水超过一成。该校正考虑在两年后设立文理结合的数据科学系。此外，一批冠以“地域”的相关学科名称也悄然诞生。比如福井大学为培养全球化以及搞活地区经济的人才，准备从明年开始创设“国际地域学系”。这些学科名称虽

然五花八门，但都显示出立足本地、服务地方经济的倾向。

影响高中教育及高考

另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是，《通知》的影响绝不仅限于大学与企业之间的衔接问题，它对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的影响将更加深刻。押野提到，高中在教学大纲的制定和教学重点的安排上都有可能进行重大的调整。

信州大学人文学系的吉田正明院长在前述文科学部长会议上表示，“文科省也应该充分考虑到参加高考的考生和毕业班教师的意见，向他们说明真正的意图。”与高中教师相比，学生以及家长们的困惑更加现实。

家住北海道札幌市的菅野女士有个正在读高二的儿子，她向《凤凰周刊》抱怨道，儿子比较擅长文科，也希望在大学时选择人文社会科学，但文科省的《通知》让她感到不安，不得不重新考虑儿子的高考问题。目前她将儿子送进补习班专门强化数学的学习，“虽然不确定将来会学文科还是理科，但提前做好准备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改变吧”。

押野更指出，从高考的层面分析，文科省的《通知》不免让人联想到政府在经济政策上的意图，比如发展新的“应试产业”。

而文科省对大学的“指导”也不局限在这次的《通知》上。今年6月16日，文部科学相下村博文在东京召开的国立大学校长会议上，再次敦促大学履行在开学和毕业典礼上升国旗、唱国歌的仪式。此举立即招致大学校长的非议，认为其发言是对大学自治的干涉。但事实上，关于国立大学升国旗、唱国歌的问题，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早在4月的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就曾表态称，“应该按照教育基本

法的方针正确实施”。但据统计，在2015年的毕业典礼上，升国旗、唱国歌的国立大学仅有14所，60所大学仅举行了升旗仪式，另外12所大学两项均未实施。而在举行升旗仪式的院校中，多数在会场上同时升起校旗或在场外升旗，唱国歌的学校中有一些仅仅是“演奏”了国歌。

日本将在明年的参议院选举首次允许满18周岁的公民投票，这意味着相当一部分高中生将拥有选举权。9月14日，日本文科省下发通知，要求教师秉持政治中立的教学态度。然而，在教育实践中，如何把握培育政治素养与保持政治中立的平衡无疑是巨大的挑战。日前，针对北海道某公立高中教师的办公桌上出现印有“不容忍安倍政治”标语的文件夹一事，北海道教育委员会以“涉嫌违反‘公务员应禁止政治活动’的准则”为由，对道内的中小学以及高中教师展开全面调查。对此，北海道高中教师工会公开承认其向1500名会员分发了该文件夹，同时声称“因未向组织外成员分发，所以不属政治活动”，并驳斥教委的调查是对教育实践的束缚。可以预见，类似的事件今后还将发生，随之而来的争议也就不会停止。

允许高中生参与选举，目的是希望让更多年轻人关心政治，而对政治的教育，并不是告诉学生政党孰优孰劣，而是让学生学习思考政治的方式，培养多元化视角。而这恰恰是人文社会科学作为科学研究根本态度。对政府来说，应当给予大学更多的空间，让其在实践中思考未来的发展问题才是明智之举，靠发布《通知》来指导大学改革不仅有越俎代庖之嫌，也难免让人怀疑其背后的政治意图。



(澳门航空公司)



(港龙航空公司)



(厦門航空有限公司)



(深圳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本刊为此版所列航空公司航班和酒店商务客房指定读物



(鑫海锦江大酒店)



(城市名人酒店集团)



(深圳富苑皇冠假日套房酒店)



(新都酒店)



(深圳马哥罗好日子酒店)



(银座泉城大酒店)



(深圳香樹麗宮酒店)



(深圳丹楓白露酒店)



(福州西湖大酒店)



(深圳海景奧思廷酒店)



(北京友谊宾馆)



(四川岷山飯店)



(云南天恒大酒店)



(杭州国际假日酒店)



(丽江官房大酒店)



(杭州天元大厦)



(广东富盈酒店)



(君亭酒店)



(北京金龙建国温泉酒店)



(南京中心大酒店)



(深圳维景酒店)



(青岛颐中皇冠假日酒店)



(井冈山中泰来国际大酒店)



(珠海怡景湾大酒店)



(珠海度假村酒店)



(帝豪花园酒店)



(珠海华骏大酒店)



(深圳戴斯酒店)



(常州大酒店)



(上海市虹桥宾馆)

中国潜艇出口的机与危

中国潜艇的整体性能与传统出口国相差不大，但在系统成熟度、可靠性等方面仍有一定差距。此外，传统出口国积累下的口碑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特约撰稿 / 谢瑞强

凤凰卫视10月13日的消息称，巴基斯坦国防生产部长侯赛因日前表示，中国向巴基斯坦出售8艘常规潜艇的协议已经敲定。分析指出，这不但能改变巴基斯坦的海上力量，而且对中国军火出口也具有标杆意义。尽管巴方并未透露出售潜艇的具体型号。但媒体纷纷推测，其或为S-20型元级常规动力潜艇。

在中国潜艇出口传出好消息的同时，此前热传的中泰潜艇交易却遭遇搁置。据俄罗斯卫星网10月1日报道，泰国新任海军司令纳·阿里尼特上任首次接受媒体采访时声明，泰国向中国购买总价为10亿美元的3艘潜艇的计划可能延后或是重审。

由此来看，中泰潜艇交易仍存在变数。中国新型外贸潜艇S-20和S-26T虽然吸引了不少潜在买家的注意，但到目前真正达成购买协议的只有巴基斯坦一家，中国潜艇出口机遇与挑战并存。

对埃及出口：实现零突破

潜艇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多次局部战争中都有出色的表现，被称为“水下杀手”。在潜艇家族中，核潜艇和常规潜艇是主要成员，但由于核潜艇出口的政治敏感性，因而一般只有常规潜艇在国际军贸市场上流通，其也成为潜艇军贸中的唯一角色。

然而，由于潜艇作战环境的特殊性和建造的复杂性，世界上具备

独立建造和出口先进潜艇的国家屈指可数，绝大多数有潜艇装备需求的国家并不具备先进潜艇的研制和建造能力，其拥有潜艇的方式一般只能从国外采购，因此就形成了一个较为庞大的需求市场。这样一来，潜艇也成为国际军贸市场中的高附加值武器装备，很长的时期内被德国、俄罗斯和法国等少数国家所垄断。

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在苏联的技术援助下逐步掌握了潜艇建造技术，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具备独立建造潜艇能力的国家，这也为未来中国潜艇的出口奠定了基础。60年代，中国建造的潜艇在性能上达到当时国际上的中等水平，具备出口潜力，但受制于政治因素，中国仅以军事援助方式向朝鲜转让了4艘033型潜艇和12艘潜艇的半成品配件（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军事贸易），可以说是毫无建树。直到1981年，埃及向中国采购了4艘033改进型潜艇，才实现了潜艇出口零的突破。

但事实上，033改进型潜艇综合性能大大落后于当时德国的209型等先进潜艇，中埃两国之所以能达成交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在苏伊士运河上有求于埃及，而埃及需要中国的苏制廉价武器。

不懈推销获得回应

在完成了埃及出口潜艇之后的漫长时间里，中国的潜艇出口处于停

滞状态。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潜艇技术落后，无法向客户提供合适的潜艇；另一方面是德国、俄罗斯和法国接连推出多种型号新型潜艇，在努力维系老客户的同时积极寻找新客户，中国的老旧潜艇在西方新型潜艇面前毫无竞争力可言。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通过引进俄罗斯潜艇和中国科研人员的努力，中国潜艇技术开始迎头追赶世界先进水平，039和039A/B新型潜艇的出现，表明中国潜艇技术有了长足进步。以此为契机，中国在新世纪推出了S-20出口潜艇；后来为了增强竞争力，又推出了更先进的S-26T潜艇。

2012年3月，中国在泰国防务展上首次展出S-20出口潜艇，并由中国潜艇的主要科研生产单位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国际贸易公司的工作人员做现场咨询和解答。此后，中国开始积极进军国际潜艇军贸市场，重点向巴基斯坦、泰国、埃及等传统军火出口国家推销潜艇。

中国的不懈推销也获得潜在客户的积极回应。

今年4月，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巴政府计划采购8艘中国潜艇的计划获得批准，而该计划据称早在2013年就提出了；7月，泰国海军设置的委员会对中国、韩国、德国等6国的潜艇进行了比较研究，委员会以多数票决定购买中国的3艘潜艇，只等采购计划被批准；9月，有消息人士

曝出,中国正试图以低于德国的报价向埃及方面出售两艘潜艇,埃及方面已经展开相关评估。

对巴出口成功“不具代表性”

作为一个具备完善工业基础的大国,中国一直在生产各种类型的武器。但谈到军火贸易,50年代中国曾提出“不当军火商”的口号,一直以无偿援助为主;直到70年代末,大陆市场才有了军售概念。进入21世纪后,中国对外军售逐渐扩大市场份额,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3月公布的报告,中国已超过德国和法国成为世界第三大武器出口国。

随着中国军事工业实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武器出口类型不局限于轻武器、火炮和装甲车等低端武器,参与土耳其防空导弹竞标红旗-9、出口巴基斯坦的ZDK-03预警机及“枭龙”战斗机都属于高端武器。高端武器是高附加值产品,可以带来更多利润。S-20和S-26T潜艇的推出,表明中国开始涉足水下高端武器的出口,成为高端武器出口的又一次有意义的尝试。

对于潜艇出口来说,如今也算迎来了最美好的时代:亚非地区正掀起一股潜艇军购热潮,一些未装备过潜艇的国家开始购买潜艇,而装备少量潜艇的国家也开始扩大潜艇装备规模或进行更新换代。这些国家中,一部分是中国武器出口的主要对象,中方在竞争中具有一定政治优势。

中国的S-20和S-26T潜艇水下排水量超过2000吨,S-26T潜艇应该是S-20潜艇的改进型,主要区别是加装了AIP系统(不依赖空气推进装置),水下续航能力更强,整体性能更胜一筹。两种潜艇配备了完善的综合声呐系统、火控系统和武器,整体性能和法国的“鲉鱼”、德国的214型和俄罗



斯拉达级潜艇处于同一水平。

谈及潜艇的竞争力,这是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潜艇性能、价格、可靠性甚至口碑都会影响潜艇的竞争力。价格方面,作为潜艇军贸市场的初来乍到者,中国必定会用较低的单价吸引客户,并且在支付方式上会根据客户实际情况选择更加灵活的方式,这对囊中羞涩的国家而言极具吸引力。

中国跻身潜艇出口国之后,国际上的潜艇军贸市场由曾经的德国、法国和俄罗斯“三国演义”变成现在的“四国厮杀”(韩国未掌握核心技术,瑞典已显疲态,实质威胁较小)。虽然竞争对手不多,但相互之间的明争暗斗十分激烈。

中国潜艇的整体性能与上述传统出口国相差不大,但在系统成熟度、可靠性等方面仍有一定差距。此外,传统出口国积累下的口碑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此次中国和巴基斯坦敲定潜艇协议是中国潜艇出口的一次难得的胜利,其背后深层次的涵义值得深思。今年8月巴基斯坦媒体曾披露,

巴政府同意向中国购买8艘新一代潜艇,该消息一经发出广受海外媒体关注,却迟迟未敲定正式协议。对此,中国澳门国际军事学会会长黄东曾表示,巴方表达有意购买中国潜艇已有多,但其同时也在跟其他国家的制造商接触,力图压价,该做法一度引起中方舆论不满。

黄东还提到,埃及官方迟迟不对中国潜艇表态可能也是在比价格,“(埃及)借中国跟德国讨价还价,争取更低的价钱”。

有分析认为,中国与巴基斯坦之所以能敲定潜艇协议得益于两国非同一般的政治和军事关系,不具有典型代表性;此外,鉴于印巴两国紧张的双边关系,印度重点发展海军的举动让巴基斯坦非常紧张,因此如何缩小或改善对印度海军的劣势,成为巴基斯坦军方一个优先解决的问题。如此来看,泰国、埃及等潜在购买国在购买潜艇时并不会过多着眼于与中国的政治关系,潜艇本身才是它们关心的重点,中国潜艇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也并非易事。●

□ 编辑 漆菲 □ 美编 虎妹

大陆军事论坛上披露的039B型AIP潜艇下水仪式。根据海外媒体报道,巴基斯坦海军向中国采购的是S20P型AIP潜艇,属于该潜艇的缩小型号,也是中国专门面向国际市场推出的一型常规潜艇。



太平洋海军迎来大调整 美海军靠什么折腾南海？

特约撰稿 / 田剑威

↑ 2015年10月19日，日本神奈川县横须贺市的驻日美国海军横须贺基地的水手们迎来“本福德”号宙斯盾舰。这是美军计划到2017年前追加部署的3艘宙斯盾舰中抵达的第二艘。

自从美国高举“重返亚太”的旗帜以来，南海无疑成为中美之间的“新热点”。

10月27日，美国派出“拉森”号宙斯盾驱逐舰进入南海，在中国渚碧礁和美济礁附近12海里以内水域巡航，理由是防止这些经填海造地扩大的岛礁影响到“航行自由”。中国驻美国华盛顿大使馆对此做出回应，希望美国不要滥用航行自由权利，将其作为显示自己军事实力的借口。当天傍晚，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还召见美国驻华大使博卡斯，就此事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

如此形势下，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于11月2日访问北京，引

发外界关注。虽然太平洋司令部发言人称，美军舰南海巡航不在议程单上，但“双方将坦诚探讨和管理分歧”的说法，给外界留下想象空间。

据悉，哈里斯在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演讲时称，美军将继续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行使国际法赋予的航行和飞越自由，南海不是例外。但他同时也呼吁中美应建立更密切的军事关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应称，看着最近一系列事态发展，感觉好像在看一出自编自导自演的戏。她还表示，奉劝美方切实尊重别国的主权和安全利益，真正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负责任和建设性作用。

对于美方密集的兵力调动，日本《军事研究》分析称，美军主要是反制中国在南海的“快速填海造地运动”，牵制中国建立“南海防空识别区”。“美国在南海问题仍然小心谨慎，免得在‘不情愿’的情况下被拉进一场不属于自己的战争中。”

第七舰队不够，第三舰队来帮

围绕中美因南海可能产生的冲突，《军事研究》特约主笔河津幸英撰写过多篇军力分析报道，他的结论是“中国太近，美国太远”，“天然的距离战斗力属于中国”。其中的依据之一是作为“前沿部署”的美国第七舰队并不具备在南海持久“兴风作浪”的本钱。

根据美国五角大楼官网提供的数据，驻横须贺的美国第七舰队第十五驱逐舰中队（DESRON-15）是现阶段唯一能长期向南海派遣作战舰的力量，它下辖七艘伯克级宙斯盾驱逐舰，即“柯蒂斯·威尔伯”号（DDG-54）、“约翰·S·麦凯恩”号（DDG-56）、“费兹杰罗”号（DDG-62）、“斯特塞姆”号（DDG-63）、“拉森”号（DDG-82）、“麦坎贝尔”号（DDG-85）和“马斯廷”号（DDG-89）。包括“拉森”号（DDG-82）在内的后三艘属于Flight IIA构型，拥有容纳两架SH-60B或MH-60R直升机的机库，是美国在南海实施持久巡逻乃至追踪中国潜艇动向的骨干。

即便如此，“很难想象中美会在南海爆发失控的武装冲突”，河津幸英指出，“因为这些大吨位主力舰不适合执行长时间的威慑巡航，况且南海密布珊瑚礁，严重限制宙斯盾舰的活动范围。”

因此，为满足五角大楼向南海投入更多军事力量的需求，据美国

《军事时报》10月2日报道,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斯科特·斯威夫特上将决定将原本集结在夏威夷的第三舰队舰艇更多投放到西太平洋水域,尤其加强在具有争议性的南海水域的海空兵力。

太平洋舰队下辖第三、七舰队,整个任务海域面积约2.6亿平方公里,司令部设在夏威夷珍珠港。第三、七舰队是以东经180度(国际日期变更线)为界,第七舰队负责以西直到东经17度的印度洋(不包括波斯湾、亚丁湾、阿拉伯海西北部),第三舰队的区域由此往东,北起北冰洋,南至南极,直到美国西海岸,面积约1.3亿万平方公里。第三舰队指挥部设在洛玛角海军基地,负责东太平洋作战任务以及美国西海岸至阿拉斯加州的防务,同时支援第五、六、七舰队的作战行动。

若以棒球术语来形容,第七舰队是首发投手,第三舰队是中继与后援投手,但按照目前态势发展,第三舰队很可能丢掉中继的角色,直接上场当先发。日本海上自卫队不久前在东京湾举行海上观舰式,该活动向来是由作为前进部署的驻日美国第七舰队司令代表美国海军出席,这回却一反常态地安排第三舰队司令诺拉·泰森中将出席,可谓涵意颇深。

同时,自从2013年开始菲律宾等国炒作中国在南海“填海造地”以来,美军机舰很少进入经人造扩大的中方岛礁12海里范围内。如今要实施“前进部署”的美国第三舰队,首要任务区就是南海。根据太平洋舰队相关消息,这项计划的用意是要消除行政管理界限,不过该计划目前仍在构想阶段。要知道,同一个任务海区有两个不同番号的部队在活动,却互不隶属另一个部队节制,这在美国海军历史上前所未见——以往任

何横跨国际日期变更线西去的美国军舰都须自动向第七舰队报到,接受该舰队司令部所节制。因此今后美国海军会如何运作,外界颇费思量。

美军难以兼顾全球热点

与此同时,美国海军陆战队也针对南海未来可能的事端,把三万名陆战队员(约占总兵力的15%)从美国本土转移到太平洋地区,其中将5000余名驻扎日本本土的陆战队员及其家属迁至关岛,冲绳和夏威夷未来分别维持1万人和8800人的驻军,每年向澳大利亚达尔文港轮驻一支陆战队,人数维持在2500人左右。此外,美国美军陆战队会参与更多在印度洋的任务或演习。

上述的兵力调动,是根据美军在2015年3月所公布的“21世纪海上力量联合战略”的精神,即要求美国海军的职能要做到维护全军执行“全球公域进入”(all domain access)。这表明,美国海上部队能自由出入所有海洋、地区和空天领域、网络空间及电磁领域。不过由于资源有限,未来美军活动重点会放在印度洋-东南亚-太平洋地区。

按照计划,美国海军在2020年以前将把总兵力的60%部署在该地区,届时四艘攻击核潜艇会以关岛为基地(目前三艘),最新的DDG-1000朱姆沃尔特级隐形驱逐舰和具有反导能力的伯克级宙斯盾驱逐舰、更多的濒海战斗舰、F-35战斗机及MQ-4C“海神”无人侦察机等兵力也会陆续进驻西太平洋地区。

总的来看,美国只有海军及与其关系亲密的陆战队在亚太方向做出大动作,理应呼应的空军及陆军却没有类似的调动。美国空军和陆军在叙利亚及欧洲都有难以脱身的事,陆军虽然尝试在亚太有更深入

着墨,但现在还是处于测试阶段,未来亚太陆地事务势必还是由陆战队唱主角。很显然,美军正处于一个拿捏不定的阶段,由于全球事务太多,随着兵力与预算的减少,未来会更加“顾此失彼”。

从逐步加强在中国周边的海空兵力来看,美军战略规划已为今后10-20年的亚太公海区域军事活动埋下伏笔,但中国在维护自身海洋权益,特别是岛礁建设方面不会买美国的账。

本港《亚太防务》杂志称,中美安全关系可区分态势与军力行动掌握两大部分:在态势部分,美军要的是能牵制解放军在南海的动态,而中国希望在维持主权与海洋利益下,不要干扰“一带一路”的经济发展。在军事行动部分,不管是美军或解放军,恐怕最想掌握的还是对方水下潜艇或水下无人潜航器的动态。由此看来,解放军只要采取“各打各的”方式,不正面与美国机舰交锋,有规则按规则,没规则警告几声,也不会擦枪走火。待撑到岛礁扩建完工,真正实质掌握的“范围”远比宣布带有敏感性的“规则”更具战略利益。

□ 编辑 漆菲 □ 制图 美编 虎妹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



★成立于1943年3月15日,1949年8月19日改名为美国海军第七特遣舰队,1950年2月恢复第七舰队的名称。司令部设在日本的横须贺港,驻地包括日本佐世保基地、冲绳和韩国釜山、浦项、镇海基地及新加坡等地,亦经常停泊香港补给,是目前美国最大的海外前线投送部队。用于威慑敌国和盟国合作,保护海上通道、协防美国盟国,也经常充当美国对外进行军事行动时的机动舰队。

美国海军第三舰队



★六个被编号的海军舰队之一。辖区在美国西部和北太平洋约1.3亿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包括白令海、阿拉斯加阿留申群岛以及北极部分海域)。这一区域是主要的石油运输和海上贸易交通线的所在,对美国及其在环太平洋地区盟国的经济健康至关重要。总部设在圣地亚哥的洛玛角海军基地,现任司令为肯尼思·弗洛伊德中将。

银川: 创新思路, 借势崛起

——访宁夏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杨占武

记者/赵福帅

中 外国家领导人、商业精英云集的中阿博览会永久落址银川; IB-HF(国际绕桶联盟)世界杯马术绕桶赛首次离开欧美进入亚洲, 在银川举办; 全球最高个人单项奖金的“WCA世界电子竞技大赛”永久落户银川……几年之间, 昔日的中国内陆城市银川一次次吸引全球瞩目。

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 “一带一路”战略规划加快实施, 银川市创新思路, 借势崛起, 着力经营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核心区和“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城市, 拓展与阿拉伯-穆斯林国家经贸人文往来, 全面融入“一带一路”。

银川在中国城市版图地位的提升, 吸引了全球高端生产要素加快涌入。仅2015年中阿博览会期间, 银川市就签订项目40个, 投资金额333.05亿元。

有观察人士评价, 银川有深厚的穆斯林文化底蕴, 位处丝绸之路及雅布赖航道要冲, 纺织、清真食品用品、能源、葡萄酒和旅游等特色资源优势明显, 有崛起为面向阿拉伯穆斯林地区的国际商贸、金融、文化交往中心的势头。

不过也有投资者顾虑, 银川市经济总量小、特色产业不强、区位优势不突出。

为此, 本刊专访了银川市委原副书记、宁夏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杨占武, 就银川市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角色定位、发展思路和改进方向等作出回应。

服务国家, 壮大自己

记者: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后, 西北各省都积极参与, 但“一带一路”的市场



杨占武

回族, 1963年生, 博士, 研究员。曾任银川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现任宁夏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 政协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届委员会常委。著有《回族语言文化》、《突破跨越——宁夏区域开发研究》、《政府采购: 寻租行为与最优监管》等。

空间和资源投放毕竟有限, 西北各省应如何协调, 宁夏应如何定位?

杨占武: 西北地区是传统陆地丝绸之路交流的核心区域, 在长达数千年中国与中亚、西亚及其以外广大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中, 中国西北地区始终处于最前沿, 历史积淀也最为深厚。

因此, “一带一路”战略一经提出, 西北各省区都依据自身特点, 提出自己的角色定位。比如陕西提出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排头兵、先行区; 新疆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 宁夏也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支点的构想。这些为国家在谋划各省市区在“一带一路”中的分工做了准备。

2015年4月, 国家发布的《推动共建丝

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在论及如何充分发挥国内各地区比较优势时, 对西北各省区已经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位。

依据国家对西北各省区的分工, 结合西北各省区的愿望, 我们可以取得这样的认识: 其一, 西北各省区应该作为一个经济文化特征相似的板块, 在“一带一路”建设大背景下, 推进新一轮的西部大开发、大开放。其二, 西北各省区要立足自身比较优势, 充分发挥各自的重要作用。其三, 宁夏应该充分发挥民族人文优势, 形成面向中亚、西亚特别是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地区的通道、商贸物流枢纽、重要产业和人文交流基地。

西部各兄弟省区都在努力抢抓“一带一路”战略机遇, 有竞争是难免的, 也是好事, 只要在省区之间和国家层面保持和加强协调, 就可以有效避免重复建设等问题。宁夏也一定要有全局定位, 结合特色优势, 打造出特色产业。

记者: 宁夏和银川被定位为中国对阿拉伯-穆斯林国家开放的门户。中阿贸易目前仍以海运为大宗, 银川如何绕过地理障碍, 发挥好门户作用?

杨占武: 建设中国对阿拉伯-穆斯林国家开放的门户, 主要目标是搭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高层对话、政策沟通、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的综合平台。这一平台, 将为中国各省、市、自治区与阿拉伯国家和世界穆斯林地区交流合作牵线搭桥、提供服务。概言之, 将以“门户”建设服务国家“一带一路”战略, 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政策沟

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同时，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发展壮大宁夏自己。

这意味着，宁夏并不将对阿贸易作为最重要的或者唯一的衡量指标；银川也将绕过地理障碍，重点在服务中阿交流合作方面下工夫。

建立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地区全面合作的多边协商机制，打造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地区政府要员、商界精英和专家学者共商经贸、金融、投资以及与发展相关问题的高层对话平台，使宁夏成为重要的国际性合作渠道，使中阿之间越来越多的经贸政策在这个平台上沟通，越来越多的国家在这个平台上展示推介自己，越来越多的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企业在这个平台上开展交流合作。宁夏的主要职责就是提供平台，提供服务。

比如推动中阿之间产能合作。分别在宁夏和阿拉伯国家及穆斯林地区建设中阿

产业园、中阿文化园、中阿商贸园、中阿科技园，推动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地区企业间的务实合作。

加强立足于中阿合作的服务能力建设。构建空中、网上、陆上三条通道，提升交通、通信等硬件建设水平，打造高效、通畅、有序的立体交通网络；建设社会和谐的文化生态，以及生态健康、景观适宜的人居环境，展示国家形象；建设研究中心、信息中心，打造信息共享平台；建设中阿语言大学，培养适应于对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地区开放合作的人才队伍。

立足比较优势，发展开放型的优势特色产业。把“走出去”与“引进来”结合起来，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因地制宜地发展优势特色产业，特别是大力推动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建设穆斯林旅游目的地和“一带一

宁夏小巨人机床有限公司，是机床销量位居世界首位的山崎马扎克公司（YAMAZAKI MAZAK）在中国的独资工厂，主要生产各类中高档数控机床，被誉为“中国第一座智能网络化机床制造工厂”。

路”文化旅游示范区；推动清真产业发展，努力树立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清真食品品牌，在世界清真市场中占据重要的份额。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记者：在中国发展进入新常态，并提出向西开放背景下，银川的竞争优势在变化，产业布局应如何相应调整？

杨占武：银川市主要应该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上率先发展。

首先，银川是我国通往中东、中亚的国际航线——雅布赖航线上距离内陆最近、航空位置也最佳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应借助这一优势，紧盯空中、陆上、网上“三大通道”，进一步打造“空中走廊”，构筑向西出境、向东出海、向北连通口岸的大通道。

其次，银川应着力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实现三次产业协调发展、深度融合，产业结构逐步向“三二一”格局调整。

工业方面，顺应国家战略型新兴产业推进方向，加快发展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生态纺织等新兴产业，推动工业由“重”向“轻”转型。目前，银川一批科技含量高的大项目正成为转型升级的生力军，轨道交通轴承、数控机床等十多项产品在全国领先，高端智能机床首次叩开了欧洲大门，出口德国、英国等国家。

农业方面，实现由“粗放”向“精细”转型，积极培育酿酒葡萄、供港蔬菜、适水产业、花卉产业、清真牛羊肉等优势特色产业，努力打造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区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区。如葡萄酒产业，银川酿酒葡萄种植基地达21万亩，葡萄酒加工企业（酒庄）达47座，在今年布鲁塞尔国际葡萄酒大赛上，4款银川葡萄酒获得1金3银的殊荣。

服务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大数据、电子竞技、通用航空、现代金融等轻资产、高回报新产业，推动银川科技园、iBi育成中心一体化发展，培育发展“互联网+”产业。

记者：2012年9月，国家批准设立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和银川综合保税区，几年



来取得了不小成绩,还需要做哪些工作?

杨占武: 国家批准设立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以来,首先是争取到了国家支持宁夏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政策支持。如安排中国—海湾国家自贸区谈判于中阿博览会期间在银川举行,将阿拉伯国家及穆斯林地区与宁夏签订清真食品互认协议作为谈判内容,并将宁夏确定为中国—海湾国家自贸区建设的重点合作省区;指导宁夏开展复制推广上海自贸区改革试点经验相关工作;支持建设中阿援外培训基地;支持宁夏企业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园区,并将境外投资项目作为储备项目向相关金融机构推荐争取支持,等等。

银川综合保税区的建设目标,是努力打造引领全区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新平台、中国向西开放的先导区、中阿投资与贸易合作的先行区。

未来,银川综合保税区要继续先行先试,创新发展。特别是要加快推进生物科技园、澳洲达肯(穆斯林)肉食品加工物流基地、润盈口岸建设等重点项目,力促黄金珠宝文化产业园、葡萄酒产业园、山东如意等项目投产达效,力争在航空产业上实现突破。加快推进跨境贸易电子商务,加强与迪拜杰贝阿



带通关一体化,加快构建向东出海、向西出境的开放大通道。

记者: 经过三届中阿经贸论坛和两届中阿博览会,银川作为中国与阿拉伯穆斯林国家的国际交往中心,合作交流的框架已经搭建成熟。下一步如何尽可能多地填充经贸投资内容,使银川成为中阿之间的经济交往中心?

杨占武: 2010年以来,宁夏已经成功举办了三届中阿经贸论坛和两届中阿博览会,

2015年度布鲁塞尔国际葡萄酒评比大赛上,宁夏仙谷兰轩2014年橡木桶酿造霞多丽干白荣获大赛金奖。

2015年9月,第三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大学校长论坛在银川举办。论坛期间,中阿高校共签订新的合作协议161项,包括中阿合作办学、人才联合培养、师生互换、高级翻译人员培养等项目。

美元油气装置设计制造采购项目;宁夏电建已完成安哥拉6516万美元热电站工程总承包项目。

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地区的一大批企业也走进中国,阿联酋投资的宁夏六盘山国际旅游休闲度假区已启动建设;埃及在吴忠清真产业园区投资近1亿美元,建设奶粉、蛋白质项目已落地。

银川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首府,又是中阿博览会的永久举办地,在中阿经贸合作方面可谓得风气之先。

为继续加强中阿经贸投资合作,银川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一是建设经贸合作机制。通过促进丝路沿线各国海关、检验检疫、投资保护、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的政策磋商,推动建设中阿贸易投资便利化示范区。二是夯实经贸对接平台。将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地区及国内有关省区连起来,促进在能源化工、农业科技、信息技术、装备制造、工程承包、清真产业、文化产业等方面的合作。三是打造金融合作平台。推动中阿

银川近年实现较好较快发展的最主要思路就是,审时度势,把自身置于全国乃至全球的发展中去谋划,抢抓“一带一路”战略机遇,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创新发展模式。

里自由区对接,打造中阿“网上丝绸之路”。加快建设进口肉类及水果、种苗口岸,加快建设一批清真牛羊肉生产加工项目,促进宁夏清真产业快速发展。全面复制上海等自贸试验区各项创新制度,加快研究申建中阿自由贸易区。用活用足“保税展示交易”等政策,建设保税展示交易中心,举办黄金珠宝、红酒及进出口商品展示展销会。

同时,要加快银川综保区及周边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生活配套和产业配套,进一步优化服务环境,深化丝绸之路经济

在国际、国内产生了深远影响,在经贸合作方面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一大批中国企业走向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地区,宁夏的中银绒业、宝塔石化、塞外香等49家优势民企和1家国企,在境外27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66家企业,在沙特、阿联酋、哈萨克斯坦、毛里塔尼亚、刚果(金)等丝路沿线国家投资农业、石化、采矿业项目。如宁夏塞外香公司在毛里塔尼亚投资建设5万公顷农业产业园区项目已于2015年7月启动;宝塔石化已完成哈萨克斯坦、安哥拉2575万



金融对话、投融资项目对接,探索建立中阿金融合作与创新服务平台,推动建设中阿金融合作示范区。四是建设经贸合作信息平台。推进中阿“网上丝绸之路”、中阿电子商务合作,推动中阿互联网试验区建设,打造信息服务中心。

审时度势,创新发展

记者:中国向西开放中,银川在人文、通道、平台等方面拥有独特的优势,但也存在经济总量小、特色产业不强、区位优势不突出等因素。你如何看待投资者的这种顾虑?

杨占武:经济总量小、特色产业不强、区位优势不突出这都是实际情况,但也可以通过产业设计来弥补。

我举一个例子:班加罗尔是地处印度南部的内陆城市,上世纪60年代,印度中央政府把重点国防和通讯研究机构,如科学研究所、国家航空研究所、雷达电子发展公司等设在该市,使该市的信息技术产业得到迅速发展,目前它已经变成印度的科学和技术中心。电子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兴建,逐渐发展成为全球第五大信息科技中心,班加罗尔也由此成为“印度的硅谷”。迄今为止,在印度“硅谷”创立的高科技企业达到4500家,其中1000多家有外资参与,

英特尔、通用、微软、IBM、SAP等131家国际知名品牌公司摩肩接踵。

任何地区的发展经验都不可能完全被复制,但可以提供一种思路和启发:只要发展道路选准、产业方向选对,一样可以获得巨大的成功。银川在人文、通道、平台等方面拥有独特的优势,是辐射周边500公里的大城市,经济发展具有广阔的纵深,完全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的辐射中心。

记者:如何进一步加强银川对外人文交流,使银川成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地区的文化交往中心?

杨占武:宁夏是中国唯一的省级回族自治区和全国最大的回族聚居区,与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地区具有信仰相同、习俗相近的文化优势。

银川作为宁夏的首府城市,应进一步加强与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地区的文化交流、学术往来、人才交流、媒体合作、青年和妇女交往、志愿者服务,增加相互间留学生,开展合作办学,互办文化年、艺术节、电影节、电视周和图书展等活动;合作开展广播影视剧精品创作及翻译,图书版权贸易,定期免费交换本地区的中文、阿拉伯语电视节目;联合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共同开展世界遗产的联合保护等工作。与阿拉伯国

家共同组建阿拉伯学院、中国阿拉伯研究院,大力发展语言产业,强化阿语人才培养基地建设,向全世界输送阿语翻译人才。要推动回族文化产业的发展,如文化产品制造业、建筑设计业、影视业、演艺业、文化博览业、文化旅游业等。同时,也可以联合打造文化产业精品项目。

在深化人文交流方面,还应注意发挥回族文化所特有的中国文化与伊斯兰文化共鉴互生、共生共荣的核心价值。

记者:近年来,银川作为西北内陆城市,举办中阿博览会,承办WCA等国际赛事,发展互联网、物流、葡萄酒等新兴产业,设综合保税区,未来申请中阿自贸区等等。你如何总结银川近年的发展新思路和新经验?

杨占武: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银川市经济社会发展表现不俗,取得了可喜的成绩。2015年三季度,全市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增长8.0%;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5%;地方财政收入增长10%;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8.0%和8.5%。

银川近年实现较好较快发展的最主要思路就是,审时度势,把自身置于全国乃至全球的发展中去谋划,抢抓“一带一路”战略机遇,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创新发展模式。

银川市提出“反梯度”发展战略,用银川市委书记徐广国的话说,就是“一步接轨产业前沿,零度承接高端产业,在新一轮竞争中抢占先机,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上率先发展”。

按照这一创新思维,银川市着力构筑对外开放大通道,加快打造滨河新区、综合保税区、阅海湾商务区等开放平台,强化对开放发展的支撑,大力发展新产业、新业态,如滨河新区的科技纺织、国际教育、健康医疗、大数据等,综合保税区航空、黄金珠宝、葡萄酒等产业。

这说明,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创新发展思路,持续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是保持经济活力、持续快速发展的必由之路。

食品生产出现结构性短缺

大陆谋求掌控国际农产品供应链

记者/赵福帅



2015年10月,市场传出消息,中国买家正筹划在澳大利亚竞购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约等于中国浙江省面积),连同近20万头牛,预计售价为3.25亿澳元(约合15.1亿元人民币)。

被认为有望中标的中资企业包括广州东凌粮油、上海鹏欣、上海证大和杉杉集团等。

英国《金融时报》对此评论,这凸显出中国中产阶层对肉类日益增长的需求。投资银行软件和数据定制服务商Dealogic数据显示,中国日益偏重肉类的饮食结构使得中国企业仅在过去5年就为食品领域的跨境并购支付近200亿美元。

事实上,近年中国企业赴海外投资农业已成潮流。

2014年底,伊利集团投资30亿元的新西兰大洋洲乳业基地建成投产,成为新西兰最大的液态奶和婴幼儿配方乳粉基地。该项目的婴幼儿配方乳粉运回国内的成本,也比内地生产低30%左右。

联想控股则在智利和澳大利亚投资水果生产基地。“在青岛我们种蓝莓,一公顷产1吨,而在智利一公顷产13吨。在中国一亩土地租金1200元/年,在智利土地买断是3000元/年。中国的土地腐殖质占0.2%,智利农场差的3%,好的达到15%。”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说。

中国农业企业纷纷“出走”的背后,是中国持续猛增的农产品需求与国内农业资源紧缺的尴尬,而且海外多种农产品比国内质优价廉,中国农业竞争力每况愈下。

需求猛增 结构性短缺明显

2014年,中国大陆粮食总产量60709.9万吨,增产516万吨,增长0.9%,已连续十一年增产。

但与此同时,内地去年进口粮食突破1亿吨。其中大豆7139.9万吨,三大谷物818万吨,大麦541万吨,高粱577.6万吨,玉米酒糟粕540万吨,木薯867万吨。

2015年中国夏粮实现

“十二连丰”。但据中国海关统计,今年1-9月中国谷物及谷物粉进口量为2608万吨,同比增加81.2%。此外还有猖獗的粮食走私。

据公开数据,从1978年到2013年中国大陆粮食产量提高了98%,几乎翻了一番,油料提高近6倍,水果产量提高37倍,水产品产量提高了12倍多。从1996年到2013年肉类产量提高86%,禽蛋产量提高了46%,奶类提高4倍。

在此情况下,为什么中国仍大量进口粮食与农产品呢?

“现在养活中国人需要30多亿亩的播种面积,中国耕种了20多亿亩,从国外进口的粮食相

当于使用了国外8亿亩耕地。”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在一次演讲中指出。这意味着,中国自身的农产品增速已经慢于居民需求增速。

而且,根据发达国家经验,中国对粮食与农产品数量需求的峰值还远没有到来。这主要取决于人口总量、城镇化、居民收入等因素。

2000年后,中国大陆人口平均每年增长600万-700万人,每年需要增加350万-400万吨粮食。

学术界对大陆人口峰值的预测在14亿到15亿人之间,这意味着未来20年大陆人口会增加0.4亿-1.4亿人,粮食需求总量增加160亿-560亿公斤。

按照中国政府颁布的新型城镇化规划目标,2020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60%,2030年达到66%。也就是到2030年还会增加3亿城镇常住人口,届时会有10亿人口在城市。这将对中国农业和世界农业格局产生深刻影响。

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有着不同的农产品消费结构,口粮消费比农村居民少30%左右,但其他农产品消费明显高于农民,蔬菜高出28%,植物油高出24%,肉类高出50%,家禽高出136%,禽蛋高出87%,水产品高出两倍以上。

而动物性食品往往消耗更多的粮食,比如生产每公斤猪肉需要消耗6公斤饲料。

此外,中国工业用粮需求也不断增长。

“根据韩国、日本等的食物消费增长规律,大约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万美元时,食

中国农产品需求猛增

2014

中国大陆粮食总产量

60709.9 万吨

中国大陆粮食增产

516 万吨

已连续十一年增产

增长
0.9%

2014

中国进口粮食突破

100,000,000 吨

大豆
7139.9 万吨

三大谷物
818 万吨

高粱
577.6 万吨

酒糟
540 万吨

木薯
867 万吨

大麦
541 万吨

2015
1-9月

中国谷物及谷物粉进口量为

2608 万吨

同比增加
81.2%

1978-2013

中国粮食产量
提高

98%

水果产量
提高

37倍

油料产量
提高近

6倍

水产品产量
提高

12倍多

1996-2013

肉类产量提高

86%

禽蛋产量提高

46%

奶类提高

4倍

但种植粮食收入微薄

农民种一亩粮食现金收入约为

754 元

稻谷
939 元

小麦
576 元

玉米
794 元

大豆
476 元

来源: 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物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才基本到位。我们离这个收入水平还有很大差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表示。

数据显示,过去10年,中国大陆肉类消费增长了1/4,饲料占粮食总消费量的比例达到40%以上,植物油消费翻了一番,糖消费增长了125%。

“我们预计到2030年,中国的食物需求增速会减慢下来。未来20年,中国已经进入食物供需难以平衡以及结构明显短缺的时期。”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焜说。

大陆居民来港购买奶粉则透露出对食品质量需求的增长。

中国大陆有两亿多农户,40多万家食品生产企业,300多万个食品经营主体以及难以计数的小作坊、小摊贩,加上疲弱的监管,消费者难以建立信任。

增产代价沉重且难以为继

一方面是中国居民日益增长的食物需求,另一方面中国农业面临的资源环境、生产效益约束已达极限。

中国人口比美国多10亿人,但中国的耕地比美国少10亿亩。中国人口比印度多1亿人,但是耕地比印度少6亿亩。俄罗斯人口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但耕地面积与中国相当。

中国用占世界8%的耕地、世界人均水资源的1/4,养活世界人口的20%。但是“目前所实现的生产能力相当部分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的。”李伟表示。

据统计,中国单位面积化

肥、农药使用量大大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化肥使用量从1990年的174.6千克每公顷,增长到2011年的351.5千克每公顷,利用率却比发达国家低20%。

有近一半的薄膜残留在土壤中,造成200-400年才能降解的白色污染。仅在新疆使用薄膜的土地就达4700万亩,每亩地残留达到16.88公斤。

由于长期超采地下水,华北平原出现大面积漏斗区。1996年到2012年,中国减少耕地近1.3亿亩。目前有5000万亩中度和重度污染耕地仍在耕种,大部分在高产地区。还有6000多万亩陡坡耕地、4000多万亩严重沙化耕地仍在耕种。

最新研究表明,中国的雾霾和使用化肥有关。中国的化肥亩均使用量是美国的三倍,海量的氮氮导致土壤、水富营养化,氮氮挥发后形成微生物最好的培养基,这种以微生物为主的二次气溶胶颗粒和工业污染的气溶胶协同作用形成雾霾。“雾霾天气又严重影响作物的光合作用,产量势必下降,而且会直接污染农作物。”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院长罗云波表示。

如何去掉这些不健康的产能,促进农业资源休养生息,又不发生大幅减产,是对中国的一大挑战。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农业在用工、土地租金、农资、农机等成本快速上涨,与外出打工比,农民种粮效益不断下降。中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每况愈下。

2004年到2012年,中国的

稻谷、小麦、玉米三种主粮的土地成本年均增长达15.7%，人工成本年均增长10.4%，农资与服务费用年均增长8.7%，都高于同期三种主粮生产价格7.3%的增长速度。

“农民现在种一亩粮食现金收入大概754元，稻谷是939元，小麦是576元，玉米是794元，大豆只有476元。”韩俊介绍。

随着农业生产费用继续刚性上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恐将继续受到抑制。因为在低价进口农产品冲击下，中国农产品成本上涨无法转化为价格上涨。

农产品价格全面倒挂

目前，中国主要农产品的国内价格开始全面高于国外农产品到岸完税价格。

国家粮食局局长任正晓9月在《求是》发文称，目前国际大豆、玉米、小麦、大米价格分别比国内价格每吨低1175元、923元、626元和1143元。另外，油菜籽的近期国内价格每吨高出国际市场5000元左右，糖配额内高出1400元左右、配额外高出500元左右。

随着成本上涨与进口增加成为新常态，如何维持中国农业的竞争力，成为一个现实问题。

“玉米、小麦和大米因为有关税配额限制，配额以外关税很高，今后三五年还不至于担心国外廉价谷物冲击中国市场，2014年中国谷物自给率还是98%以上。”韩俊表示。

不过，市场也在自发绕过配额限制。中国近年进口的大麦、高粱、玉米酒糟粕等爆发式增长，目的就是替代玉米做

饲料，2014年上述农产品进口替代了至少1000万吨玉米，与此同时，中国的玉米库存大幅度攀升。

形势更为严峻的是中国的油料、糖料与乳制品。配额以外的进口糖征收50%的关税后，仍比国内每吨便宜500元左右。美国一公斤鲜奶的收购价大约2元，澳大利亚、新西兰大约2.6元，中国的成本价是3.7元。中国一吨原料奶粉的生产成本比国外高出1万元。欧盟今年取消了实行31年的牛奶生产配额管理，目标就是进军中国等新兴市场。2014年中国进口乳制品201万吨，其中奶粉104.6万吨，中国奶制品进口占全球的20%。

在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中国农业部农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洪远表示，出现国内外农产品价格倒挂，核心是中国农业竞争力不够，“指标有三个，单位产出率、劳动产出率、资源利用率。中国的亩产还可以，劳动产出率和资源利用率都太低，因为中国农民的耕地面积太小，没有拉长产业链，比如只重视粮，不重视秸秆等资源利用。”

丰益国际集团（益海嘉里）董事长、首席执行官郭孔丰对此有同感，“一个大米加工厂可以将稻壳燃烧发电，米糠榨取稻米油，而且稻壳可以提炼30多种附加产品。中国每年生产的2亿吨水稻按照这种循环模式加工，不仅可以增值1000亿元到2000亿元，还可以每年节约2000多万吨煤炭，减少3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

中国食品结构性短缺明显

过去 10 年



中国大陆肉类消费



饲料占粮食总消费量的比例达到

1/4

40%以上

植物油消费翻了一番，糖消费增长了



125%

中国主要农产品国内价格已经高于进口价格

国际大豆、玉米、小麦、大米价格分别比国内价格每吨低

大豆

低 1175 元

玉米

低 923 元

小麦

低 626 元

大米

低 1143 元



油菜籽的近期国内价格每吨高出国际市场

5000 元左右



糖配额内高出

1400 元左右

配额外高出

500 元左右



美国一公斤鲜奶的收购价大约

2 元

澳大利亚、新西兰大约

2.6 元

中国的成本价是 3.7 元

中国一吨原料奶粉的生产成本比国外高出

10,000 元

2014 年中国进口乳制品 201 万吨，其中奶粉 104.6 万吨，中国奶制品进口占全球的 20%



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中国政府的托市政策也被认为是价格倒挂的重要原因。2004年以来，中国实行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等政策，以稳定粮食生产。国内收购价逐渐上涨，国际农产品价格近年却掉头向下，最终出现价格倒挂，结果是进口激增与过多库存现象并存。

郭孔丰就建议中国政府应调整目前的高价收储政策，“政府取代企业，把粮食高价收到国库，庞大的库存不仅消耗大量财政资源，也影响市场正常流通，引发诸多严重问题，进入恶性循环。例如2013年东北曾出现80%的米厂停工，因为原料供应不上。”

不过，宋洪远认为中国不会轻易停止补贴，因为补贴同时起到收入功能，取消补贴，农民收入就会下滑。“所以现在提出增加补贴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掌控国际农产品供应链

在中国农产品供求变化下，中国政府提出“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新粮食安全战略。核心目标是口粮绝对安全，大米和小麦自给率基本达到100%。基本目标是谷物基本自给，自给率在正常年份保持在90%以上。

“通俗讲，就是有的要保，有的要放，有的多保，有的少保，要考虑比较优势。比如奶制品，你生产成本又高，质量又低，还不如进口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否则你费死劲都白搭。”宋洪远说。

“2014年，中国谷物、大豆、油料、植物油、糖、肉类、

近年来中国企业部分海外农业投资项目



乳品等进口量近1.3亿吨, 受消费结构升级、资源及环境约束等因素影响, 保守估计未来10年上述农产品进口量将超过2亿吨, 占到国内消费总量的20%。”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表示。

可以预期, 在市场和需求的驱动下, 中国企业与政府必将更积极地全球布局, 以加强对国际农产品供应链的掌控, 或直接投资海外农业。

2015年7月, 新希望乳业作为最大股东与多家澳大利亚企业成立合资公司, 计划投资5亿澳元(约合22亿元人民币), 以奶牛养殖为基础, 并在产业链上下游投资。目前, 合资公司正建设万头奶牛牧场, 未来10年内, 将陆续投建两个万头牧场。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告诉《凤凰周刊》, 新希望近年积极在发达国家和优质产业带进行品牌、技术和资源合作。“6月份中澳自贸协定正式签署, 意

味着未来将有一系列针对双边贸易、合作的利好。我们认为这个时候该在澳洲做考虑了。”

根据中澳自由贸易协定, 双方奶制品关税4-9年内将降为零, 牛肉关税9年内降为零。

“合资公司建立后, 可以依托澳洲丰富的资源、成熟的技术服务, 为中国市场提供更多物美价廉的乳制品。”刘永好说。

事实上, 2013年, 新希望就收购了澳大利亚第三大牛肉加工商KPC。KPC年销售额超过30亿元, 80%以上供应海外市场, 中国是最大消费地之一。收购1年多来, KPC出口中国增长超过50%。

2014年11月, 在中澳两国领导人见证下, 新希望等20余家中方企业与20余家澳洲企业, 共同发起中澳农业与食品安全百年合作计划。刘永好透露, 双方企业拟在未来5年在两国投资100亿美元。“为中国高端的

动物蛋白和食品安全做贡献, 也为澳洲农牧资源对接中国海量市场奠定基础。”

中国的央企中粮集团则通过收购外资农业公司股权, 强化对全球农业供应链的掌控。去年10月, 中粮集团斥资30亿美元获得荷兰尼德拉和新加坡来宝农业的控股权, 实际控制了110亿美元资产, 获得26个国家的业务。

通过这次收购, 中粮首次在南美等海外核心粮源地掌控了种植、采购、仓储、物流和港口产业链条。此前中粮的粮食进口几乎完全依靠日本、美国等国际粮商, 比如中国进口大豆超过两成由日本丸红株式会社输入。“我们现在通过尼德拉在阿根廷一线直接从农民手中买到, 大大提升供应链效率, 提高对中国粮食安全和供应的保障水平。”宁高宁说。

中投公司5月宣布与中粮集团共同成立“中粮国际控股

公司”, 以打造国际农业投资平台。在保障中国与全球农产品供应方面, 中国国有公司的海外动作只是刚刚开始。

今年6月, 在巴西访问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赴桑托斯港口考察中粮集团投资项目。汪洋在考察后表示, “希望中粮在现在的基础上经营好, 做好海外的供应链建设, 形成自己的竞争力, 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发挥更大的作用。”

不过, 在实施更积极的全球战略方面, 中国大陆内部仍存在激烈争议: 非口粮农产品主要依靠海外, 是否也是一种安全问题? 玉米、大豆、肉、奶等国际农产品供应或价格若出现大幅波动, 居民生活势必受到冲击, 中国能否承受? 全球农业资源是否足够支撑中国未来需求? 本刊联系采访过程中, 一些采访对象就表示话题太敏感而谢绝。

盈利萎缩不良攀升 内地银行投资者进退失据

记者/曹蓓

四年前的某个公开场合，时任民生银行行长洪琦一句“利润高得不好意思”，成为很长一段时间内外界对于银行暴利的佐证。尽管有断章取义之嫌，但2011、2012年两年间，上市银行动辄超过30%的净利增速，为这句话提供了实实在在的证明。

但如今时过境迁。10月的最后一天，大陆上市银行的三季报悉数出齐。A股16家上市银行当中，工农中建四大行净利增速几乎为零，股份制银行净利增速也大部分落至10%以下。

更重要的是，交行和中行三季度单季出现净利负增长，分别较去年同期减少0.33亿元和6.1亿元。这是2009年以来中行第一次单季利润同比负增长。

不仅如此，曾经共同分享银行业鼎盛时期红利的战略投资者，现在也要挥手作别。10月23日，《华尔街日报》报道，花旗集团洽售所持中国广发银行20%股权，交易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达成。广发银行是大陆最后一家未上市的全国股份制银行，花旗银行为其最大股东。

几乎在同时，大陆国有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之一的信达资产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

转让所持广发银行股份时，显出较为迫切的情绪。据媒体报道，最新的转让价格为2.82亿元，而一个月前这一价格为3.13亿元，据此测算，目前的折价比例约为10%。

根据业内普遍分析，曾被花旗视为重点扶持对象的广发银行遭遇接连抛售，与其从2011年5月开始的上市之路频频遇阻有很大关系。而内地银行业的大环境又是净利增速持续下滑，资产质量愈加恶化，广发银行自然难以独善其身。

投资者似乎比外界预想的更为担忧，自今年上半年，中信银行、兴业银行就接连遭遇股权出售。而近期的消息是，德意志银行也可能减持华夏银行股份。对此，华夏银行向《凤凰周刊》表示并未得到相关信息。

特殊的投资者

2008年以后，已有多轮外资减持中资行股份的先例。原因不外乎三种，一是简单的财务投资者，低买高卖；二是对持股银行未来不看好；还有一种是自身的财务状况不佳，被迫出售。

但花旗出售广发的股份，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花旗对于广发来说，并不仅仅是战略投资者。

2004年底，困境重重的广发银行传出重组消息。此后，花旗集团与中国人寿、国电集团、中信信托等组成投资者团队，出资242.67亿元，认购重组后的广发行85.5888%的股份。其中，花旗集团、中国人寿、国家电网、中信信托各持股20%。

事实上，虽然与其他三家持有等额股份，但花旗的角色远非1/4这么简单。标准普尔董事曾怡景曾对陆媒称，花旗竞标团买的是广发银行的“潜力”，利用其覆盖全国的分行网络和规模庞大的零售客户基础，花旗竞标团可以开发资源，销售新产品。

这也是彼时多家境外投资者大规模斥资购入内资银行股权的初衷。不同的是，除了战略投资者以外，花旗的角色还有经营管理控制者。根据当时媒体的报道，在获得管理权之初，花旗就派出多达11人的管理团队，并且掌握要害部门，在16位董事中独占6席。同时，入股协议中，花旗的锁定期是6年，而其他股东的锁定期是3年，且花旗拥有购买其他股东部分或全部股权的优先权，最高持股比例可达40%。

甚至有外界评论称，花旗银行要把广发银行变成自己的

一个分行。但这当然会遭遇来自广发内部的抵触，于是开始了此后多年的争斗与磨合。

正是由于此前的高度介入，广发银行的身上花旗痕迹明显，因此外界对于此番花旗出售广发股权的直接影响理解为可能引起高层人事变动。而就广发而言，花旗的撤出影响几何恐怕不是最该担心的问题。

2011年，广发银行开始传出A+H股上市计划。但在此后四年多的时间里，终究未能成型。而广发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指标却频频逼近监管红线，在上市时间一再推迟的情况下，广发银行不得不多次发行次级债，缓解其资本压力。

而问题在于，资本金不足将制约其盈利能力和业务的开展，而业绩下滑则难以吸引投资者，进而会反过来阻挡其上市的步伐，这成了难以突破的怪圈。

离场者和进场者

虽然花旗出售广发银行股份有其特殊性，但多家内地银行在今年也遭遇了类似的境况。

今年1月，西班牙对外银行(BBVA)出售22.93亿股中信银行H股，约占总股本的4.9%，转让价约131亿港元。加上2014年12

月的一次减持,两次减持股份累计已经超过中信银行总股本的5%。减持后,西班牙对外银行的持股比例从9.6%降为4.7%。

恒生银行分别于今年2月和5月出售兴业银行股份,两次成交价格分别为13.36元/股和17.68元/股,两次售出股份数量占兴业银行普通股的比例分别为5%和4.99%。根据恒生银行8月份发布的半年报,其出售的兴业银行股权净收益达106.36亿港元,超过恒生银行上半年利润一半。

从以上两家银行的情况来看,外界对境外投资者离场理由的分析大多为单纯套利或弥补流动性,与内地银行经营状况并无明显的关系。

中信建投银行分析师张明对《凤凰周刊》表示,很多外资减持中资行的主要原因来自他们自身。从几家减持的外资行财报来看,大多处于亏损的状态。而且在国外流动性是很重要的监管指标,而在中国的投资属于权益投资,流动性较差,因此出于对流动性的考量也是他们抛售中资股的原因。

值得关注的是,在外资和其他国内投资人减持内银股份的时候,内地险资成为显眼的接盘手。而他们的目的,当然不会简单地局限于财务投资者,而是意在银行牌照。

上述所提安邦系自不必说,在恒生银行大幅减持兴业银行后,7月11日,兴业银行发布公告,人保财险和人保寿险双双增持该行股份。增持后,二者的持股比例分别达6.45%和6.7%,加之此前人保集团持有

的0.91%,人保系对兴业银行的合计持股比例已达14.06%。

《华尔街日报》在报道花旗银行出售广发银行股份时,援引消息人士称,中国人寿正在与多家银行接洽,希望最终收购一家银行,增强资产实力,中国人寿与花旗集团商谈良久,如今尚未有定论。另外一家收购标的为同样在上半年遭遇大股东减持的华夏银行。

就在近期,德意志银行曾公告称,将为所持的华夏银行股份进行减记,此举被媒体解读为预示可能减持这部分价值约35亿美元的股份。

但如此消息属实,外媒对中国人寿的收购标的的猜测就显得有理有据。

盈利放缓 不良上升

尽管对内地银行股份的减持和接盘都蕴藏着不同的意图,但盈利减缓,加上资产质量持续恶化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

今年的第三季度财报结束后,更加坚定了市场对于银行业尚未停止业绩减速的猜测。

同花顺统计数据显示,A股16家上市银行中,仅南京银行、宁波银行、北京银行三家城商行和平安银行一家股份制银行净利增速超过10%,其他全部落至个位数。其中工农中建四大行的净利增速几乎为零。第三季度,中行和交行的净利润同比都出现了下降。

一直以来过度依赖息差的银行,在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的挤压下正被迫转型,但如此大的盘子显然不那么容易。

10月24日,在降息降准的同时,央行宣布放开存款利率浮动上限。这是在2013年贷款利率放开后的又一关键性改革。各家银行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确定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的利率。而就在前不久,商业银行75%的存贷比限制已经取消。传统银行在一步步撤掉枷锁的同时,也渐渐失去了保护膜,行业内竞争进一步加剧。

与此同时,来自互联网金融的冲击也并没有手软。五家民营银行悉数开业后不久,招行就关闭微众银行身份验证接口,这被外界解读为对资金外

流的担忧。

陆媒的统计也可作为银行存款流失的佐证。据报道,数据显示,中行、农行、工行、建行活期存款占比分别从2013年的43%、55%、49%、55%下降至2014年末的40%、52%、48%和50%。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银行的盈利能力并不像净利增速表面那么悲观,事实上,更多的利润被银行用来核销持续增加的不良贷款。

中国银监会发布的监管数据显示。2015年二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0919亿元,较上季末增加1094亿元;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50%,较上季末上升0.11个百分点。

根据上市银行三季报统计,仅有三家城商行不良贷款比例在1%以下,股份制银行和大行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农行甚至超过2%。

招商证券研报称,上市银行不良净形成率仍维持高位,部分银行资产质量加速恶化,兴业、平安3季度不良净形成率超过3%。

即便如此,外媒报道称,许多分析师怀疑中国官方不良贷款数据的真实性,认为银行可能通过对逾期贷款进行展期或者延期隐瞒违约情况。

但业内也不乏乐观派,张明认为,从中报数据来看,银行不良贷款多发的制造业和商业占贷款比重已经落至约30%,结构调整已经慢慢显现。除非是爆发系统性风险,否则不良贷款整体可控。

□ 编辑 王毕强 □ 美编 虎妹



链接

“十三五”规划建议三个最核心内容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15年11月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在会上介绍了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的有关情况。



解读

渐进式延迟退休将出台

【本刊综合】延迟退休牵动最为敏感的民生神经。11月3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延迟退休政策将在“十三五”期间出台。此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曾透露，2017年将正式推出延迟退休具体方案。在老龄化背景下，延迟退休是必然的政策选择。延迟退休也能够缓解养老金的支出压力。据相关专家测算，中国退休年龄每延迟一年，养老统筹基金可增长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此外，“十三五”规划建议稿也将社保基金入市等多项充实社保基金的方案列入其中。包括：完善职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制度，健全多缴多得激励机制；实现职工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建立基本养老金合理调整机制；拓宽社会保险基金投资渠道，加强风险管理，提高投资回报率；以及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发展职业年金、企业年金、商业养老保险。

全面放开竞争性领域价格

【本刊综合】价格改革是历次改革的重要切入口。《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减少政府对价格形成的干预，全面放开竞争性领域商品和服务价格，放开电力、石油、天然气、交通运输、电信等领域竞争性环节价格。国家发改委价格司相关负责人曾表示，随着国内成品油市场经营体制的改革，特别是市场竞争的形成，成品油的价格将完全放开，交给市场，“到那个时候，油价调整可能会比现在更加频繁，就像如今的股票市场一样，涨涨跌跌，成为一种大众习惯的常态”。而对于水、电、气这三大公共资源品，目前阶梯水价、阶梯电价已经初步建立，阶梯气价在今年底有望全面落地。各地在制定阶梯定价的时候，第一档均能满足居民基本生活需求，从而确保大多数居民的生活支出不会出现明显增加。此外，阶梯定价的情况下，过度消费也必然意味着高支出，而这也促使居民提高节约资源能源的意识。

焦点

“十三五”经济增长底线6.5%

【本刊综合】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底线终于划定。11月3日，新华社授权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下称《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就《建议》起草的有关情况向五中全会做说明时说，确保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必须保持必要的增长速度。从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看，2016年至2020年经济年均增长底线是6.5%以上。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11月初访韩期间也表示，“我们提出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这需要今后五年经济年均增长6.5%以上。保持中高速增长是我们经济发展的既定目标”。当然，6.5%仅仅是未来五年经济增速的底线而非唯一目标，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仍然值得期待。

习近平在做说明时也强调，综合来看，中国经济今后要保持7%左右的增长速度是可能的，但面临的不确定因素也比较多。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王军认为，中国仍然拥有潜力巨大的市场规模，产业升级也后劲十足，在他看来，即使是在“十三五”期间，中国仍然有6%-8%的增长潜力。不过，既然中国正在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那么牺牲一定的经济增速肯定是在所难免的，而且业内也普遍认为，目前的中国早已摆脱了单纯追求经济增速的念头。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建议，“十三五”的经济增速要为结构调整预留空间，他认为，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既有增长周期的原因，也有发展方式的问题。

“不能因为短期内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就忽视了转方式、调结构的目标，更忽视了经济的发展质量。”此外，还有分析认为，未来五年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等也将成为平衡经济增长速度与经济发展质量的砝码。

6.5%

1 中国成人用品第一股



● 2015年11月1日,万得福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在浙江金华举行了上市暨品牌启动发布会。

万得福专业生产各系列高档仿金属餐具、日用品、智能创新厨房用品及餐厨礼品套装等。目前已有现代化厂房四万五千平方米,以“智能工业4.0”为核心生产基础,是一家集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的“中国制造”型企业。本次发布会最大的亮点,就是万得福进入成人用品行业,并成为“中国成人用品第一股”。

“万得福股份的商标和英文简称是WONDERFUL,翻译成汉语就是精彩的意思,而万得福的核心宗旨就是,不论是传统行业‘高端餐厨用品’,还是新介入的‘成人用品’行业,都是为了提升人们的‘精彩生活’。”万得福董事长秘书胡灵芝解释道。(高小影)

3 “洁家优”——一键开启美好生活



● 洁家优是一个预约钟点工、保姆、月嫂的网络家政服务平台。目前洁家优已与百余家家政公司达成合作协议,洁家优在收到用户下单时直接按照用户需求、服务地点位置判定,将订单信息通过该系统传给家政公司,家政公司通过系统完成派单以及整个服务流程的跟踪。

海量服务人员精准信息,互联网一键下单,保姆上门面试,实时评价,线上付款。同时洁家优还为家政服务人员提供完善的保险,使用户再也不用担心各种意外情况的发生和财产的损失。有效的提升了效率,避免了原来传统的电话约单,再电话派单的实效性不佳,财物管理凌乱等诸多问题,让用户能够享受上真正的国际化家政服务。

未来O2O行业的发展将更加关注用户对于产品的体验,这决定了产品设计更应体现人文关怀。洁家优将会一直以此为方向,力求为用户创造完美的服务体验和产品闭环,让人们更轻松地享受美好生活。

2 “爱我中华·共赢未来”创业创新主题论坛举行

● 为进一步加强与旅港绍籍第二、三代青年交流和联谊,展示绍兴青年创业创新的成果,让旅港绍籍青年感受家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变,凝聚“爱我祖国”之共识,开拓“共赢未来”之空间。共青团绍兴市委联合相关单位主办,绍兴市青年企业家协会联合相关单位承办的绍港两地青年“爱我中华·共赢未来”创业创新主题论坛活动近日在绍兴国际大酒店举行。

论坛上,团市委书记、市青联主席韩彬翔首先致辞,介绍绍兴团市委近年来围绕青年创业创新主题开展的各项工作。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锋、资深香港律师石川、香港蜂传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汤霆雄、绍兴振华阳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章琦、浙江优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国栋、绍兴市文理学院元培学院院长章融教授就创业创新主题与与会青年分享实践、体会、感悟。

本次活动以“爱我中华·共赢未来”为主题,意在为绍兴及香港两地创业创新青年开辟一个沟通渠道,通过树立优秀的创业创新青年代表,使他们在各行业中真正起到标杆和引领作用,在全社会营造利于企业家、创业者成长的环境和气氛,为传播创业精神、推动经济社会展、促进两地的青年交流和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梁颖睿)

4 中国兰溪城市创新改建

● 作为兰溪市的核心地段的城中村,排岭村历史悠久,存在基础设施落后和脏乱差等问题。近年来该市城市化进程步伐稳步加快,早在2013年9月16日,兰溪市委、市政府正式公布了《排岭村集体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办法》,启动了排岭村集体土地房屋征收安置工作。启动后,三周完成70%,六周完成80%。

在征收安置过程中,使村民拍手称好的一大利好政策是“双高套”政策,是最大程度惠民的一大体现。村民们既可以选择按照现有合法有效房屋占地面积标准,也可以选择按照兰溪市农村私人建房限额标准,来就高确定安置房占地面积。

再此次项目开展中,兰溪市委市政府结合“三改一拆”,打造“美丽城市”,不仅改善了城市整体形象、提高群众生活水平,更实现了社会经济发展与民生事业双赢的局面。(高小影)





“她”的伤口



阿富汗楠格哈尔省首府贾拉拉巴德，一名女童在砖厂打工。国际劳工组织早前公布了一份阿富汗童工问题调查报告：仅阿富汗楠格哈尔和喀布尔两省的砖厂工人，超过一半是童工，80%的9岁儿童已经开始从事劳动，只有15%的阿富汗儿童能够上学。摄于2015年1月6日。

深绿色、浅绿色、黄色、红色，这一组颜色代表不同程度的男女权利保障差异。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性别差距指数地图中，中国是黄色，处在世界范围内的中等水平；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地区是浅绿色，做得较好；北欧地区是罕见的深绿色——女性权益保障最为充分。而在西亚、南亚、非洲广泛地区，它们是醒目的红色。

在一个“她”被区别对待，被歧视，乃至被侵害的地区，女童权益的问题首当其冲。在中国，过去围绕“她”的概念是缠脚、童养媳等。在呼吁并推动了多年的男女平等以后，旧时代的问题基本匿迹，但女婴有时仍容易被抛弃，女孩的受教育权利更难保障，女童早婚早育的现象在西南地区亦很常见。

在非洲和南亚，女童早婚更为普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披露，至少在埃塞俄比亚和西非部分地区，女童甚至在进入青春期前的七八岁就结婚。尼日利亚北部的凯比省，女童结婚的平均年龄为11岁，而全国的平均结婚年龄是17岁。统计相关地区早婚的具体数字很困难，因为很多此类婚姻都不会做正式登记。父母们让女儿早早出嫁的原因有很多：贫困的父母可能将女儿看作是经济负担，女儿出嫁可以为全家人带来生存机会。也有的父母希望早结婚让女儿得到男性的保护，免受性骚扰的伤害。早婚还被视为避免女孩未婚先孕的方法之一。性别歧视也助长了早婚现象：女孩早早结婚可以保证她们在丈夫的家里顺从听话，更多地生育孩子。

但对孩童来说，早婚的伤害显然严重。一旦结婚，女孩们通常不再上学；女童在未完全成熟的情况下怀孕会增加母婴死亡率；十多岁的女童更容易感染包括艾滋病在内的性传播疾病；虐待在儿童婚姻中也很常见。此外，如果女童拒绝结婚，或者没有听从父母的意愿而自行选择结婚伴侣，她们通常会遭到惩罚甚至被家人杀害，这种行为被一些文化认为是“大义灭亲”的正当行为。

性剥削更令女童权益保障问题难以回避。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称，性行为通常被视为个人隐私，所以社区不愿意干预此

类事件,这加剧了儿童遭受性剥削的可能。在一些地区,谣传和处女发生性关系能够治愈艾滋病,以儿童为目标的性旅游业更是推波助澜。数据显示:在东南亚湄公河次区域,1/3的性工作者年龄在12到17岁之间。墨西哥社会机构的报告称,该国有多达1.6万名儿童参与卖淫,集中在旅游胜地。亚洲和东欧年仅13岁的女童作为“邮寄新娘”被拐卖后,面临打工甚至被迫卖淫。

令人畏惧的现象还包括非洲地区的女性生殖器“割礼”——一种部分或者完全切除女孩外生殖器的做法。割礼通常在孩童时代和青春期进行,年龄通常在4到14岁

之间。但在一些国家,将近半数的割礼是在1岁之内进行,比如厄利特里亚,这一比例为44%;而在马里,这一比例为29%。接受割礼的女婴、女孩可能在手术过程中面临大出血、大面积感染、乃至死亡,此后她终生还将因此面临其他健康威胁。根据非洲地区目前的出生率,据估计每年大约有200万女孩面临割礼的危险。

在非洲,迫使女性实施生殖器割礼的原因有很多:一些地方旨在控制或者减少女性的性行为;而有的地区认为这是女孩成为女人、进入社会以及保持社会凝聚力的标志;还有地区以女性生殖器为肮脏丑

物,力图割除;甚至有人认为这可以提高生育能力和孩子的存活率;最后是宗教的长期影响:将女性割礼当作宗教的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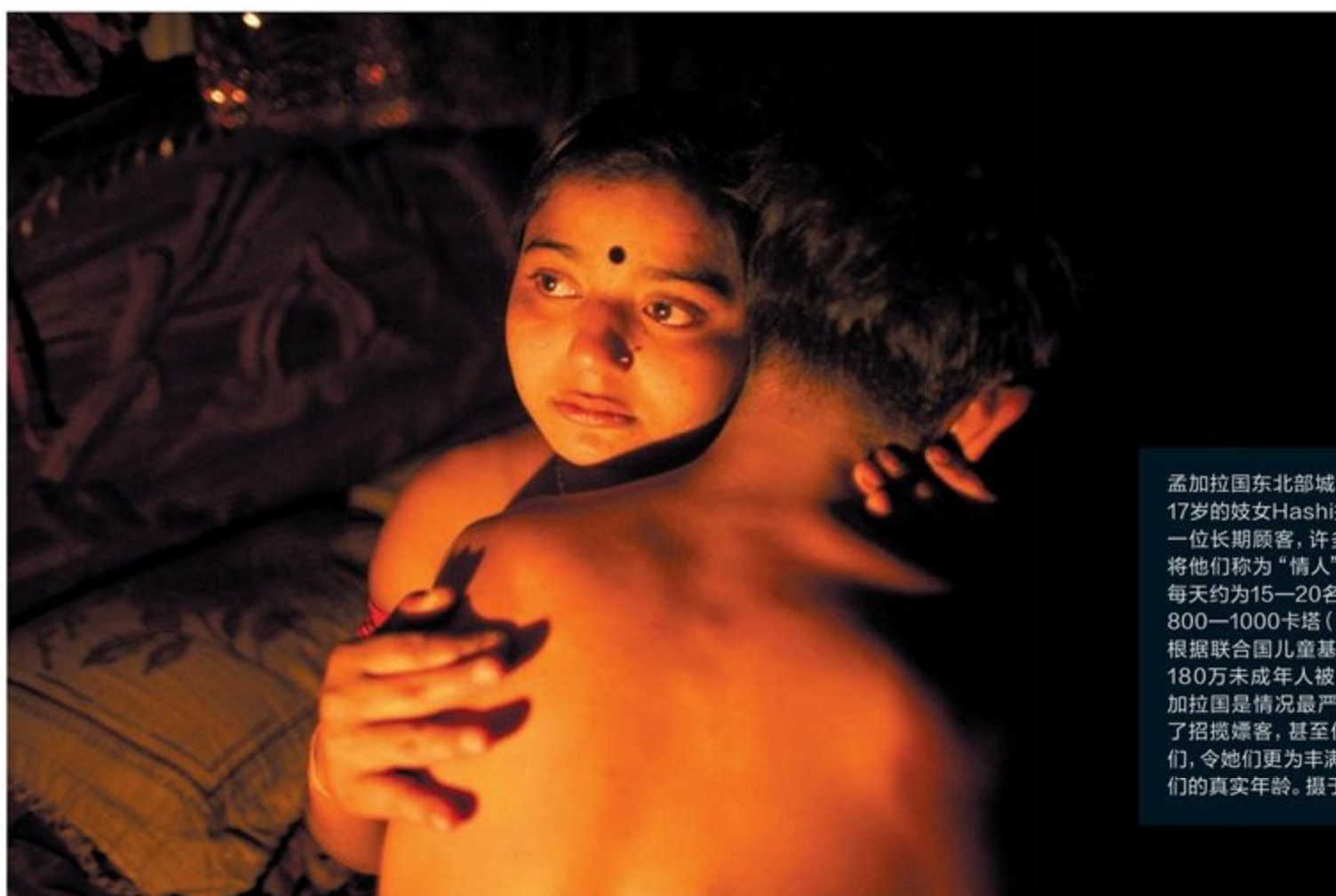
面对这些复杂问题,推进女童权利保障可谓困难重重。联合国的资料显示,过去数十年里,全世界女童在死亡率、受教育情况上有所改善,但促进性别平等的步伐太过缓慢,采取的行动还太碎片化、不够全面。201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宣布每年的10月11日为国际女童日,以期提高女童各方面的待遇。许多身处安稳富足中的人们并不了解,这条路有多么漫长。(曾鼎)



伊拉克撒拉丁省首府提克里特,14岁的伊拉克男孩Hussein Younis Ali和17岁的新娘Nada Ali Hussein提早走入婚姻殿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表的一份报告称,世界各地有数百万女童被迫提早结婚。摄于2013年10月8日。



印度拉贾斯坦邦西北部巴兰县，14岁的Krishna是一名少女母亲，她要在这个村子里将怀中4个月大的Alok养成人。印度童婚不被法律许可，但现实中这一现象非常普遍。印度少女们身体往往还没有发育完全，再加上营养失调，她们的分娩经常引发致命后果。据悉，印度每年有10万名年轻母亲和100万名婴儿死亡。摄于2013年1月21日。



孟加拉国东北部城市坦盖尔县的妓院里，17岁的妓女Hashi抱着她的“丈夫”。这是一位长期顾客，许多年轻的孟加拉国妓女将他们称为“情人”或者“丈夫”。Hashi每天约为15—20名顾客提供服务，赚大约800—1000卡塔（约60—70元人民币）。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数据，全球约有180万未成年人被迫从事性交易工作，孟加拉国是情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鸨母为了招揽嫖客，甚至使用类固醇药物催熟她们，令她们更为丰满更有吸引力，并掩饰她们的真实年龄。摄于2012年3月4日。



叙利亚北部城市阿勒颇的街道上，持枪女童跟叙利亚自由军的士兵坐在一起。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2015年发布报告称，叙利亚内战是近代史上最恶劣的人道灾难。叙利亚境内560多万儿童和青少年的生存状况极度困难，200万儿童和青少年生活在救援无法抵达的地区，260万儿童和青少年失学。逃离家园的叙利亚难民儿童人数超过100万。摄于2013年8月1日。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模特学校，女孩练习猫步以期实现模特梦。在国际选美比赛中夺得最多花魁的委内瑞拉，美女制造业的女孩年龄越来越小。模特培训学校对“任何年龄、任何社会条件的女童、少女和妇女”都开放。她们在这里学习微笑、走步、唱歌、化妆、公共场合讲话技巧，甚至如何正确地进食。选美是她人生发展的道路，每位委内瑞拉小姐必须是一位各方面都完美的女士。摄于2009年8月27日。



乌干达首都坎帕拉贫民窟，女孩Kirabo Beatrice在当地NGO机构组织的军事课程上练习动作。据乌干达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有超过70万的6至12岁学龄儿童从来没有接受过学校教育，大约2/3的乌干达儿童无法完成他们的小学教育，其中又以女童居多。一些NGO组织和国际机构正在帮助乌干达的这些孩童重返校园。摄于2014年11月1日。

□ 图片编辑 丁大伟
□ 文字编辑 路琰
□ 美编 虎妹



美国加州洛杉矶市郊的贫民区，“希望花园家庭中心”公寓，8岁的Lilly Earp在为6周大的妹妹Emily换尿布。“希望花园家庭中心”由洛杉矶“联合拯救任务”组织运营，为无家可归的女性和儿童提供居所和食物。摄于2012年1月25日。



小国的愤怒

电影《暗杀》背后的韩国抗战史

文 / 王戡

化装成新娘的韩国独立军战士，联合伪装成日军少尉的雇佣枪手，在婚礼上打死日本将军和卖国商人，完成了暗杀任务。2015年9月中旬，以1930年代抗日斗争为背景的韩国电影《暗杀》在中国大陆上映，夹在《碟中谍5》和《港囧》两部十亿级大片之间，虽然票房平平，却意外获得不俗的口碑。

《暗杀》在表面上是一部用全智贤、李政宰、河正宇等一线明星支撑起来的动作大片，但在华丽表象的背后，是对角色塑造和背景设定的精雕细琢。剧中主角往返东北、上海和汉城，并非只是为了渲染场面的商业化噱头，而是对当年韩人抗日志士经历的再现。

“你以为你是李奉昌、尹奉吉吗？”

虹口公园是上海日本租界的地标，这一天尤其热闹。日军第9师团等部在公园西侧

的体育场举行阅兵仪式，一队队戎装整齐的军人陆续通过司令台，接受在沪日本军政要员的检阅。前来观礼的日本侨民摩肩接踵、人声鼎沸。

接近正午，分列式进行完毕，全场正齐唱日本国歌。突然，一个“行军水壶形的怪物”被扔到了台上，仅仅两三秒后，爆炸掀翻了司令台，不少人被抛到空中，又坠落地面。方才披挂整齐的大人物变成衣衫不整的血人，有的被炸断了腿，有的满脸血污，还有的已经停止呼吸。台下的军警很快抓住了行凶者——一个西装革履的青年，他被打昏之前一直在喊着什么，但是没有人能听得懂。

这不是电影中的场面，而是发生在1932年4月29日的一次袭击，一场韩国抗日志士对日本军政要员的暗杀。执行者是25岁的尹奉吉，策划者则是流亡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国务委员金九。

导演崔东勋将《暗杀》故事设定在虹口公园事件一年后，金九和另一位韩人抗日运动元勋金元凤联手，派遣安沃允、黄德三和秋尚沃三人行刺朝鲜驻屯军司令官川口真守。历史上，金九确曾派遣李德柱等人回国刺杀日本朝鲜总督，但未成功。时任朝鲜总督宇垣一成日后官至首相，朝鲜军司令官川岛义之中将也在一年多后升任陆军大臣。

现实中，尹奉吉的成绩比屏幕虚构故事更加出色。当着数千日本军人和侨民的面，年初刚刚指挥上海之役取得胜利的白川义则大将，以及上海居留民团行政委员会委员长河端贞次被炸身亡，第9师团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和驻华公使重光葵各丢了一条腿，海军第3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中将失去了一颗眼球。

影片中处处可见这场暗杀的影响。金九用于藏钥匙的照片，便是尹奉吉行动前拍摄的遗照。安沃允等三人出发前，也像尹



奉吉一样在太极旗前悬挂誓言、手持炸弹拍照留影。故事进展到1945年日本投降,外相重光葵登上“密苏里”舰签署投降文书时,导演还让观看新闻影片的韩人指出“他在上海被爱国志士尹奉吉投掷的炸弹炸伤,因此拖着伤残的腿登上了‘密苏里’号战舰”。

这不是韩人在1932年实施的第一次暗杀。影片中,雇佣杀手“夏威夷手枪”决定参与暗杀川口时,他的助手问道“少爷你以为是李奉昌、尹奉吉吗?”排在尹奉吉之

韩国电影《暗杀》海报与剧照。

前的李奉昌,便是另一场暗杀的主角,他的目标是日本天皇裕仁。

1932年1月8日中午,裕仁一行在东京代代木练兵场阅兵完毕、返回皇宫途中,于樱田门外遭到袭击。两枚手榴弹在队列前部宫内大臣一木喜德郎的马车左后轮处爆炸,一名近卫骑兵受伤。掷弹者正是李奉昌,他发现目标失误,抽出随身携带的太极旗挥舞,高呼着“大韩独立万岁”在现场被捕。

这场暗杀的策划者也是金九。李奉昌曾给日本人做养子,但始终怀抱光复祖国之心。1930年底,他到上海参加反日运动,扬言“我去年在东京时,碰到天皇去扫墓,他们让行人跪伏在地。我伏在路边就想,这时候如果我有一颗炸弹,一定可以杀死他”。其他志士因他流利的日语和日本式的生活习惯深感怀疑,只有金九相信他的真心,赞同他的壮志,并准备费用和炸弹助他踏上征途。事实证明,金九没有看走眼。

李奉昌、尹奉吉之外,金九还曾派遣崔兴植、柳相根等人刺杀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白贞基、元心昌等人也曾筹划刺杀接替重光葵的驻华公使有吉明,都以失败告终。

韩人为何在1932年之后屡屡组织暗杀?金九有过说明,“当时日寇破坏中韩两个民族间的感情,制造了万宝山事件(日军利用侨居中国东北的朝鲜人与当地人的冲突,强占当地人土地,并扬言朝鲜人被杀),于是在朝鲜发生了屠杀,仁川、平壤、汉城、元山等地,一些无赖韩人受日本人唆使,见中国人就杀”。加上“九·一八”事变后一批韩籍浪人与日本人狼狈为奸、四处作恶,导致中国各界对韩人都抱有恶感,为了提振精神、恢复名誉,金九才决定组织暗杀和破坏工作。虹口公园事件后,金九投书上海各大报,宣称“余之武器为几杆手枪与几枚炸弹。余继续奋斗,并在余国未恢复



前决不终止”。

出发之前，李奉昌特意前往临时政府成员安恭根的家中宣誓，安恭根是1909年刺杀伊藤博文的安重根最小的弟弟。对深知自己将一去不归的刺客而言，能对着先烈安重根的家人宣誓，是此生最大的荣誉。然而无论成败，这些刺客之后的命运都和安重根相同，被逮捕、审判、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至于全身而退或者痛快地当场战死，只是电影中的情景。

抗日武装斗争的兴落

韩人抗日的方式并非只有暗杀。

影片女主角安沃允是“李青天韩国独立军第3小队的狙击手”，助手“速射炮”秋尚沃则是“新兴武官学校”最后一届毕业生。这些组织，代表了韩人抗日运动的另一面——武装斗争。

李青天在1940年9月出任中国政府支持的“韩国光复军”总司令后，曾撰文称“韩国光复军这个名称，骤看起来，好像是初次听见的新名词。其实，自1907年8月1日韩国国防军被日寇强迫解散之后，韩人对之称为义兵运动，也叫光复运动”，以此表示光复军的历史源远流长。安重根便自称义兵中将，但手下没有半个兵。

义兵运动以及由此引发的日军镇压，使韩人抗日斗争的重心转移到了中国东北地区。

“新兴武官学校”源自1912年设立于吉林柳河韩人聚居地的“新兴讲习所”，1920年4月改为武官学校。该校有2100多名毕业生，抛弃家业从事抗日运动的青年，像影片中秋尚沃一样写血书宣誓的不在少数。李青天曾任教官、校长，金元凤也是该校的早期学生。

《暗杀》中提到“金佐镇将军取得青山里战役的胜利”，以及之后日军的屠杀都发生在1920年。这年夏天，活动在中韩边境地区的韩人抗日武装已经有十多支队伍，共2900多人，拥有2600多支枪，频繁对中韩边境日本军政机构发动袭击。

韩人的活动自然引起了日本方面的注意。1920年10月，日本驻珲春领事馆遭到土匪袭

击，11名日本人被杀。日军声称有“不逞韩人武装”参与其中，无视中国政府的抗议，出兵中韩边境地区“清剿”。青山里战役，便是发生在这一时期的一系列抵抗战斗的总称。

据韩人回忆，从10月20日到26日，韩人抗日武装毙伤日军1500多人。这个数字恐怕过于夸大，毕竟缴获只有“机枪4挺、步枪53支、马枪31支、弹药5000发”而已。而且，7天的战斗未能击退日军，韩人聚居地遭到血洗。如影片提到，“27天里就有3769条生命死去”。在珲春、延吉、和龙、汪清四县，5000人被逮捕，近3000所房屋、学校和教堂被烧毁。

叛徒廉硕晋在影片中痛陈，“韩国独立党、韩国革命党、朝鲜革命党、义烈团、高丽共产党，三十几个独立团体斗来争去，各自都有不同的现金来源，所以没法联合起来，全都是垃圾”。党团组织尚且如此，涉及人员、枪械的武装团体更是复杂。

1920年12日，北满的十多支抗日队伍曾联合组建“大韩独立军团”。一年后便瓦解分裂。1922年8月，南满的8个团体也组成了“统一府”，很快又分裂成义军府、大韩军民府。1920年代中期，形成“参议府”、“正义府”、“新民府”三个军政集团，并且承认服从上海临时政府的指挥，但未及商议统一又各自分裂。安沃允所在的韩国独立军，是从新民府分裂出来的“革新议会”经过



多次演变形成的。

日军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占领中国东北全境，直接出手打击韩人抗日武装。很多韩人参加抗日义勇军与中国兄弟并肩作战。艰苦的战斗中，也有人像廉硕晋一样丧失信心，投降日军，其中还包括“朝鲜革命军”的总司令金浩石。1940年，崔庸健、金日成等人率部随抗联第一路军退入苏联，标志着韩人武装抗日斗争的结束。

两位光复运动巨头的恩怨

2015年9月4日，前一天还在北京参加阅兵的韩国总统朴槿惠抵达上海，出席“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重新开放仪式”，并在致辞中感谢上海市政府为此做出的努力。对中国观众而言，“上海有个韩国临时政府”并不是新鲜事，十年前红遍中国的韩剧《浪漫满屋》开篇，被骗到上海旅游的女主角宋慧乔便专门参观了这里。

《暗杀》中，金元凤在杭州找到了临时政府和金九，并非导演搞错了地方。虹口公园事件后，临时政府为躲避日本人报复，先后在杭州、镇江和南京之间迁徙。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随中国国民政府迁往重庆。

金九和金元凤是韩人反日斗争的代表人物，两人相差22岁，却有颇为相似的早年经历。他们都出身农家，在青年时代就选择为祖国摆脱日本欺凌侵略而斗争，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暗杀的道路。

青年时代的金九并非影片中斯文温厚的老人。据他自述，早在1897年21岁时，他就为了报日本人杀害国王李熙的王妃闵妃之仇，截杀了日军中尉田土壤亮，后来又因参与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策划暗杀朝鲜总督寺内寿一等事多次坐牢，在1919年逃到了中国上海。同年，21岁的金元凤在中国吉林组织了以暗杀为手段的反日团体“朝鲜义烈团”，九年间实施了23次暗杀活动，但收效甚微。

1920年代后期，两人走上了不同的道路。金九所在的上海临时政府靠向各地韩人募捐、发行公债和征收“忠义金”、“爱国金”维持，经常陷入困境。连被选为临时政



↑ 2015年9月4日，韩国总统朴槿惠访问上海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出席旧址重新开放仪式。

府大总统的李承晚，也以前往美国华盛顿参加太平洋会议的名义一走了之。

金九原任临时政府警务局长，负责警务和锄奸任务，据他回忆，“当时对于犯罪者的处分，不是劝诫释放，就是死刑而已”。他的亲信警卫韩泰奎曾受日本人收买提供情报，之后杀死试图举报的情人逃回韩国，颇有几分影片中警卫队长廉硕晋的影子。

因为前辈的退缩和放弃，信念坚定的金九逐渐成为内务总长、国务领乃至政府主席。但没钱的时候，只能在上海租界担任

深感暗杀徒劳无功的金元凤停止了义烈团的活动，带领18名同志前往广州进入黄埔军校第4期，毕业后在国民革命军中担任军官。基于这一层关系，他在1930年代和黄埔系秘密组织“力行社”搭上关系。在滕杰、干国勋等力行社骨干的支持下，金元凤以军委会干部训练班的名义开办朝鲜革命干部学校，培养一百多名韩籍学生，并以此为基础成立了“朝鲜民族革命党”，成为韩人青

虹口公园事件后，金九投书上海各大报，悲壮宣称“余之武器为几杆手枪与几枚炸弹。余继续奋斗，并在余国未恢复前决不终止”。

公共电汽车查票员的韩人同胞家中轮换着吃饭，晚上睡在临时政府的办公室里，自诩为“乞丐中的高级乞丐”。直到虹口公园事件，临时政府才引起国民党方面的重视而得到了支持和资助。

金元凤和中国方面走得更近。1926年，

年中的一杆旗帜。

国民党中人评价，金元凤“坚忍沉毅、不怕挫折、不怕困难、埋头苦干精神为其他韩国革命者所望尘莫及”，但是“为人有大志而无远见，对人好施小惠以求取其政治目的……往往因弄小手段而忘却目的”。同一时期，金

元凤与中共也有接触，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熏陶，于1937年一度加入朝鲜共产党。

《暗杀》安排金九和金元凤在1933年共同谋划暗杀，实际上两人要到1939年才携手行动。这年5月，二人发表共同宣言，承认“我们二人一直在海外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着不间断的斗争”，但“未能做到团结统一”，“从目前中华民族为取得最后胜利而实现民族大团结的教训中，痛感我们过去所犯的种种过错”，宣布“为了完成神圣的朝鲜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今后我们要齐心协力”。

事违人愿，两人并未因为宣言而立即合作。金元凤的麾下，是黄埔系协助组建的“朝鲜义勇队”，在前线配合中国军队进行对敌宣传、情报收集和俘虏审讯。金九背后有国民党中央党部支持，组织了“韩国青年战地工作队”，却因军方阻碍而无法上前线。金九希望明确临时政府所属的韩国光复军，是与中国军队平等的同盟军。金元凤却率先表示，朝鲜义勇队是参加中国抗战的志愿军，使国民党有借口回绝金九的提案。

影片中，金元凤在日本投降后依然闷闷不乐，为的是祭奠死去的暗杀志士。历史上的他同样郁闷，原因却大不相同。1941年，金元凤下令将义勇队主力开赴华北，一是为了回避国民党关于义勇队与光复军合并的要求；二是试图发动华北韩人加入以壮大实力。谁料，北上的义勇队与中国共产党在华北组织的朝鲜青年抗日联合会融为一体，形成以八路军炮兵团长、韩人武亭为总司令的朝鲜义勇军。只剩下十几名队员和300多名家属的金元凤无力对抗金九，在国民党的强令下率部并入临时政府，担任光复军副总司令。

抗战胜利后，两人终于分道扬镳。金九回到汉城，因临时政府不被美方承认，选择以议会的方式继续从政。这位组织多次暗杀的老人陷入了命运的轮回，1949年6月24日，被一名反对他政治立场的陆军少尉暗杀。金元凤前往平壤加入了金日成政权，他的消失更具有时代色彩——1958年11月之后，政坛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他被清洗了。

□ 编辑 陈祥 □ 美编 黄静



龙图腾是怎样被“发明”的

清末民初，西方的图腾学说传入中国，诞生了一批图腾学者。图腾之说会盛行，是因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为了救亡目的，急于普及、论证中国的民族概念，而让民众能团结在民族独立的旗帜下。起初，在众多的图腾学说中，龙的地位并不突出。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所列的中国史前图腾有数十种，关于龙的内容仅有两句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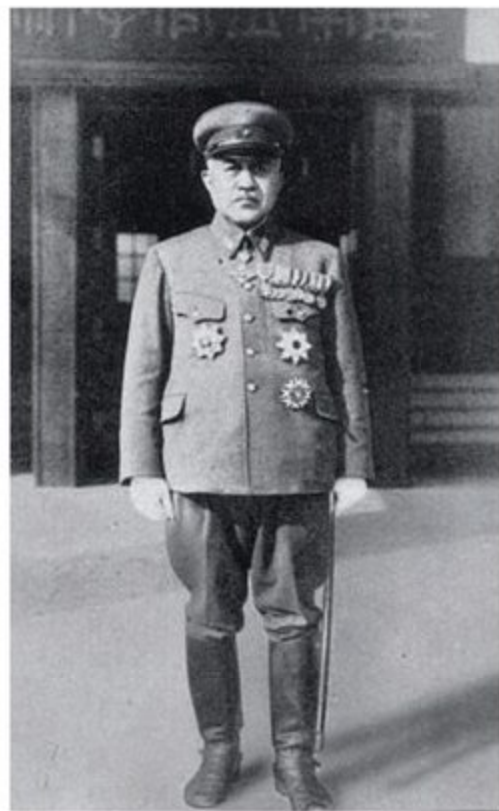
真正确立龙作为中国图腾地位的人，是闻一多。他在《伏羲考》一书中

建立了今天广为流传的说法，“所谓龙便是因原始的龙（一种蛇）图腾，兼并了许多旁的图腾，而形成的一种综合式的虚构的生物……”他的论证方式接近循环论证，使用材料也是任意拼接。所谓“化合式图腾”，并没有相应的人类学理论作为支撑。

事实上，中国很可能并不曾存在图腾社会，因为在图腾理论中规定的各种特点，譬如“图腾禁忌”、“外婚制”等，都不适用于史前的“中华民族”。

抗战爆发前，担任奉天特务机关长的土肥原贤二在华北竭力拉拢各界名流，甚至包括反日人士。他每日必读《大公报》，对其社论更是厚爱有加，常托人向张季鸾致意：“某日某论高明，土肥原亦五体投地。”张季鸾有一次过生日，土肥原专门从西安置办了陕西土产、秦腔唱片等礼品。寿礼的名刺上，土肥原竟屈尊以张季鸾的晚辈自居。

对于言情作家张恨水，土肥原也尽力讨好。他曾请人带着《金粉世家》、《春明外史》两本书找张恨水，希望能“赐予题签，借留纪念，以慰景仰大家之忱”。张恨水没有回绝，而是转赠其有抗日义勇军内容的《啼笑因缘续集》一书。土肥原所托之人见书大惊：“君何故欲触土肥原之怒？今日与此辈为敌，独不以妻儿为虑乎？”张恨水回答：“土肥原有来恳我题签之雅量，即有任我题何签，赠何书之雅量。否则，王莽谦恭下土之状未成，而反为天下读书人笑也。”土肥原拿到书后，果然没有追究张恨水，而且又请人代为转达，说《啼笑因缘续集》：“描写生动如画，真神笔也。”



土肥原贤二

邓世昌或为爱犬拖累而死

按广为流传的说法,“致远”舰在黄海海战中沉没后,邓世昌将试图救他的爱犬按入水下,一同殉国。如邓世昌的曾孙女邓立英说,当时“太阳犬”“见主人落水,冲破波涛游到他的身边,衔住他的手臂想搭救他,不让他下沉,被曾祖推开了。这条太阳犬仍不死心,又游了回来,衔紧他的头发,曾祖痛惜地看着爱犬,毅然使足力气把它按进水中,自己也随之消失在万顷波涛的大海。”

但“镇远”舰美籍帮办(副舰长)马吉芬事后回忆,“致远”舰“幸存者只有七名海军士兵……他们所说,各不相同,难以置信。但唯有一点说法一致,据说,邓舰长平时所饲养一头大狗,性极凶猛,常常不听主人之命。‘致远’舰沉没后,不会游泳的邓舰长抓住一块船桨木板,借以逃生。不幸狂犬游来,将其攀倒,手与桨脱离,惨遭溺

死。狂犬亦为主人而殉死。”

马吉芬本人对北洋舰队怀有很深的感情,不会刻意编造事实,而其记录的以上内容,又来自于“致远”舰7名幸存船员的口述,可信度相当之高。如果事实的确如此,那正如马吉芬评论的那样,“想来义犬救主之说,自古以来屡有所闻,但为犬舍命者,恐邓舰长首创先例,实乃不幸之人。”



甲午战争前北洋海军“致远”舰管带邓世昌、副管带黄乃谟与全体指挥官在舰艇上合影。

48瓶XO为古龙陪葬

在朋友的记忆中,酒鬼古龙“酒量好,但不懂分辨酒味,见酒樽好看就说好酒。他注重饮酒气氛。”林清玄回忆当编辑时,曾负责向古龙催稿。古龙常耍无赖,说:“你不跟我喝酒,我就不写给你。”于是两个人就开始喝,但是怎么喝也不醉。当时也不知道是他们谁想出的主意,把绍兴黄酒倒在盆里,一人一盆地“干盆”。

得肝病后,医生嘱咐古龙:“你最好不要吃酒了,实在熬不住一天最多只能吃一小杯。”古龙不听,依旧照饮不误,终于导致旧病复发。

古龙死于好酒,朋友们还是买了48瓶XO为古龙陪葬。当时每瓶XO要4000元台币,有人担心会被盗墓,所以建议把酒瓶的盖子打开,每瓶都喝上一半。倪匡伤痛欲绝,不仅自己当场就拿起酒来大喝,还对已死多日的老友说:“古龙,你也来喝一点。”说着就给古龙嘴里倒上了一点酒,谁知古龙嘴角竟流出了血。倪匡拿手帕擦干血迹,作为永久的珍藏。

英国为何没有占领拉美

殖民时代,英国在拉丁美洲不仅拥有银行、农场、牧场等众多产业,还修建铁路系统,沟通了拉美各地。这些产业都在伦敦金融家名下,不属于英国政府。时至1913年,这些产业带来的利润已经占英国海外收入的近1/4。

虽然有如此多的利益,英国并未出兵占领拉美。专注大英帝国历史研究的英国史学家约翰·达尔文在其《未终结的帝国》一书中解释,这是因为:首先,只要产业有利可图,那么没有必要非得完全占领;其次,占领花费巨大。如果当地人

1870年前后,西印度群岛亚麻市场上的英国贵妇。意大利画家阿戈斯蒂诺·布鲁尼亚斯的作品。



竞争对手在一旁虎视眈眈,那么要兼并领土就不得不进行昂贵的持久战。因此,一直到19世纪中期,只要情况允许,英国人更倾向于“通过条约兼并”——这是在热带非洲地区的常

用模式;第三,由于英国海军和陆军实力有限,想要征服拉丁美洲根本不可能。至少在伦敦金融界看来,这个想法是荒诞不经的。

“横死”徐树铮： 小聪明的人坏大事

文 /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

段祺瑞的圈子，人称“皖系”。皖系里的人，不见得净是皖人。真的皖人，哪怕是段祺瑞的亲戚，都不一定能在皖系被重用。段祺瑞的班底，大半都是外乡人，其手下最受信任的谋士徐树铮，就是江苏萧县人。

徐树铮在民国，人称“小徐”，以区别于徐世昌的“老徐”。小徐是个秀才，很早就跟上老段（段祺瑞，另外一个段芝贵被称为“小段”）做记室。那个时代，秀才属于文人，文人大抵耻于跟大兵为伍，不得已进了军营，也是为混口饭吃，怎么也得端着点，断不会跟大兵混在一起。但是，小徐却喜欢跟士兵一起出操，扛枪打靶。这让老段很是稀奇，找过来一谈，深得其心，遂成心腹。

老段做了统制，就想办法把小徐送到日本士官学校，忍了日本军曹的打骂，小徐毕业了。于是，文人小徐，摇身一变，成了徐将军。

聪明能干 堪比诸葛

从老照片上看，小徐一脸聪明相，只是有点滑头滑脑的。懂麻衣相法的人，也许会说，此人薄命，有横死相。但是，小徐的确是个聪明人，有才华。文章写得漂亮，经常跟林纾、柯劭忞等一帮文士往还，品位见识都不错，写的诗也很有气象。北洋系里另一个聪明人陈文运说，小徐是他仅见的可以五官并用之人，像《三国演义》里的凤雏庞统一般，可以一边批公文，一边跟他说话，还一边打发随从办事。北京城里的电话号码，他都背下来了，打谁的电话，根本不用查，一拨即是。

小徐不仅聪明，而且能干，肯干。段祺瑞长期主掌陆军部，小徐为次长，但部务基本上

是小徐在管，事无巨细，都是小徐说了算。老段经常不去办公室，门口的卫兵，都不认识他。大事小事，都是次长包了。老段的可爱之处，是肯担责任，不诿过于下属。就是小徐把事儿干砸了，老段也认账，一股脑儿把责任都揽下。

那个时代，自比诸葛亮的人很多，小徐也是一个，人称“小扇子”，自己也喜欢人家说他是“小扇子”。小徐爱用权谋，《三国演义》上的那点权谋机诈他都会。不过，他是老段的“诸葛亮”，只为老段效力。在忠诚方面，的确跟诸葛亮有得一比。袁世凯在世的时候，就死活看不上这个“小扇子”，甚至在公开场合都不掩饰自己的厌恶之情。但这一点都不损害老段对小徐的信任，老段对儿子都没像对小徐那样放心和关心。大事小事能告诉徐树铮，却未必告诉儿子段宏业。

小徐聪明，天分高，但问题是他从不知道掩饰，绝不肯藏拙。还动不动就恃才傲物，用自己的聪明，嘲笑他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

比较爱显摆自己那点能耐。扬才露己，是所有才子的痼疾，小徐也不能免俗。只是，小徐的才气过大，聪明过甚，显摆多了，未免让人受不了。在政坛上，即使面对大人物，他也照样语含讥讽，连嗤带打。弄得好些人不敢见他，见他就如芒刺在背，黎元洪就是一个。

在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和段祺瑞搭档，黎元洪做总统，段祺瑞做国务院总理。黎元洪对段祺瑞的要求就是，不能用徐树铮做国务院秘书长。这个人我不能见，见了就浑身难受。但是，段祺瑞却非用不可。每次小徐拿了公文到总统府盖章，黎元洪稍微问一句，小徐就不耐烦，一句话就给堵回去，把个大总统顶到墙上，一点好脸色都不肯给。“府院之争”如此快就陷入恶化，小徐要负很大的责任。

开罪盟友 挤兑同僚

小徐不仅令圈子以外的人难堪，对盟友也不客气。梁启超和他的研究系，一直都是段祺瑞的盟友，在讨伐张勋复辟之时，梁启超还帮了大忙，一支笔带动了整个舆论界，对复辟口诛笔伐。之后改组国会，也都是研究系在设计张罗，费了好多心血。但是到了真正选举的时候，徐树铮却策动各省督军，把研究系的人统统玩掉，哪怕硬性舞弊，把票箱里的票全部换掉，也要卡住研究系的人不让当选。结果呢，硬是把这些笔杆子都赶到了敌对势力一边。

五四运动，上街的学生，臭的就是当家的皖系。而五四运动恰是梁启超和林长民他们折腾出来的。在巴黎自费参会的梁启超，打听到和会拒绝中国的要求，因为国内



徐树铮 (1880-1925)

亲日派的缘故，把这个消息迅速传给了他的亲家林长民，林长民捅到报馆，于是，事儿就闹大了。经过五四运动，当家的皖系，就被臭成了媚日的“卖国贼”。

对自己一个圈子里的人，包括段系的骨干，小徐也不肯让着哪怕半分。当年公认的段系四大金刚——靳云鹏、徐树铮、曲同丰和傅良佐。曲和傅都是带兵之人，听喝的，进入不了决策层，真正影响老段的，只有靳云鹏和小徐有的一拼。靳云鹏是小站第一拨的士兵，虽说是段祺瑞的下属，但属于小站旧人，跟段祺瑞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按北洋的辈分，比小徐要高，他在清末已经做到第十九镇的总参议。在段祺瑞的圈子里，地位也一直是最高。

而且，靳云鹏的本事也不小，在段祺瑞放弃总理不做、退而身居边防军督办，而用

责，也很有起色。但是，徐树铮却不甘心放着这么大的事儿不管。可是，这事儿徐树铮一掺和，就开始变了。

徐树铮是喝过洋墨水的，对靳云鹏这种“土包子”，压根就没放在眼里。段祺瑞重视参战军的编练，让两员大将都负责此事，结果，徐树铮明里暗里挤对靳云鹏，连起码的尊重都没有。小站的现成经验被放弃，取而代之的，是全套的日式训练。所有的军官用的都是军校毕业生，高级军官还是士官生，有经验的老兵都被弃用了。

更要命的是，在徐树铮和靳云鹏之间，段祺瑞并不中立，越往后走，就越倾向于前者。毕竟，虽然靳云鹏跟他关系更早，但对于小徐的才华和能力以及对他的忠诚，老段更放心些。最后，编练参战军或者边防军，就变成了小徐一个人的事儿，靳云鹏被彻底排挤了。

在民国波谲云诡的风云中，其实谁也不比谁傻。为了显得自己高明，把那点权术权谋到处用，实际上，这样的做派是真正的愚蠢，弄得自己众叛亲离，也害得老段做恶人。老段的事儿，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败在了小徐的小聪明上。

靳云鹏做内阁总理的时候，他这个总理，居然有本事把山东督军张树元给撤了。这样的事儿，连袁世凯都办不到。虽说是玩了点阴谋，不仅把张树元上面的奥援离间了，而且策动了他下面的军人拆他的台，但毕竟做到了以中央政府的名义，撤换一省的督军。在段祺瑞编练参战军（后来改为边防军）的时候，经常拿靳云鹏的榜样来激励士兵，说是当年在小站的时候，靳云鹏就是他麾下的一个小兵，现在已经做到政府总理了。所以，跟着我干，好处大大的。

然而，这样一位能干的“自己人”，也要受徐树铮的挤对。编练参战军，是段祺瑞培植嫡系武力的关键一招。参战军全部用日本的武器装备武装，教练也来自日本，连拉炮车的战马都是从日本进口。靳云鹏是在小站时代就做过教官的人，所以，主持练兵很有一套。参战军最初的编练就是他来负

到直皖开战，边防军已经练成三个师四个旅。不仅武器装备优于各军，而且军官漂亮，士兵整齐。但是，小徐毕竟从士官学校毕业之后，就没有再下基层带过兵。编练军队，花架子比较多，实用性差。而且，为了追求整支部队的外观整齐，没有多少经过战阵的老兵。故而直皖开战，一上阵，就露怯了，根本不是经过扎实训练的吴佩孚部队的对手，败得稀里哗啦。而被排挤的靳云鹏，后来居然离开了皖系，投奔了皖系的对头。

得罪奉系 死于报复

除此而外，小徐还干了一件得罪奉系张作霖的事儿。原本张作霖被小徐用钱和进口的枪械收买了，变成了皖系的盟友。在对南方的作战中，奉系还出了兵，给小徐挂了一个奉军副总司令的头衔。但是，小徐居然用这个名义，不经过张作霖，擅自调遣奉

系进关的军队，这就犯了大忌。张作霖这个人，别的都好说，有两样东西——自己的老婆和兵——是别人绝对不能碰的。最终，把这个盟友也推到了直系一边。直皖交恶，奉系也在背后插了皖系一刀。

不仅如此，小徐在直皖关系越来越紧张之时，还干了一件让所有北洋人都皱眉头的事儿。段祺瑞有个老对头，是当年小站时期的同事陆建章，此人跟段祺瑞同为皖人，但却深恨段祺瑞。此人自从打陕西督军位置上下来，没有什么势力了，但却跟冯玉祥是至亲。利用这个关系，在段祺瑞武力统一的进程中，总是暗中捣乱。在战争的紧要关头，居然策动冯玉祥在武穴反对对南用兵，要和平。

小徐在挂名奉军副总司令的时候，设计将陆建章骗到了北京，背后一枪，结果了他的性命。然后宣布罪状，由政府公布。陆建章是北洋旧人，陆军上将，用代理总统冯国璋的话来说，就是有一万条罪状，也不能由一个北洋后辈，用这种方式枪毙。坏了规矩的小徐，由此引起了各方的强烈反感。

问题是，就是这样引发一系列反弹的行为，老段依然为他背书。这事儿，直接导致了皖系的不得人心，对后来的失败有间接影响。当然，也由此种下了导致徐树铮横死的种子。后来冯玉祥得势，控制了北京，侦知徐树铮前来北京与段祺瑞会面，半道就给截下，以陆建章儿子陆承武的名义，依样画葫芦，一枪干掉。时年徐树铮45岁。

当年的小徐，的确聪明过人，才华也过人。但是，这样的聪明，只是小聪明。在民国波谲云诡的风云中，其实谁也不比谁傻。老是显摆自己那点聪明，不能容人，处处挤对人，为了显得自己高明，那点权术权谋到处用。实际上，这样的做派，是真正的愚蠢。弄得自己众叛亲离，也害得老段做恶人。老段的事儿，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败在了小徐的小聪明上。

尽管如此，小徐的死，还是让老段如丧考妣，哭得稀里哗啦。就是儿子死了，老段都不会这样，老段，还真是一个多情种子。



2015年10月15日晚,乌镇戏剧节的四位发起人赖声川、孟京辉、黄磊、陈向宏与开幕大戏的两位导演共同鸣锣,宣布第三届戏剧节开幕。

摄影 晓波

乌镇戏剧节： 一场古镇的文艺复兴实验

记者 / 徐伟

金秋十月,北国已是层林尽染,江南的乌镇依旧绿意盎然,丝毫不见草木凋零的迹象。一江碧波如蜡染般油光锃亮,明清时期的房屋倒影在河面,又被摇晃而过的乌篷船藏进涟漪。

10月15日至24日,为期十天的第三届乌镇戏剧节,将这座千年古镇再次装扮成戏剧爱好者的天堂。来自五大洲的数百个戏剧团体进行了上千场表演,街道、巷陌、廊桥、游船、广场、戏院都成了表演者的舞台,可谓一步一景皆是戏,让人目不暇接。

这场古镇的文艺复兴实验,颇具野心和格局,将西方舶来的现代戏剧嫁接在千年的东方遗存里,两种文明并行不悖地交互融合,实现了一座古镇的涅槃重生。

乌镇熙熙,皆为戏来

拥有1300年历史的乌镇,是京杭运河嘉兴段的一座小镇,凭着便利的水路交通,这里曾是繁华的商贸枢纽,地处富饶的杭嘉湖文化圈,也是盛产文人名士之地。后因陆上交通兴起,乌镇逐渐衰落凋零,曾经的繁华不再,直到上世纪末,才重新得到重视,被保护开发。

2013年5月,筹备了四年的第一届乌镇戏剧节正式开启,由台湾话剧导演赖声川、大陆导演孟京辉、大陆演员黄磊与乌镇旅游公司老板陈向宏共同发起。在四位发起人的操盘下,乌镇戏剧节从无到有,成长为中国戏剧界的一大盛事。

小镇举办戏剧节,进而形成世界性的影响力,在国际上已有不少成功案例。如法国的阿维尼翁、英国的爱丁堡、日本的利贺,这些小镇皆因戏剧而闻名天下,成为戏剧爱好者心中的圣地。

中国大陆的现代戏剧发育较晚,观众基础薄弱,属于相对小众的艺术门类。即便在北京和上海,戏剧也不具备广阔的市场,要举办戏剧节往往面临人才、资金、票房、剧作等方面的难题,而在小镇操办如此规模的戏剧节,更是难上加难。

因此,当首届乌镇戏剧节一炮打响并形成良好的口碑后,几乎所有人都感慨,乌镇实现了中国戏剧人的一个梦,也激发了许多年轻人的戏剧梦。在本届戏剧节开幕式上,担任

艺术总监的孟京辉也用“如梦、如幻、如痴、如醉”八个字来形容乌镇戏剧节。

办到第三届，戏剧节逐步走向成熟，无论从硬件配备、秩序管理还是从国际知名度、号召力而言，都有了较大提升。担任前两届戏剧节艺术总监的赖声川告诉《凤凰周刊》：“最难的是第一届，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是乌镇，要邀请世界知名剧团来演出，需要跟他们解释，现在难度大大降低了。”

赖声川的夫人、同时担任戏剧节总策划的丁乃竺也向本刊表示，“从第一届开始，我们的定位就很高。中国要面向世界，也要让世界看到我们，所以做了很多决定，比如中文的戏都要翻译成英文，国外的戏都要翻译成中、英文。此外，还请来欧洲、美国的记者做报道，请世界知名剧评人来考察评论。”

乌镇戏剧节采取艺术总监负责制，由艺术总监在全世界范围内遴选作品、邀请剧组，因此，艺术总监的个人品味会强烈影响戏剧节的风格。在赖声川打响头炮后，第三、四届艺术总监由先锋实验导演孟京辉担任，所选剧目中，先锋实验作品明显增多。

整个戏剧节的内容，分为“特邀剧目”“青年竞演”“小镇对话”“古镇嘉年华”和“戏剧小课堂”五个单元，20部“特邀剧目”是戏剧节的重头戏，“青年竞演”是为了挖掘和培养青年戏剧人才而设，“小镇对话”则是戏剧导演、演员和学者的论坛，而“戏剧小课堂”则是国内外的戏剧大师们给戏剧学员开设的课堂。

本届戏剧节邀请了法国北方剧院、瑞士苏黎世国家剧院、德国塔利亚剧院、俄罗斯塔甘卡剧院、波兰羊之歌剧团、意大利都灵国家剧院、立陶宛国家剧院以及中国国家话剧院八大国家级剧院团队，许多剧组是首次访华。

所邀剧目的主题与形式跨度极大，从遥远的古希腊神话《奥德赛》，到中国元代杂剧《孤儿》；从莎士比亚的《马克白》，到莫里哀的《吝嗇鬼》；从北欧神话由来的《尼伯龙根的指环》，到契科夫的《櫻

桃园》；从迪伦马特的《物理学家》，到彼得·布鲁克的《惊奇山谷》……一部部经典剧作跨越时空，在乌镇的大小戏院隆重上演。此外，还有大量视觉戏剧、环境戏剧、肢体剧等先锋实验作品。

即便不是戏剧爱好者，不进剧场看戏，也会被这里的节日气氛感染。十天时间里，一千多场“嘉年华”表演散布在乌镇的桥头巷落，与游客形成良好互动，有现代行为艺术、音乐汇演、曲艺杂耍，让观众与艺术零距离接触。漫步在青石板的老街上，不经意间就会“入戏”，成为一场表演的围观者或参与者。

看不懂戏，错在哪方？

这是一场戏剧的狂欢盛宴，在沿河的主干道上，挂满了古今中外一百位戏剧大师的肖像画。走在街道上，大师们向你迎面而来，让人顿生穿越时空之感。

不过，在本届戏剧节上，也出现了不少“杂音”，观众对戏剧的评价褒贬不一。一些过于先锋的实验剧，观众并不买账。

譬如，深陷争议漩涡的俄罗斯戏剧《我们存在》，出现了“观众睡倒一大片”的场面；大陆导演李建军的《飞向天空的人》，由于过于特异、沉闷，演出自始至终观众退场不断；而丰江舟、张琳导演的环境剧《热醒》，“没有剧本，没有故事情节”，遭遇观

众公开的批评，并被要求退票。

类似“看不懂”“太无聊”“戏太烂”的评价，也出现在其他一些剧里。在剧评人奚牧凉看来，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则是国内观众缺少戏剧训练，对实验戏剧的接受能力有限，而此次选剧实验作品占比过多；另则，许多作品的确差强人意，个别作品甚至缺少创作诚意，或者沉浸在创作者个人的世界里，无视观众的感受。

观众的这些不满甚至被搬上了台面。10月18日，在编剧史航与三位受邀导演李建军、邵泽辉、丰江舟的“小镇对话”现场，原定主题为“中国新戏剧的探索”，被现场观众的提问打乱。许多观众提出完全看不懂某些戏的主旨，一些环境剧缺乏故事情节，成了纯粹的行为艺术，不能称之为戏剧。导演遇到这样的质疑，也面露尴尬。

在采访导演赖声川时，记者也将此问题抛向了他。赖声川坦承，此次的确存在一些过于先锋的作品，超越了一般观众的接受能力。观众中游客较多，许多人缺乏对戏剧的了解，也没有专业准备，他会建议在此后的戏剧节将戏剧分级，比如专业级、大众级，让观众有心理准备和预期，这样即便遇到“看不懂”的实验剧，也不至于有太大心理落差。

在赖声川看来，可能在选戏的时候更多地考虑了戏本身的艺术成就，而忽略了观众的接受程度。“一些比较难的戏，我们要提前认出观众理解可能会有困难，但是我们认可它的艺术成就，所以一定要邀请，同时我们需要给观众更多的关注，提前做更多的文字说明，让观众了解这个戏的风格。”

戏剧节终究是要“以戏为本”，戏的好坏决定了戏剧节的品质和生命力，进而影响到其经济收益。到底是观众的水平不够，还是导演的作品太次，有时很难给出确定的答案。曾创作过《等待戈多》等经典作品的荒诞戏剧大师塞缪尔·贝克特，也曾被人质疑作品看不懂，他的回答颇有个性，“你不要问我是什么意思，我做出来已经累得半死。”

受制于财力、剧组档期、题材敏感度、国际号召力以及人脉广度等因素的影响，



戏剧节期间，乌镇的街道挂满了中外戏剧家的肖像画，充满了节日气氛。

要想力求每部受邀作品都绝对优秀,甚至能代表世界戏剧界的顶级水平是很难的。但从三届受邀作品的整体质量来看,乌镇戏剧节的国际影响力和号召力在逐步提升,未来的邀约会越来越容易。

戏剧小镇,何去何从?

在古镇开发越来越商业化、世俗化的当下,乌镇为何反其道而行之,走“文艺复兴”的路线,打出戏剧节的牌?这不得不说到戏剧节的发起人之一、乌镇后台老板陈向宏。

此人颇有几分神秘,从桐乡市市长秘书任上调至乌镇管委会主任,后一直掌管乌镇的镇保护开发,乌镇实现市场化经营后,又担任乌镇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十余年里,乌镇的开发由其一手操盘。他也因对乌镇的镇保护获得“中国旅游界十大风云人物”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亚太地区遗产保护杰出成就奖”。

处事低调的陈向宏很少抛头露面,作为挂名的戏剧节主席,在开幕式上,甚至没有安排他的讲话。他更愿意把舞台让给艺术家,专做幕后运筹帷幄的调度员。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陈向宏详谈了对戏剧节的构想。戏剧节是作为乌镇打造“文化小镇”的重要一步,虽然在经济利益上办戏剧节不见得能盈利,但戏剧节为乌镇赢得了广



“售票收入只够买剧本成本的三分之一”。

但为了保证戏剧节的品质不受干扰,乌镇并没有接受外来赞助,尽管许多企业找上门来愿意投资。陈向宏告诉记者,之所以决定要办戏剧节,一方面是为了与其他古镇形成差异化竞争,避免同质化;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走出“文化小镇”的道路,提升乌镇的文化品位。“古镇就是一个博物馆,你放进去什么,拿出什么,都得小心翼翼,但是思维不能有局限。”

过去十几年的发展,乌镇已经完成了从观光小镇到度假小镇的过渡,乌镇的全年

剧节以外,为了纪念本土画家木心而建的美术馆也于11月15日正式开馆,从明年起,还会举办“艺术双年展”,这些艺术实践,在不断提升乌镇的文化格调,也让它逐渐被文艺界认可,而文艺的附加值是难以用短期的经济收益衡量的。

戏剧节为乌镇赚来了名声和影响力,但与国外成熟的戏剧节相比,乌镇戏剧节仍有很远的路要走。如果乌镇真正致力于打造中国戏剧的摇篮,它面临的挑战是提高乌镇本土的戏剧孵化能力,它需要吸收一批戏剧精英人才长期驻扎,打造自己的戏剧团队和经典剧目,挖掘和扶持本土的传统戏剧,如此方能形成长久的戏剧生态圈。

客观而言,每年办一场十来天的活动并非难事,难就难在建立一个能自我循环的生态圈。这取决于乌镇掌门人的决心,是要建一个戏剧爱好者候鸟般栖息的孤岛,还是一片能自我循环的雨林。

许多人是先知道戛纳电影节,才知道法国小镇戛纳;先知道阿维尼翁戏剧节,才知道戏剧天堂阿维尼翁。如果乌镇的戏剧摇篮梦想真正能实现的话,或许有一天,也会先知乌镇戏剧节,后知水乡乌镇,这是品牌效应的微妙变化。

如果乌镇真正致力于打造中国戏剧的摇篮,它面临的挑战是提高本土的戏剧孵化能力,它需要吸收一批戏剧精英人才长期驻扎,打造自己的戏剧团队和经典剧目。

泛的口碑,打响了知名度。

乌镇旅游公司的副总裁陈瑜也向《凤凰周刊》透露,可能在未来几年内,戏剧节都无法实现盈利,因为投入的成本太高。除了前期建剧院的固定资产投入,每年买戏的钱、舞台的搭建以及各方面的接待费用和运行成本,靠门票收入是无法覆盖的,

游客量在全国古镇中名列第一。“我们不能再靠人流量来扩展,虽然乌镇还有很多未开发的空,但如果继续‘摊大饼’,只是量的增长,并没有质的提升,我们要考虑游客除了看小桥流水之外,还能看别的什么。”

“文化小镇”的构想便顺理成章地被提了出来,并正在一步步实践。除了乌镇戏

专访《哈佛商业评论》前主编尼古拉斯·卡尔 人类如何避免被科技奴役？

记者 / 王衍

当某种社会潮流,理所应当又义无反顾地迅猛向前时,知识分子往往是那个在角落里焦急地呐喊着“喂,等一等”的人。在互联网和移动科技已经成功俘获大多数人日常生活的今天,美国知名作家、《哈佛商业评论》前主编尼古拉斯·卡尔站了出来,向在低头看手机和煲电脑粥的你,说,“喂,停一下,先想一想”。

他冒险地站在这波时代大浪还未淹没到的最前沿,试图苦心费力而“冒昧”打扰忙碌的你,他想告诉你的,其实也不是什么深不可测的玄机,而是作为一位已经跳出了信息牢笼的思考者,用冷静而发人深省的批判精神,对这个信息过剩时代提出的一些警醒。

卡尔认为,在已经无所不在的科技产品面前,人类应该保持一种超脱的自持,而不是被提供生活便利的工具毫无节制地占有。而这样的呼唤也并非横空出世,他承认自己的生活也曾经被无数社交软件和互联网包裹得看起来充实新鲜,实则支离破碎。这样的亲身经历,促使他相信,从不同侧面去探讨人类与科技的关系,启发那些一直在被动接受新鲜事物而匆匆

赶路的人们,停一停,想一想。

继在中国出版《IT不再重要》《浅薄》而名声大噪后,他又携新书《玻璃笼子——自动化时代和我们的未来》专程到访北京。在他短短几天的访问中,他发现中国的互联网公司 and 美国的非常相似——年轻人

居多、洋溢着理想和热情;同时他还发现,全球最多互联网使用者聚集在此,也许他们更需要在享受网络科技带来的便利的同时,接受理性的批判和考问。

通往被科技奴役之路

记者:为什么新书取名叫《玻璃笼子》?

卡尔:这本书是在讨论,在电脑和互联网等智能技术面前,我们人类有多依赖。现实是,当我们环顾四周却发现,我们时刻在找手机、看电脑,这些高科技就像是一个透明的笼子,把人们都罩住了,人类的一些才能在其中退化。所以我认为,一方面人类受益于科技,另一方面又被这个看不见的玻璃笼子困住。

记者:对“科技对人类的利弊”的话题,一两百年前哲学家们就在思考了。比如你的书中提到的数学家兼哲学家伯特兰·罗素,他在1924年的随笔中明确写道:“我们崇拜机器,认为机器美丽而有价值,因为它们是力量的象征;我们憎恨机器,因为它们可怕,我们厌恶机器,因为它们奴役我们。”你的观点和他们的有何不同?

卡尔:人类使用科技发



明创造的机械已经很长时间了,我想,现在与以前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的科技环境不同了。过去人们只是在从事某项工作时使用到机器,而如今互联网、智能手机这些科技让人们时刻在与机器打交道。回首过去十年,因为这些机器,人类的交流、沟通和行为方式都在发生变化。

我试着在书中以科技和哲学的视角去呈现,这些科技如何改变我们人类,其中哪些对我们有益,哪些对我们不利。因为现代科技更新得太快了,人们总是急于接受下一个新鲜的玩意儿,但是在接受之前,却不曾有一秒钟想一想,这是我要接受的吗?这个东西会让我的生活更好吗?会让我更有才能吗?

记者:你认为,大部分人已经被电脑和智能手机这样的科技产品所奴役了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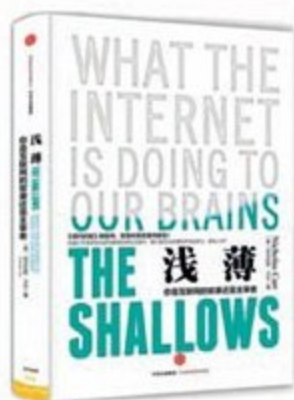
卡尔:当很多人使用这些产品,他们的行为在被动地或者无意识地被改变。相比以前,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会有意识地产生疑问,并在手机APP、社交媒体和微信上开始筛选,哪些对自己重要,哪些不重要,我认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变得越来越有选择的能力。

记者:在你的生活中,使用得最多的科技产品是什么?是智能手机吗?

卡尔:不。我想应该是电脑,(相比手机)我更愿意使用电脑,因为我打开电脑,就可以一次性地处理电子邮件、浏览网页、写作等很多事务,所以我可以控制对它的使用。

手机会不断地“打扰”我,让我的注意力不集中,有时回到家里,我会关掉手机。统计数据显示,只要人们清醒的时候,每6分钟就会看一次手机。这样是危险的,并不是说互联网不好,而是说它会切断人们之间的互动,同时我们在技术领域上的自我控制或者技术使用上的规范不够严格的话,它会不断打扰我们正在从事的作业,让人们难以进行稳定的和深度的思考。

记者:相信很多人有过和你一样的行为或者尝试去做同样的事,但是也许有些人失败了,因为当他们关闭手机或者一些社交软件时,他们发现这个行为的代价是会失去以



往的社交圈子,因为其他人都在用,而你不用,那你就“出局”了。

卡尔:是的,当你选择一样东西时,你就得为这个选择有所牺牲。的确,科技产品已经在塑造我们的交流和行为方式,即使人们远离社交软件很短的时间,也会发现他们就跟不上整个网络社交了,不得不承认,改变这种已有的行为方式并不容易。

但是我确实认为,我们应该先有意识地去思考一下,再去选择要不要做这样的牺牲。

人类因科技而变傻?

记者:你提到过一个科技使用与人类行为的悖论,说信息在不断增加的刺激阶段,会不断满足人类的兴趣和好奇,提升他们的表现;但在信息过剩的时候,人类的行为会因为强大的焦虑而减退。如何解释这个悖论?

卡尔:在100年前的巴黎,1914年6月18日,美国飞行员劳伦斯·斯佩里驾驶着寇蒂斯C-2双翼飞机,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自动驾驶。围观的评委和观众都被这场惊人的表演惊呆了,斯佩里获得了特等奖——5万法郎;第二天,他登上了欧洲

所有报纸的头版,从此飞机的自动驾驶技术被更多人熟知,并进一步研究和完善。但是,当越来越多的飞机都实现无人驾驶的时候,100年后的2013年初,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发布了一则仅有一页纸的通告。该通告没有标题,只是被归为“致驾驶员的安全警告”(SAFO),通告简明扼要但寓意深远,指出“此安全警告鼓励驾驶员在适当的时候多采用手控飞行操作”。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从失事飞机事故调查、意外事故报告及驾驶舱研究中搜集了一些证据,表明驾驶员曾过度依赖自动飞行系统以及其他计算机系统。过度依赖自动化飞行,会将飞机及机上乘客置于危险之中。最后,这份安全警告建议航空公司制定操作政策,要求飞行员减少自动化飞行的时间,更多地采用手控飞行。

对于飞行员来说,他们在这种机械自动化所带来便利的玻璃笼子里,其应有的知觉和敏锐的反馈都被切断了,这种危险存在于我们的生活里,会切断人和人之间的互动和世界之间的互动,它会使我们的感知、思考和思想受到严重的封锁。所以,我们需要对提供给我们方便的科技异常小心。

记者:科技过度便利,给人类带来的负面影响会是什么?

卡尔:人们也许觉得,生活越方便越开心,但已经有一些社会科学的研究表明,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了,科技的过度便利让人们的思维钝化。

2004年,荷兰乌得勒支大学认知心理学家克里斯托夫·范·宁韦根进行了一系列简单的原创性实验,主要研究软件对记忆生成以及专业技能的影响。他招募了两组实验对象,让他们玩同一个电脑游戏,这个游戏是根据经典的逻辑难题“野人与传教士”改编的。要解开这个谜题,玩家必须用一条小船将5名传教士和5名野人送到河的另一岸,这条河是假想的(在范·宁韦根的版本里,传教士和野人变成了5个黄球和5个蓝球),每次最多载3名乘客。谜题的难点就在于,每次运送时,不管是在船上还是岸

上,野人的数量均不能超过传教士的数量。如果超过了,传教士就会被野人吃掉。参与者需要进行精确的分析和仔细的规划,才能按照任务的要求计算出如何才能成功。

范·宁韦根安排一组实验对象使用软件来解决这个难题,软件提供一步步的指导,例如,在屏幕上显示提示信息,将可行和不可行的移动用高亮标示出来。另一队使用一种初级程序,不提供任何帮助。正如你能想到的,使用帮助性较大的软件的实验对象,在游戏之初取得了很大进展。根据提示操作,这组实验对象不需要每走一步就停下来回想游戏规则,也不需要计算如何应对新形势。但是,随着游戏的发展,使用初级程序的游戏者开始显露出优势。最终,同另一队相比,他们解开谜题的速度更快,并且错误步骤较少。在这项实验的报告里,范·宁韦根总结道,使用初级程序的实验对象对任务概念有更清晰的认识,他们能更好地思考并制定成功的策略。相较之下,那些依靠软件指导的人经常会感到困惑,只是“毫无目的地到处乱点”。

记者:在现实生活中,是否有具体案例?

卡尔:在2013年的报告中,计算机科学家戈登·巴克斯特和约翰·卡特利奇警告称,人们对自动化的过度依赖正在侵蚀金融业人士的技能和知识,而计算机交易系统使得金融市场更具风险。

在机械自动化所带来便利的玻璃笼子里,其应有的知觉和敏锐的反馈都被切断了,这种危险存在于我们的生活里,会切断人和人之间的互动和世界之间的互动,它会使我们的感知、思考和思想受到严重的封锁。

软件程序员的工作是为了减轻思想的负担,但他们担心,这会反过来给自己的技能带来负面影响。程序员现在经常使用集成开发环境(IDEs)应用,这个应用可以帮助程序员编写代码。它将许多复杂、费时、琐碎的工作自动化,一般包括自动完成、自动

纠错、自动调试例行程序等,而更复杂的应用会进行重构,评估并修正程序的结构。但是应用接管了代码编写任务以后,程序员就丧失了锻炼并提高手动编码技能的机会。维·韦克·哈尔达供职于谷歌公司,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软件开发员,他曾写道:“现代的IDEs足够用了,有些时候,我觉得我是个IDE操作员,而不是一名程序员。”“这些工具不是鼓励人们‘对代码深入思考并仔细编写’,而仅仅是‘草拟一份蹩脚的代码,然后这些工具会告诉你哪里出错了,并且如何改正并完善你的代码’。”他将此种现象总结为“聪明的工具,迟钝的大脑”。

我想,我们今天的人类面临这样一个重要的抉择,就是在计算机或者自动化越来越普及、越来越被大力推进的时刻,在人和机器之间,到底谁控制谁呢?我的观点是要让技术为人类服务。

智慧地与科技共处

记者:关于机器会不会取代人类、甚至反控制人类的讨论,已经进行了半个世纪,你认为像智能机器人这样的高科技会取代人类么?

卡尔:短时间之内,我认为不会。一方面,机械总需要人类触摸才能开启,它不会自己产生意识;另一方面人脑是非常复杂的,尽管计算机可以取代人们做一些繁琐

的计算,但是不可能完全拷贝人脑。

人类诸多的能力是来自意识和潜意识,人类产生的意识和潜意识都难以言传得很清楚,机器怎么可能做得到?人工智能未来的发展,不光需要计算机的硬件来发挥作用,也需要很多软件不断深入来把这

种能力得以实现。而软件的发展也是循序渐进的,到某一个阶段发展可能停滞一段时间,然后有人去产生了新的洞察力,又发现新的软件,再一次提升人工智能这样的能力。所以,我不认为机器或者人工智能有能力完全替代人类,因为人的意识和潜意识是很难被完全捕捉的,至少在未来30年内看不到有这样的可能。

记者:过去一两百年来,机械操作已经取代了越来越多的蓝领工作,而如今它也在挑战白领工作,比如有消息说,机器人会取代新闻工作者写稿。你认为在未来,各种科技会对人类劳动力挑战到什么地步?

卡尔:的确,过去的很多工作和工种已经被机器人或各种机械取代。有种说法是,未来人类80%的劳动都会被机械取代,我不清楚是不是真的会发生,但是以过去的经验,当机械取代一种人类劳动力时,人类会找另一种工作去使用人类劳动力,也许未来需要我们去开发更多人类劳动力工作。

记者:你认为科技所发明的机械和人类的理想是什么关系?

卡尔:人们应该找出智慧地使用机械的方法,在有效而便利的使用和不放弃人类的自主性中找到平衡。

我说这些并不意味着说所有的自动化、计算机或者软件都是不好的,我想强调说这些工具都可以被人类所应用,只是怎么样应用它们能够推动人类所要实现的最终目标,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的挑战。而我们所面临的最重要挑战,就是要回答在不断研发这些科技产品的时候,设计这些科技能力背后的基本哲学是什么。

有人强调是以技术为中心的一种自动化发展哲学,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是以计算机的能力发展为主,剩下其他的一些边缘能力就让人类来把控。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应以人类发展为中心,去发现人类最擅长的领域是什么,把人类最关键的能力发挥出来,再让所有的人工智能、计算机成为人类发展自身能力的辅助工具。🌀

仰光：民主剧变前夜的光

9年前，因政局变化，缅甸迁都至内比都，而在缅甸人心中，仰光仍是当之无愧的首都。今日，它更位于一场蓄势待发的民主风暴的暴风眼中。

记者 / 刘荣

通往仰光的路道阻且长。北半球的秋天，旅游旺季，缅甸国内的消费价位已飙升到像在抢钱，茵莱湖最便宜的住宿300美元一晚，一张电话卡200美元。

首次过境失败，是在泰国北部的美赛口岸，因随身现金不足一千泰铢。其次，每一张要换成缅币的美元，都被挑剔的手指翻来翻去，不能有一丝破损。当然，比起此前在金三角地区看到的持枪警察，这里的边境显得十分安静。

那一晚，我被迫返回清孔，和两个白种男女合住一屋。我们手持中文、英文和西班牙文的《孤独星球》，友好地沉默着，书上另有一个沉默的名字叫“仰光”——我们共同的目的地。它位于缅甸南部富饶的伊洛瓦底江三角洲，东南亚最大港口城之一，与中国时差为一个半小时。从美赛口岸进入缅甸后，可以直接飞抵这座城市。

11世纪，仰光只是印度洋海滨一个叫“大光”的小渔村，1755年，在统治腐败与国内战乱的背景下，阿瑙帕维王统一了全缅甸，这个渔村更名为“仰光”，缅语意为“战争止息”。



在美赛口岸，一个高大的美国人问我“why there?”我说，想去一个女人的府邸外献一束花。这个女人是昂山素季，在长达21年的政治软禁解除后，2013年6月，她正式宣布竞选缅甸总统，虽然缅甸宪法中明文禁止配偶及子女为外籍人士者出任总统，但她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赢得选举被普遍看好。近70年的内战很可能因她而走向终结。

愿你的道路洁白

因政局变化，9年前，缅甸迁都至仰光以北390公里的内比都。而在大多数旅行手册上，以及缅甸人心中，占地312万平方公里、人口400多万、长满热带雨林乔木的仰光是当之无愧的首都。今日，它更位于一场蓄势待发的民主风暴的暴风眼中。

从一张用15000缅元买来的地图上，能直接看清仰光的地缘意义。北面是仰光山，东、南、西面是平原。伊洛瓦底江三角洲上蜿蜒着两条大河——勃固河、仰光河，它们牵着仰光走向印度洋，兵家必争的宿命也因此被注定。1855年，缅甸成为英属殖民地，从中南半岛上的国族更替史，卷入了世界近代殖民史。仰光变成出口柚木、宝石和稻米的重要外港，现在仰光拥有东南亚最多的前殖民地建筑，仰光市政厅、国立医院，都是那一时期的历史见证。

不过，今日更吸引我们这些外来游客的，却是两个大湖——甘多吉湖和茵雅湖，它们和一对传奇的父女相关，也像仰光的一双眼睛，将亲睹缅甸百年的民主之花，如何长成可能的民主之春。在缅甸民众心中，



前者非常神圣，这里又被称为“皇家湖”，昂山素季的父亲——缅甸国父昂山将军的塑像就坐落于此。1947年，在缅甸独立的前夜，昂山将军死于政治暗杀。

1988年，昂山素季担任缅甸全国民主联盟总书记，接手了缅甸联邦的“非暴力民主

傍晚，仰光的mahabandoola路华灯初上，路的尽头是闻名世界的大金塔，它是缅甸国家的象征，与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浮屠塔和柬埔寨的吴哥窟同被视为东南亚佛教艺术的瑰宝。



化”运动，并于两年后取得民选胜利，为军政府所恐惧，她被软禁在茵雅湖畔的私人府邸里。几乎全世界都记住了一张照片，她面对着军政府的枪口，安静得像一朵花。

茵雅湖有着不大不小的面积，绿得仿佛没有人工痕迹，周围却散落着仰光大学、

缅甸国宾馆、帆船俱乐部。相比甘多吉湖，这里有更多与“现代”、“未来”相关的意味。以“真理和忠诚”为校训的仰光大学，是禁止外国人进入的，在昂山素季被软禁的21年内，这里的学生经常会在重要纪念日子里，去她的府邸外献上洁白的栀子花。

“昂山素季的家在哪里？”在校门外碰了软钉子的我，悻悻地问一个年轻的女学生。就在三年前的军政府威权下，这个名字还是不便被提起的，缅甸人用“夫人”代称她。如今，所有被问到的缅甸人，都会因为这个名字而给你一个热情的笑容。



近年来，缅甸沿着“民主路线图”一步步推进改革，逐步放开多党选举和新闻自由，获得了国际社会肯定。图为仰光街景。

我被领到了公交站边，搭乘公车或者东南亚特色的双条车可以直接抵达她的住所。不过我还是选择了步行，途经美国大使馆时有点诧异，没想到，在与外界和家人隔绝的岁月里，她离美国使馆这么近。

欧式造型、通体洁白的昂山府邸，坐落在茵雅路一片高级住宅区中，2011年底，《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杨潇曾来到她的府邸采访她，称她是亚洲最美丽的女人。过去，这里是不可接近的，游客只能到湖边的纪念品摊铺上，偷偷买两件印有她头像的文化衫。

现在，为了囚禁她而修建起的围墙还留在这里，此处却不再是禁地，间丘露薇笔下“每隔两三尺就设立一个的持枪卫士”已经不见了，不仅拍照是被允许的，连府邸都被允许参观了。只是这还要看运气，她基本不在家，不是在接受国事访问，就是在进行国事访问。

一年多前，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吴登

盛访问美国，几乎前后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缅甸。不久后，身为“异见者”领袖，昂山素季宣布代表本党竞选缅甸总统。缅甸的政治态势从过去的亲近东方，明显转向了西方。而这个瘦弱的女人将带领国家去往何处，不得而知。只有圣经上的一句话可以形容眼前的一切：“愿你的道路洁白。”

经济用脚投票

作为一个游客，行走在仰光，即使不读书报不上网，也能隐隐从市井中嗅到风雨欲来的味道。

前殖民地仰光的民居，多为五颜六色的欧式小楼，或是南洋风格的骑楼。穿行在街巷间的日本二手小车（多为二战的战后赔偿）以及英国设计、印度生产的老式小公共汽车依然看得到。过去由于西方封锁，缅甸的交通工具之烂，广为人诟病。2011年大选后，交通工具伴随着民主转型一起发生了变化——政府大量从外国引进新车或二手

车，其中甚至有不少中国制造的奇瑞QQ。两年时间，仰光新增出租车一万多辆，还在持续增加中。突然大量涌入从外国游客，带来交通业的飙升，也给城市带来了川流不息的气象，拥堵问题随之出现。

在市中心的昂山市场，我加深了这一体会。这个市场修建于英国殖民晚期的1926年。最初为了纪念一位将足球引入缅甸的英国人。而1948年独立后，缅甸人就用昂山将军的名字命名这里。殖民时代的建筑结构和鹅卵石步行道，据说已申请本国文化遗产。这里大得超乎人想象，家中有一个做缅甸玉石加工生意的远亲弟弟，多次向我形容过这个市场“有一万多个摊子”。

我是个购买欲淡薄的人，不管是对古董店中军政府时代的奖章和废旧匕首，还是对著名的缅甸翡翠和红宝石。唯一让我瞠目结舌的是乌泱乌泱的外国游客。缅甸《新光报》做过统计，仿佛一夜之间，缅甸就突然从东南亚旅游盲区变成了“2013年世界十

大旅游目的地”。缅甸对26个国家开放了免签政策。2012年，缅甸的外国游客总数已超过100万，相比2011年度，同比增长率达到了37.5%。

在弥漫虾酱香味的小吃摊边上遇到一法国人，他用不流利的英语告诉我，在老一辈法国人心中，印度支那（大概指今日中南半岛五国）是一个情结。很难用道德来评判这种前殖民地情结，但显然，他们对这个刚解禁的国家兴趣大得惊人。

敏锐的英国观察者发现，就在2013年，缅甸的黄金地段写字楼租金超过了新加坡，他们在《金融时报》上细细罗列了数据，仰光少数专用写字楼的月租金每平方米95美元，超过了新加坡的每平方米74美元，相当于泰国首都曼谷的3倍。而海外投资客的涌入，正是致使缅甸地产租金价格不断上涨的原因之一。

尽管我住的酒店地板已残旧，偶尔还会断电，但这阻挡不了游客们蜂拥而入的热情。据缅甸饭店与旅游部公布的数据，当时仰光共有五星级酒店5个、四星级酒店6个、三星级酒店13个、二星级酒店21个和一星级酒店28个。为了迎合增长的需求，一切

还将扩建。

用脚投票的经济效益显而易见。英语与苹果手机的流行似乎都在同一时期。是年，总统吴登盛的访美带来了一个结果——《贸易与投资框架协议》的签订。而与欧盟的经贸往来也同时展开，基于互惠的合作，将把众多免税产品带入欧美。

在著名的么明基路，巨大的国际一线品牌广告牌矗立在高处，与脚下依然破败的街道形成了新旧对比。扫街的纱笼店和小吃铺子，旅行社和电子设备售卖点，新的商机公平地铺开在每一处，ATM也出现了。缅甸军政府掌政40年来，缅甸常年名列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如今，一切都将改变。

世俗之光与宗教生活

不过，商标和“现代化”并不能为仰光人的日常生活估价。从清晨醒来满城弥漫的第一声佛号开始，缅甸人习以为常的纱笼、拖鞋、槟榔，乃至敷面防晒的特纳卡，还是一如往日时光。它们和上部佛教构成仰光的内核。在缅甸，小乘佛教渗透在世俗生活中，男子一生中必须要出家一次，5到15岁不等，出家时间7天到一辈子不等。还俗之后，

礼佛参塔也是毕生的功课。

仰光人心中，榕树和佛塔一般神圣，所以经常会在榕树下焚香，供奉鲜花、水果。在罂粟王国的土壤上，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战火，也不能熄灭这种信仰。秉善的佛教教化着缅甸人，这能够解释，为何在印度出现了甘地，而在缅甸出现了昂山素季，他们同样奉行的是非暴力的独立运动。

这里不得不提到著名的大金塔。因为常年的政治封锁，一切与国际脱节，缅甸是整个中南半岛乃至整个东南亚唯一一个没有任何“名义上”的世界遗产的国家——因为无法参评；但这不会让驰名世界的大金塔逊色半分，它位于仰光的北圣山最高点，甘多吉湖边。人们在城中每个地方都能看到它闪耀的尖顶。

大金塔建于公元585年，塔高99余米，塔基周长四百余米，黄金、宝石与翡翠遍布塔身，它与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浮屠塔和柬埔寨的吴哥窟齐名，被称为“东南亚三大古迹”的瑰宝之一，也是缅甸的国家象征。

参观大金塔这天，我把自己从头到脚穿了个严实，并像缅甸人一样，穿上了纱笼（男性称隆基），以示尊重。这种半身筒裙在仰光随处可见，成品从几美元到几千美元不等，买好材料进行加工，费用只需要一两美元，行动十分方便，气质亦庄亦谐。

1988年8月26日，就在大金塔西门外广场，汇聚了仰光近百万群众，身着传统纱笼的昂山素季首次公开发表演说。当时，政府四处散播有关要刺杀她的谣言，这个不喜欢政治、想当作家的女人，单薄又柔弱，坚强而动情地说：“我不能对祖国所发生的一切熟视无睹……”

就在这一天，她成为民众心目中的精神领袖，她以国父之女的身份为无产者和底层百姓代言，深得人心。不过，作为英国教授的妻子，她同时也是西方政治势力在缅甸的代言人，从此站在了复杂的政治斗争的舞台中心。一道从世俗深处照来的光，试图照亮缅甸的长夜。

□ 编辑 徐伟 □ 制图 美编 黄静



述旧邦以托新命

通过叶匡政的视角，我们看到孔子在个体伦理、社群关系、人性本质、世界逻辑的理解上都具有相当的现代性，和我们印象中的纲常名教全然不同。这是那一代人在焚毁之后，由于难于明言而在述说旧邦中寄托的“新命”。

文 / 袁凌

对于匡政兄，先知其诗，再识其人，后读其文。至今记得他诗中写一只墙上烧毁的电闸，那焦黑无言的控诉，纪念着某个生命和自由被轰毁的年代。这只烧毁的电闸有一种无言的力量，这股力量在叶匡政主编的书籍和写作时评中也从未失去，使他的时评和散论总是具有摆脱具象向深远处延伸的力度，暗含一以贯之的关怀。这本《可以论》，就是这种深切关怀的积年产出。

或许有人会意外，一个知名的现代诗人，又是以城市系列成名，会对中国孔儒传统如此推崇，颇有安身立命的意思。抛开儒家本身的价值不谈，这种情感有似故土之思，对一个在外游历日久的浪子而言，归乡寻根并不难理解，颇似近现代以来在严复、章太炎、吴宓等人身上代际重复的现象。实际上在本书中，即有深切怀念母亲和追慕家族谱系的随笔，这类文章也是最为动人的。我清晰地记得，匡政不止一次激动地提起他的族人编撰叶氏家谱的情况，此后在劲松桥附近一个剧院的入口，他热情地介绍一位有志于家族史的乡贤给我。一个对亲情、乡土、历史血脉有深切感情的人，才会对旧邦人文有如此深的眷恋寄托。

回想上世纪90年代后期读研期间，国学一时大热，我也未能免俗，全套收入所谓新儒家文集，自然是摩挲皮毛，未得要领，相当于参观了一堆仿古建筑。叶匡政却是直取上流，面对孔子。这样也就使他获得了重新阐释的可能。他要做的是源头疏浚的工作：使孔子通向自由。

通过叶匡政的视角，我们看到孔子在个体伦理、社群关系、人性本质、世界逻辑的理



《可以论》

叶匡政 著
中信出版集团



解上都具有相当的现代性，和我们印象中的纲常名教全然不同。譬如对于中道、中庸的解释，释中道为率性狂狷，时而狂时而狷，遵从真实的天性，这和所谓汉宋儒术理学已经全然反面了。再如提到孔子的男女观念，通过子见南子的情节和“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重新阐释，说明孔子并无歧视女性的观念，这些都在打通孔子思想和现代人之间的观念栓塞。延伸到孟子，对于“性善论”重新解释为“向善”，也有助于厘清人性先验论上的某种迷数。而援引孟子对于邹国“群体性事件”的释疑，更是直切时事。难得的是，这些阐释既脱离了尊孔为经食古不化的窠臼，亦非六经注我援老佞释的蹈空俗套，而是言必有据，遵从学者，这就与一般的文化论拉开了距离。

这是与匡政根底上的自由意识分不开的。虽然这本书没有涉及现代自由主义细密的划分，但仍旧提示了当下现实需要的常识。譬如卢梭的思想并非典型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匡政却从他处摘取了民意包括公意和众意这一重要划分，这对于我们理

解和应对当下中国的民粹思潮是重要的提示。对于本土和外来思想、学术资源的化合引用，说明了匡政并非发思古之幽情，透露了他真正关心的是现实问题，核心又是“新命”——自由。

书中有大量针对当下社会现象的评论，却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时事评论，而一直带有文化和学术视角，眼光不在一时一事的臧否得失，而着眼于长远。在纷繁的现象下面，寄托着吾道一以贯之的关切。譬如对于红学偏于索引考据、学者日记的讳饰背后的文化心理的揭示，对于中土传统落后一面的批评，都表明他并非仅是“敝帚自珍”式的本土文化尊崇者，而更看重求真的精神。

他虽然淡化了早年诗人书写城市的那种面目，但一只烧毁的呼吁自由的电闸，却隐藏在他持平通达的文字和说理之下。正像他有次在居住的小区坑洼路上对我说的：我喜欢混乱，混乱中包含着生活真实的力量。这决定了匡政跟“理中客”的视距。

譬如对于2013年度汉字评选，匡政力主“霾”和“土豪”入选，而对评选结果的“正能量”质疑，直率表示“绝不存在一种可以漠视真相和苦难的正能量”。再如他提出“文学已死”，我还曾因此和他发生冲突，后来却明白双方其实观念一致，都是在呼吁新的生命力。在这些直率的文字和呼吁后面，显露着那个早年投身变革风潮的青年和抗议城市压迫的诗人，也隐含着被毁而无法复原的创痛。

这也许就是那一代人在焚毁之后，由于难于明言而在述说旧邦中寄托的“新命”。

□ 编辑 徐伟 □ 美编 黄静